



YANHUANGCHUNQIU

# 炎黄春秋

1995 (总第 11 期)

与  
**刘晓庆**  
交往十二年



陈云江西蒙尘记  
班禅达赖进京写真  
第二次国共谈判的秘密使者  
陈永贵政坛风云录



共和国  
最大泄毒案  
始末

# 陈云江西蒙尘记

★人海浪 / 林非 76  
我与周扬、吴伯箫和江南的交往

★人海浪 / 司徒任 64  
“文革”中的  
外交部夺权动乱

第二次国共谈判中的  
秘密使者

★狼星篇 / 尹 冀 14

5000 年前的神秘王国★神州景 / 昭 文 45

★人海浪 / 傅溪鹏

## 与刘晓庆

交往十二年 34

● 摄影 / 周雁鸣



共产国际眼中的

毛泽东



★时代风 / 汪晖 蔡京 方美 50

世界发明家来辉武

千古奇冤：袁崇焕之死

★古镜台 / 张锦信 11

# 炎黄春秋



## 薄一波同志为本刊题辞 [2]

★春秋笔/张士杰 [83] 发生在古城西安的第二次兵谏

## 陈永贵政坛风云录 / 吴 思

★赤子心/永志 [31] 东南亚名商唐裕

★春秋笔/李威海 [24]

## 1954年：班禅达赖进京写真

★古今谈/晓乔 [86] 明朝的宦官专权

★法制苑/田浩 [78]

## 中国首例特大泄毒案

顾问：

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约编委：

王俊义	冯其庸	张 锲
张国琦	李学勤	李 普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廖盖隆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丁洪章

宋文茂

总编辑：洪 炉

总经理：徐 孔

副总编辑：刘家驹 杜卫东

美术编辑：力 达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3-1170

出版日期：每月 11 日

广告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 200 号

印刷：国家统计局印刷厂

发行：《炎黄春秋》发行处

社址：北京西城文津街 7 号

邮编：100802

## 中国广告黑洞

★时代风/张祥 刘凯 [56]





## 英杰谱

YENGJIEPU

列宁创建的第三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1943年6月由斯大林决定解散。它是国际共运领导中心，总部设在莫斯科。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是它属下的一个支部，并直接受其领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努力指导着中国革命，以至左右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命运，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然而，它真的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吗？对于在中国革命中土生土长的领袖毛泽东，他了解多少？又对他有过怎样的评价呢？

# 弘揚民族文化 联谊炎黄子孫

为炎黄春秋杂志题

薄一波  
一九九二年  
十二月五日

●薄一波同志为本刊题辞

# 共产国际

●麦阳

# 眼中的毛泽东

## 一则“讣告”的背后

1968年，美国学者施瓦茨在他当年出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首次宣称，他发现了一则关于毛泽东的“讣告”。

这则“讣告”存在吗？“讣告”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对于前一个问题，一些外国学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也一再提及，但对后一个问题，外国学者没有谈到，中国的学者也无从回答，因为人们一直没能找到这份“讣告”。

1992年初，有人终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从国外购进的英文版《国际新闻通讯》的缩微胶卷中找到了这篇“讣告”的原文，并首次翻译成了中文。

《国际新闻通讯》是世界共产党总部共产国际的官方公报，1930年3月20日这份公报称：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当然毫无疑问，敌人会因此而感到高兴。”

显而易见，这份“讣告”是道听途说的产物。毛泽东当时仍然健在的消息相信不久就使共产国际的人们哑然失笑了。然而这份“讣告”之所以引起今天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其中表达流露了共产国际官方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的确非同寻常。“讣告”在文中介绍说：“毛泽东同志出身于湖南省一个农民家庭。早在学生时代，他就经历了对中国军阀的斗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立即投身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当中。1919年北京爱国学生发动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在长江地区广泛开展了宣传运动。在安源煤矿，他建立了一个模范工会，为现在湘赣地区的工会和布尔什维克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毛泽东同志从1923年起就是中共中央委员。他坚决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武汉时期特别是这样。当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遭到失败时，他违背了机会主义领导者的意志，继续在湖南农民群众中战斗。”

“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1928年初，他的军队和朱德同志的队伍会师，建立了工农红军，他们占领了湘赣边界的广大地区，并在每个地方建立了苏维埃。红军的活动严重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国民党派出邻省的7个军企图消灭这些红

军。根据策略上的需要，毛泽东和朱德的部分红军撤离湖南前往广东和福建，继续进行斗争，那里的革命运动正方兴未艾。福建省大部分地区已在苏维埃的控制之下。由于毛泽东的进军，那些被打垮，并被驱赶到粤东山区的红军和农民又重新开展了生气勃勃的斗争。去年夏天，国民党从6个省抽调6万多人的军队，又一次进攻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红军。但是，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并未能赶走这支1万人左右的红军队伍，相反，战争使国民党军队不断崩溃，整旅整旅的士兵开小差，甚至起义参加了红军。”

在这里，“讣告”介绍的是毛泽东学生时代直至1929年夏天的革命历程和业绩。引人注目的是，它强调了毛泽东与它指为“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即与陈独秀的斗争，强调了毛泽东开创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事迹。“讣告”随后称赞毛泽东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他还帮助揭露了在城市贫民、农民和工人阶级中的某些阶层里存在的改良主义。这些改良主义思想是国民党‘左派’第三党以及陈独秀造成的。”这里，毛泽东的政治贡献是围绕是否执行共产国际决议精神而决定的。

“讣告”最后说：“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由此可见，“讣告”建立在称颂肯定的基调之上，且评价之词甚高，它由此引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在三十年代前期和中期，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是不欣赏的。近几年，这种看法开始有所改变，有人发现，1935年共产国际机关杂志俄文版《共产国际》第33、34期合刊上就曾载文《勤劳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1935年12月13日《真理报》也以同样题名发表，其中对毛泽东倍加称赞。由此，他们认为，共产国际最早系统介绍并肯定毛泽东是在1935年。

“讣告”的发现，显然又把这个时间整整朝前推移了五年，而且使人们实实在在地看到早在1930年，共产国际的确就对毛泽东有了较高的评价了。

介绍有了，称颂也有了，然而1930年，毛泽东的确还活着，也没有患过肺结核，那么这时的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究竟了解多少呢？

## 1930年前后的毛泽东

共产国际发出“讣告”的时候，毛泽东正活动在赣南闽西一带，刚刚经历了兵权失而复得的一次波折。



1927年夏，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场难以释怀的恶梦。人头落地，血洒街头，迫使他们拿起了枪杆子。这是中国一批彻底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政治虽不比对书斋和线装书更熟悉，但政治斗争既然已经延伸成为战争，那么就别无选择了。

南昌暴动了，秋收起义了，但是走哪条路才能赢得政权？苏联的成功经验是城市暴动，于是中国人当时自然也不例外地制定了攻打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却是屡打屡败，屡败屡打。争争吵吵之中，忽然毛泽东带一彪人马从长沙城下撤出来，上了井冈山。就在落脚井冈山的绿林好汉袁文才、王佐道人宰猪杀羊，将热血洒在路口，敲锣打鼓，鞭炮齐鸣，以当地接待客人的最高礼仪迎接毛泽东的队伍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却炸了窝。在他们看来，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是畏敌逃跑的表现，是右

倾的单纯军事投机的表现。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对此也表现了他鲜明的态度。在中共中央1927年11月扩大会议上，他主张：撤销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于是毛泽东被开除了中央政治局。

井冈山上，毛泽东的日子难过。粮草难筹，兵马难带，仗该怎么打？怎样才能拓展自己的根据地？部队怎么建设？许多问题纠结在一起，令他百感交集，一时难以理出头绪。又隐隐约约从外面听到传说，毛泽东的党籍被中央开除了！他叹息之余只得自嘲自己是“党外民主人士”。

1929年春，一个叫刘安恭的人受中央派遣到了红四军。刘安恭曾在苏联留学，马列主义说起来头头是道，他认为毛泽东的那一套是从强调红四军的局部利益出发的，而没有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央的决议、指示办事。一言既出，许多本来就闹不清楚想不明白的人此时纷纷点头称是。毛泽东成了少数派。但他却寸步不让、据理力争，红四军党内的争论一时十分激烈。终于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

7月的一天，正值盛夏，骄阳似火。孤独的毛泽东带着贺子珍离开队伍，被派往福建上杭县的蛟洋去做地方工作。出发时，马被人们扣留了，他们一行人情绪低落慢慢远去。到蛟洋不久，毛泽东心情恶劣，一病不起。

或许就是这个情况被人传说开去，以至共产国际发出“讣告”宣称毛泽东已在福建病逝的吗？“讣告”介绍的毛泽东的生卒正是止于1929年夏天。毛泽东被迫离开前委的时候，毛泽东此时的处境恰与“讣告”的评价成鲜明的反差。“讣告”说毛泽东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那么，罗明纳兹要求撤销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提议呢？刘安恭指责毛泽东不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指示办事，以及毛泽东被撤销前委书记的事件呢？这一切共产国际了解吗？如果了解，他们究竟是怎么看的？他们把握了毛泽东那跳动的脉搏了吗？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上不见阐述，更有别苏联革命胜利的途径。而这些，恰恰是毛泽东创造性的发明所在。对此，共产国际开始是不以为然的，罗明纳兹在中国动用了他的权力。而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则说，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并要调朱德、毛泽东去苏联学习。既然如此，“讣告”称毛泽东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根据何在呢？是遵从传统的人既死其言也善的做法；还是一厢情愿、自说自话？抑或是布哈林下台之后共产国际改变对毛泽东态度的一个姿态？布哈林是在1929

年4月被撤职的，斯大林称为“清除共产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取而代之的是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皮亚特尼茨基的三人书记处，直到1934年季米特洛夫上台。

不管怎样，自1930年这则“讣告”起，共产国际的确有几次好评毛泽东，称其为英勇旗手，要中共“必须推广毛泽东的经验”，初步肯定了毛泽东创建苏维埃根据地的成绩。但共产国际仍旧没有改变他们看问题的立场与角度，即把下属支部是否完全执行其决议放在首位。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了解毛泽东这位土生土长、脚踏中国土地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人；他的思路、他的创造、他的个性、他心灵深处涌动的澎湃的激流。

1929年7月，毛泽东离开前委后不久，因为红军打了败仗，他又被从福建蛟洋请回部队继续主持前委工作。蛟洋期间，毛泽东深思熟虑，拿出了他归纳成文的一叠意见，即随后在古田会议通过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他还给林彪写了封信，预言农村根据地的星星之火必将燎原。在《反对本本主义》的名篇里，他则感慨教条主义之苦，痛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931年11月，毛泽东因与红军领导层再次就打不打中心城市发生争论，在江西瑞金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不久，又被取消红军总政委职务。

1932年10月，宁都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因为和坚持进攻路线的许多人据理力争，被认为“一意孤行”、“狂妄自大，目无领导”再一次被撤销他的总政委职务，召回后方工作。接下来无限烦恼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又不得不面对有共产国际特别是王明信任支持的博古。还有一个洋顾问李德。

王明是1931年初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手扶持下爬上高位的。他前后实际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四年，推行的是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直到1935年1月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开始对其进行军事上的清算，毛泽东才重新获得对军队的领导权。

从此，毛泽东步步为营，不懈地坚持对王明的斗争，直到40年代初期整风运动中实现对王明路线的彻底斗争与清算。有人说，毛泽东的伟大更在于他同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斗争。的确，没有这些，中国革命又怎能打败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

## 另外说到的两个人：陈独秀、王明

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史上，不能不提到这两个人，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王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

的短暂关系似乎没有和谐过。而王明却相反，紧随其后，亦步亦趋，几乎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有人把1919年《青年杂志》创刊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的这时期称作陈独秀时代，而把1927年井冈山斗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期称作毛泽东时代。陈独秀时代落下了帷幕，而随后走上政治舞台中心的毛泽东则面对着王明。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从党的“一大”开始，直到“五大”。被选为党的总书记。在他那里，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一开始就出现过不和谐的音符。

刚刚建党的时候，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面，就为中共与共产国际要不要建立从属关系发生争议。马林坚持认为，中共的方针政策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下制定，而陈独秀坚持说不必要，因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几次谈下来两人都不欢而散。一次，为马林翻译的张太雷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下……中国也不能例外”时，陈独秀竟大发脾气，用手拍得桌子砰砰响：“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就干多大的事情，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言毕，拿起皮包就走出了门。几个月后，陈独秀被捕，马林出力营救，才使两人的关系和谐了许多。通过会谈，最终还是决定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支援。

上下级关系确定后，遇到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国共两党如何合作。对此，陈独秀再次和共产国际发生分歧，反对实行党内合作的办法。然而，共产国际毕竟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它的意见是指令性的。就这样陈独秀有生以来第一次服从于他人，做了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接下来，他的“二次革命论”使他一再对国民党右派实行退让，直到革命成果全失。

随着大革命失败，陈独秀时代一去不复返，继解除职务之后，1929年11月，他因采取托洛茨基立场而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930年初，共产国际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专门召开“关于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讨论会，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致电陈独秀，要他去莫斯科出席其审查中共中央开除他党籍的决定的会议，陈独秀断然拒绝。

1930年关于毛泽东去世的“讣告”中，陈独秀被作为毛的对立面称之为“机会主义领导者”，共产国际对陈独秀的评语给他们之间的关系打上了句号。

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要有中国人自己来领导。这是陈独秀的精华之语，然而真正领会掌握它并贯彻于实践之中的却是毛泽东。

历史充满曲折，一幕落下，一幕又起。就在情绪低落的陈独秀与托派组织频频来往的时候，就在毛泽东几经排挤，仍苦苦转战苏区的时候，中共领导层的更迭瞬

息万变。以共产国际传声筒面貌出现的王明登上政治舞台。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用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终于使王明实际上执掌中央大权。

王明是没有资格得到这个地位的，但他却得到了。

1927年他还只是苏联中山大学一个没有毕业的学生，给米夫当翻译。1929年他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担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兼《红旗》报通讯员。1930年初他被捕，出狱后参加全总宣传部《劳动》报的编辑工作。米夫对他父子般的信任和欣赏，使他踌躇满志。他曾这样对罗章龙说：“东方部派我们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

他的目的真的达到了。1930年底，米夫给中共中央施加压力，让王明担任白区中党的最重要的地方领导机构的负责人——江苏省委书记。这为王明登上高位铺垫了台阶。而王明上台，又为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其路线方针政策铺平了道路。

王明上台后，无心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工作。1931年11月，他回到苏联，并在共产国际担任领导职务，从此在千里之外遥控指挥中国革命。他把权力之绳的一头捏在自己手中，一头交给博古。

然而，历史打了一个弯却并没有依照他的设想向前发展。当1937年11月王明回国时，国内却已是物换星移。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血的教训，使人们已经决然抛弃了他，抛弃了教条，而选择了毛泽东。

这一选择，对共产国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而王明，忠实于共产国际、忠实于本本的王明，对此又作何种感想？面临怎样的前途呢？

## 1935年：共产国际有人如此描绘毛泽东

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在共产国际，也进了一步，承认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享有盛名的领袖。

1935年共产国际机关杂志俄文版《共产国际》第33、34期合刊登载了一篇题为《勤劳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文章。文章的作者为“赫”，身份不详，他对毛泽东的生平的介绍虽然多有讹误，但毕竟要比斯诺1937年出版的《西行漫记》早两年。

赫以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作引言，介绍了从少年时代到1921年建党直至1935年前的毛泽东的事迹。

他这样描绘参加中国共产党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毛泽东：“一个瘦高个年青人发言了，从外表看，他是个典型的学生或者是谦虚的乡村教师。一副平静而严

厉的面孔，深沉的大眼睛中带着令人费解的笑意。苍白似病的面容使他明显地不同于其他人。”赫说：“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人在党组织会议上的发言中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激昂的演说家，天才地指出下一步斗争中所必须的路线和方法。”

赫称赞毛泽东是“大无畏的中国布尔什维克”，“一个强劲的人民领袖”，“一个勇敢的革命统帅和天才的战略家”，“一个卓越的国务活动家”，“毛泽东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人民的真诚朋友”，“具有铁一般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精神，卓越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惊人勇敢、博学和无穷的天赋——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的优秀品质。”

赫的文章还向人们叙述了一个故事：一位红军战士被捕了，在审讯中，他自始至终保持了自信与镇静。敌人问他红军有多少兵力？他答：“多得很！”至于其他问题，他一概说三个字“不知道！”然而当谈到红军指挥员时，他竟滔滔不绝：“我既知道毛泽东也知道朱德，还知道彭德怀。毛泽东是我们的主要领导人。他领导着政府、党和军队。”他说毛泽东是个非常普通而热心的人，总用最闭塞的人们也能懂的语言讲话。毛泽东的威望和声誉很难用语言转述。他说战士们都愿意跟着毛泽东，无论走到哪里。毛泽东总是关心别人，而他自己病得很厉害，不停地咳嗽，脸色苍白，浑身无力，但行军时仍和战士一起睡在地上，吃同大家一样的伙食。这位红军战士还说到他亲眼看到毛泽东在宁都附近打仗时和战士一起冲锋。敌人打断这位战士的长篇大论扬言要枪毙他，他却仍然在说毛泽东：“我听过我们领袖的话。他说害怕为人民事业奋斗而死的人就是卑鄙的胆小鬼。而我是共产党员！”

故事很简单，但他却说明了中国人民对自己领袖感情上深刻的认同。

## 再给王明一次机会，他行吗？

1937年11月，王明启程回国。之前，他和王稼祥面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季米特洛夫还说过：“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会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半年之后的1938年夏天，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再





一次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话：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9月，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季米特洛夫的指导精神，即认为，朱毛等领导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政策，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解决问题。

共产国际的信息清晰明确，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进一步被确立了。

王明坐在会场中，听取了这次传达，他心里是不是在想着会有另一次机会在等着他？

194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这之前几天，在延安传达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两个文件时，毛泽东在肯定它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中有很大功劳之后，说它已不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因为统一的国际组织已无法适应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日益复杂而又迅速变化的形势。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成长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

与共产国际几乎同荣同衰的王明又能有怎样的前途呢？他不再会有机会了。虽然在延安整风时他还依然放我，但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他终于写下了一份自我检讨。

1945年6月，“七大”胜利进行之中的一天，毛泽东和俄文翻译师哲从枣园出来，走向杨家岭的会场。路上，师哲谈到自己对整风文件中有些问题的理解还不深，比如说王明的错误具体起来这一点或那一点都清楚，但他的错误的实质是什么？他请教毛泽东，毛泽东简简单单一句话便师哲顿开茅塞。毛泽东说：王明的问题，关键就在于他对自己中国的问题考虑得太少了，面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太多了！

真是一语中的，一针见血！毛泽东对拉大旗作虎

皮的王明深恶痛绝，对共产国际似乎也并不满意。1949年12月16日，胜利者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在克里姆林宫的小会议室，斯大林破例迎到门前，口中称赞毛泽东的伟大，毛泽东回答：“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抢过话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言犹未尽的毛泽东在后来与斯大林的一次小范围会谈中又一次抓住机会，提及他在中国十年内战时期受过的排挤打击，然而未谈几句，又一次被斯大林的插话岔开。

看来，斯大林是决意不让毛泽东畅所欲言的。毛泽东未能尽情吐出心中的怨气，但他毕竟是以胜利者的身份出现在了莫斯科。此时，他一定想了许许多多，包括王明。

再给王明们一次机会，他们能行吗？

回答是：不行，他们会再一次断送中国革命。

## “讣告”未解之谜

1930年3月20日共产国际《国际新闻通讯》发布的关于毛泽东去世的“讣告”，其内容已公布于众，为研究毛泽东及至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史料依据。然而其中依然还有未解之谜：它的消息来源是哪里？也就是说，在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并不在中国，也没有建立起通讯联络的情况下，有关毛泽东生平事迹和他患肺结核病逝于福建的信息情报是由谁，怎么传到共产国际总部的？这个“讣告”是由谁起草，又由谁签发的？

这两个谜能够解开吗？何时能够解开？

[责任编辑：穆 图]



# 陈云 江西蒙尘记

●叶永烈

## 中央要员“陈元方”的来历

在江西南昌的南郊，有一座用围墙团团围着的宽大的院落。大门口有军人站岗，木牌上画着一颗八一军徽，下书“福州军区干部休养所”。围墙和门岗把这里与外界隔绝，成了清一色的军人世界。

1969年11月上旬，副所长沈玉贵忽地接到上级命令，说是一位中央要员将来此居住，尽快安排住所，并做好安全保卫工作。据云，来人名唤“陈元方”，不

是路过此地，而是要来此长住。

既是中央要员，名字怎么陌生得很？

虽然沈玉贵心中困惑，仍坚决执行命令，把休养所里最好的八号院安排给“陈元方”。

八号院在干休所深处，几间青瓦灰砖平房组成一个独立的院落。五十年代，彭德怀元帅路过南昌时，曾住此院。不过，这次上级派人前来检查时，仍对小院的一侧敞开着表示不满意，要求限时刻砌上一堵围墙。于是沈玉贵指挥战士挑灯夜战，用红砖砌了三米高的围墙把小院封闭起来。

那位“陈元方”，是和邓小平、王震、何长工、肖克、陈再道等差不多同时离开北京前往江西的。“陈元方”在1969年11月9日坐火车到达南昌。先是临时住在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即今日滨江宾馆），几天之后，一辆蓝灰色的华沙牌小轿车便载着他驶向南昌西郊，来到那大围墙之中又有小围墙的八号院。

沈玉贵一眼就认出这位“陈元方”是谁。因为此人在解放后一直担任国务院（最初叫政务院）副总理，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他的照片常常登在报纸上，谁个不知他是陈云？！

于是，沈玉贵和陈云一见面，那对话便十分有趣。

沈玉贵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皮说：“首长，我认得您。”

陈云慢而应之：“哦”。沈玉贵只得进一步说：“首长，我常在报上见到您的照片。您怎么把名字都改了，叫陈元方？”

陈云这时幽默的回答道：“上头叫改的，还好，名字改了，姓没改，我还姓陈嘛！”

沈玉贵又说：“首长怎么来我们这个小地方？”

陈云答曰：“上头叫来的！”

后来沈玉贵跟陈云熟了，才知道“陈元方”这个名字的来历：陈云的两个儿子，叫陈元、陈方，“陈元方”是他用两个儿子的名字“组合”而成的！

## 陈云下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陈云的住处算是有了着落，他的秘书老肖、警卫员、炊事员跟他住在一起。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给他指派了司机以及那辆华沙牌轿车，还配备了锅炉工。这样，陈云和五位工作人员一起，住在八号小院。那时，他毕竟还是中共中央委员，而且在一个多月前——1969年9月31日，他还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庆二十周年招待会，虽说他已是无职无权的了。他来到江西，待遇比邓小平稍好，——邓小平那时成了被打倒的全国“第二号走资派”，被安排在南昌西北郊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劳动。而陈云呢，他的名义则是“蹲点”、“调查研究。”

陈云的“点”在哪里呢？在福州军区干休所前，有一狭长的小湖，名叫青云湖。小湖对岸，有一家规模中等的工厂，叫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全厂有一千六百多名职工。于是，这家工厂被选定作为陈云的“点”。

这是一家普普通通的工厂，早先属劳改局，内中有一些工人是刑满释放来此做工。这家工厂从未接待过陈云这样的中央要员，何况，他不是前来参观，而

是长期“蹲点”。厂领导一时不知所措，按照上级规定，对陈云来厂要实行严格保密，只称“客人”，不许暴露真实姓名。另外，厂里要定专人，与陈去“单线联系”，安排有关工作。

厂“革命委员会”经过研究，指定厂办公室主任，三十四岁的马骏，担任陈云的“联络员”。

又瘦又长的马骏，确实是很合适的人选。他1955年入党，作为调干生，前往武汉学冶金机械，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1968年调到这家工厂，下放劳动。马骏一则有省委机关的工作经验，二则出任厂办公室主任以来跟厂里上上下下都熟。

1969年11月13日，陈云秘书老肖通知马骏，说“客人”要到厂里来。厂部“三李一张”，顿时陷入“紧张状态。”那“三李一张”，即李健、李彪、李亦、张守信，一正三副，厂里的头头。他们原以为，小轿车进厂时，传达室会打电话进来。谁知厂部大楼下边响起“来啦，来啦”的声音，“客人”已经走进厂部大楼。厂领导急步从二楼下来，跟“客人”在木楼梯上相遇。马骏记得，李健厂长在跟陈云握手时，竟不知该怎么称呼他——因为当面喊他“客人”，实在喊不出，虽说李健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做过多年公安工作，见过世面。倒是“客人”先发话了，在楼梯上停住了脚步，用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说道：“我到这里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那天，陈云穿了一身灰色中山装，黑布鞋，外面套了一件咖啡色海虎绒领，草绿色的军大衣。上了二楼，步入厂会客室，陈云向厂领导询问起生产情况，在一问一答之中，厂领导的情绪放松了。他们发觉，陈云很随和，一下子就接近起来。陈云一再说：“我过去下基层不多，这一回要在你们厂里多做调查研究，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从这一天开始，陈云便三天两头朝厂里去。

也就从这一天起，马骏三天两头骑着自行车上八号院。开初几天，大门口的哨兵要盘问他。一回生，二回熟。后来他朝哨兵点点头，自行车就飞快地驶进大门。

## 木折叠凳成了陈云“专座”

那年月，陈云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



# 英杰谱

## YENGJIEPU

里也就安排他到各班组参加政治学习。每天，工人们在下午四点半下班，便开始政治学习，至五时半结束。

陈云很守时。每天下午将近四时半的时候，他那辆“华沙”便会驶入工厂大门。从八号院到厂，“华沙”开五分钟就到了。

金工车间、铸工车间……陈云轮流到各个班组参加政治学习。每到一个小组，陈云便让马骏介绍每个工人的名字。有时，连马骏也说不上，就请工人们自报家门。令马骏异常惊诧的是：过了一些天，当陈云再度轮到参加这个小组学习时，陈云便能叫出每个人的姓名。他甚至会同，某某今天怎么没有来开会！

陈云比马骏整整大了三十岁。六十四岁的陈云，怎么会有那样好的记忆力？陈云笑谓马骏：“这是练出来的。你要做群众工作，你要带部队，叫不出人家的名字怎么行呢？日子久了，就养成了记人记事的习惯。我象你这样的年龄，能记两千人的名字。”

陈云参加工人们的政治学习会，总是侧着脑袋静静地听，几乎不说什么。在一个车间的角落里有一张破沙发，工人们修理了一下，专供陈云坐。陈云不好



●陈云夫人于若木(后中)与亲友合影

意思那么“特殊”，何况他轮流到各班组去，那沙发搬来搬去太麻烦。于是，木工们特地做了一张折叠式的小木凳，送给陈云作为“专座”。陈云倒是很喜欢这小凳子。他的警卫员李奇总是提着小木凳，陈云走到哪里，就放到哪里。后来，陈云离厂回北京时特地跟厂里打招呼：“这凳子，我要带到北京去。我见到毛主席，要给他看，告诉他这是江西工人给我做的凳子，我每天坐这凳子！”

陈云也在厂里召开各种各样的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每一回，陈云把开会的要求告诉马骏，由马骏拟好名单，通知工人们来开座谈会。据马骏回忆，这样的会大约开了一百来次。每一次开会，由马骏主持，介绍“客人”的意图。“客人”只是静静地听，偶然提出一些问题。

日子久了，工人们跟陈云熟了，也就不顾上头的那些“规定”了。有的工人拿出《毛选》请“客人”签名，“客人”也就签上了“陈云”两字。一位青年工人请陈云题词，陈云也写了一句勉励的话。

在铸工车间，陈云遇上了一位老工人。老工人很尊敬地向陈云行拱手礼，陈云当即双手一拱还礼。礼毕，陈云问他：“你是什么文化程度？现在行拱手礼的人不多了……”就这样，陈云跟那位老工人聊起了家常。

青年工人虞永刚进厂，人称“小罗汉”（意即爱玩）。陈云听说了，跟他聊天。陈云对他说：“趁年轻，多学点技术。”

陈云对厂里的生产很关心，有时参加厂生产调度会议。他曾对厂领导说：“厂里天天开政治学习会，能不能抽出一些时间，研究研究生产？”

有一回，陈云跟厂校的一位教师握手，感觉他手上的老茧挺厚。陈云笑道：“你很不错嘛！”

陈云参加会议很认真，一边听发言，一边看文件。他轮换着两副眼镜。看文件或记笔记，用一副小镜片老花眼镜。有一回，正讨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工人们提议，请“客人”讲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陈云连连摆手道：“我没有‘资格’谈！”确实，在那样的年月，他能谈什么呢？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欢呼之声席卷华夏大地。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一消息时，陈云正好在厂里。他的轿车停在车间门口，他让司机打开车里的收音机，工人们围在车旁，侧耳听着那从人造卫星上发回的《东方红》乐曲声。“小罗汉”虞永刚不解，人造卫星怎么会唱《东方红》？他问“首长”——工人们已习惯于这么称呼陈云，不再喊他“客人”。陈云似乎答非所问，说了一句：“其实，这颗人造卫星早就应该上天了！”

## 从北京运来三十多箱书

陈云言语不多，不抽烟，不喝酒，也不玩扑克、搓麻将。那时没有什么文娱活动，难得放映“样板戏”电影。陈云只看了一遍，就再也没去看。

陈云的爱好是看书。他的书房里，堆了三十多箱从北京运来的书。他的卧室里放一张书桌，一张藤椅，他总是坐在那里看书。

有一回，沈玉贵要写学习心得。按那时的习惯，必定要引用一段革命导师的话。沈玉贵记得一段话的大意，不知是谁说的，更不知出自何书。他向陈云请教，陈云随口答道，你查一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几卷，那是马克思的一段话，篇名叫什么。沈玉贵照陈云的提点，果真查到那篇文章。陈云又告诉他，那篇文章的核心是其中一段三百多字的话，要仔细捉摸。

那天，陈云跟沈玉贵聊起了该怎么学习。陈云说：“全国的报纸，杂志很多，光是看一下大标题，你的时间也不够用。照我看，你要抓住三份报纸，每天仔细看。一份是《人民日报》，一份是《解放军报》，一份是《江西日报》。抓住了这三份报纸，你对全国、全军、全省的情况就了解了。重要的精神，这三份报纸里都有。学习，要抓住主要的东西。”

那时，陈云跟沈玉贵已很熟悉了，知道他是1947年入党的十八级干部，每月工资82元，家有六口人。陈云对他说：“你负担重，经济上好紧张呀。别的东西可以省一些，营养不能省。身体很要紧，是革命的本钱。”

陈云说起了自己的感受。他说，早年，东奔西跑，日子也过得很紧。特别是有了几个孩子之后，负担重了，钱舍不得用，要供养孩子。现在孩子都成人了，自己却因胃肠不好，吃什么都要注意。前些天，陈云吃了八颗用盐水煮的花生米，就拉肚子。如今，吃一个苹果，也得分三次吃。

沈玉贵发觉，陈云的饮食很简单，喜欢吃清蒸鱼、豆腐、青菜，也喝点鸡汤。爱吃带咸味的面包。

院子里有葡萄架，有桂树，陈云喜欢在那里散步，或静坐。

儿子、女儿前来看望他。沈玉贵记得，陈元来时，穿一件蓝大褂，看上去像个工人。陈元结婚，未作任何声张。直至陈云把两斤水果糖分发给这里的工作人员，大家才知道他儿子结婚了。他的女儿来此，下厨操作，腰间围着围兜。正值马骏来了，陈云笑着对他说：“老马，你看她象不象大师傅？”虽说马骏比陈云小得多，陈云总喊他“老马。”子女来来去去，都坐公共汽车。



英杰谱  
YENGJIEPU

●马骏当年三天两头敲响这扇八号院的小门



那时，陈云夫人于若木在“五·七”干校，未能前来南昌。

## 陈云强调要注重发展生产

南昌这地方，夏日似火炉，冬天滴水成冰。1970年夏，陈云到北京住了些日子。马骏记得，在7月5日送他上火车。一个来月后，陈云回来了，又从南昌去九江。马骏以为他大约上庐山避暑，其实，他住在九江南湖宾馆。

当陈云回到八号院不久，报上登出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的消息，工人们才知道陈云去开中

央全会。不过，处于“靠边站”的陈云，只在开大会时才由九江上了庐山，然后随即下山——九江与庐山之间，小轿车开个把小时便可到达。

工人们在政治学习时，请陈云谈谈会议的情况。陈云摇头道：“你们别问我，去向程世清！”程世清，当时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不过，有时不是正儿八经地开会，工人们要陈云讲革命故事，陈云倒不推辞。陈云是上海青浦练塘人，他家附近就有一家书场，他从小喜欢听评弹。后来，他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学徒，养成了爱书、看书的习惯。他说起故事来绘声绘色，颇为生动。他曾说起，1933年初，当他从上海经过秘密通道，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时，一路上非常危险，差一点落入敌人的包围圈。日夜兼程，当他听说已经进入中央苏区地界时，便躺在地上，大声地说：“现在可以歇一口气了！”

有时工人问起，在“文革”中，他挨斗了没有？陈云笑道：“红卫兵要斗我。是毛主席、周总理把我藏了起来。要不，我也得挂这个……”陈云说着，做了个挂木牌挨斗的姿势，惹得工人们大笑起来。

有人对陈云说：“你六十多岁了，看上去还很神气呢！”他答道：“我是共产党员，当然神气呀！”

当时，工人们工资低，生活差。他们问陈云，怎样才能使生活水平提高？陈云用很通俗的比喻，加以解答。他拿起了桌子上的茶缸说道：“比如，你生产茶缸，每个茶缸五元，你一天只生产一个，创造的价值是五元钱。即使涨价，涨到十元钱一个，别的东西也随着涨了，你的实际收入还是一样，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可是，你增加生产，一天生产两个茶缸，那你创造的价值就是十元。所以，要提高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一定要注意发展生产。”一谈起经济问题，陈云

的话就多了。他主管过全国的经济工作，富有经验。

陈云几乎跑遍了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仓库，他去了很多次进行调查研究。他还主动扩大了调查研究的范围，到南昌洪都机械厂和附近的第十九中学了解情况。

陈云强调要增加生产，同时厉行节约。他看到厂里丢在地上的边角料、半截子的电焊条，建议工人们加以利用，以节约成本。

他见到厂里大批废弃的漆包线，曾找副厂长李赤谈话，研究能否把废旧漆包线重新涂漆，加以利用？李赤摇头，说是无法重新利用。但是，陈云却并不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

## 跟江西老表结下了特殊的友谊

1971年9月13日，蒙古温都尔汗沙漠上的剧烈的爆炸声，经过好些日子，终于传到了江西。

令人诧异的是，作为中共中央委员的陈云，最初竟是从马骏那里听说林彪叛逃事件！

那天马骏在厂里听了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文件传达，急忙骑车到陈云那里去。

陈云听罢，过了一会儿，说道：“这个人干出了这样没良心的事！”

他又说：“林彪比我小两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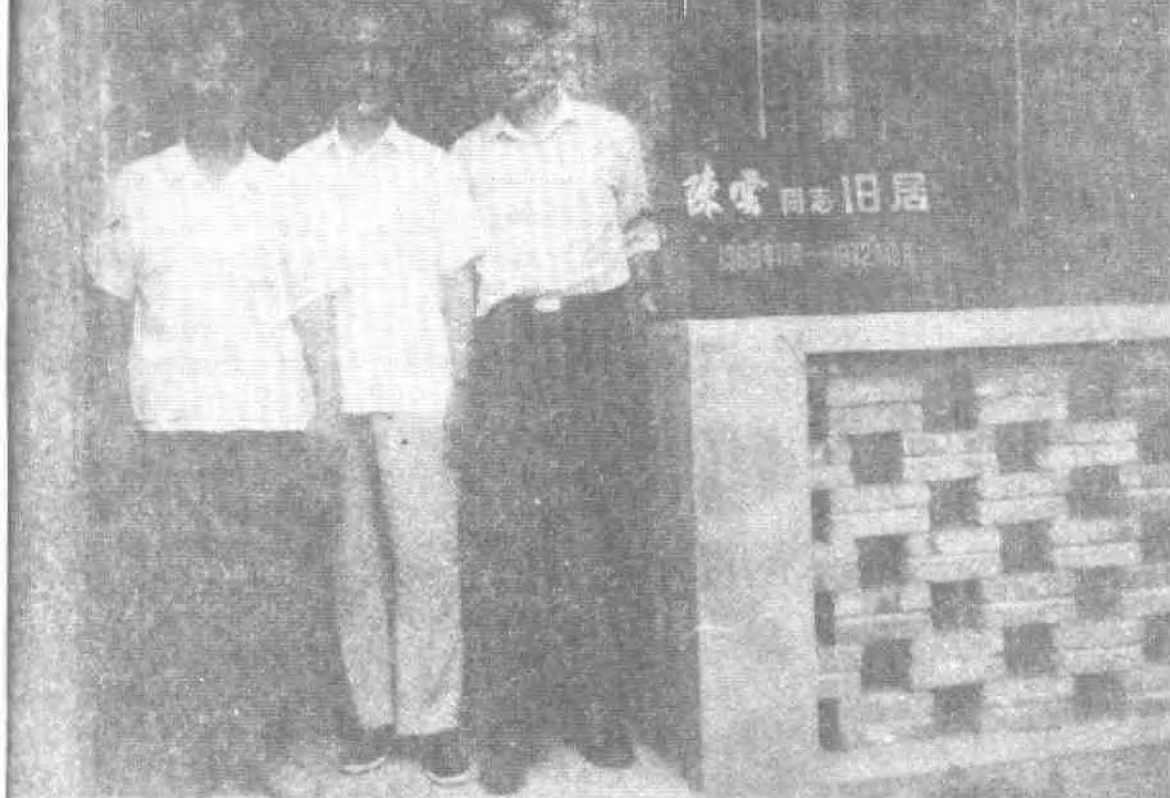
“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集团覆没，周恩来建议毛泽东启用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革命老干部。

1972年4月20日上午刚上班，陈云秘书老肖给马骏挂电话，说陈云要回北京了，来厂辞行。没多久，陈云的轿车（这时已改用一辆天蓝色的伏尔加牌）驶抵厂部办公楼前。厂领导连忙下楼，他们和陈云又在

●陈云在南昌“下放”时的卧室一角



左起：  
沈玉贵、马骏和本文作者  
在“八号院”合影



楼梯上相遇。经过前后快四年的相处，他们和陈云已成老朋友了。

从上午八时到十一时多，陈云向“三李一张”讲述了自己对办好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的意见和希望。他谈得很中肯，反复强调要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注意一点一滴的节约……

4月23日，陈云离开南昌回北京。跟来的时候不同，这一回，江西省特地调了一节软卧车厢。供陈云专用。这一细节也表明陈云即将由“沉”转“浮”。马骏到车站为陈云送行，陈云请他上专用车厢坐着，直到车铃响，马骏才依依不舍地下了车。陈云叮嘱马骏，以后常来信，出差北京一定要来他家。在那特殊的岁月，陈云跟这位普通的江西干部结下了特殊的友谊。

三个多月后——1972年8月1日，在叶剑英主持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五周年招待会上，陈云公开露面了。与陈云同时“亮相”的还有王震和滕代远。

马骏给陈云去信，汇报厂里的情况。8月4日，陈云亲笔复函马骏，托他向厂里的工人、领导问好。

副厂长李赤，曾收到陈云一封亲笔信，专谈漆包线问题。原来，陈云到了北京，仍记挂着废旧漆包线的利用问题。他请教了有关专家，专家答复说，为着生产的安全，废旧漆包线是不能再涂漆使用的。这表明李赤的意见是正确的，陈云在信中，谦逊说自己对技术问题外行，称赞了李赤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此后，马骏几度出差北京，给陈云挂电话，陈云马上接待这位江西老表。有一回，正值陈云马上就要出差，陈云宁可免掉与一位省委书记的谈话，却腾出时间接待马骏。他每一回都向马骏了解江西的情况，工厂的情况，他会报了一大串人名，询问现状如何……

最使马骏感动的是，他的妻子在1975年去世，两个孩子尚小，一个九岁，一个才十一岁，家中还有老母……因为他跟肖秘书是无话不说的老朋友，就在给肖秘书的信中说及自己家中的变故。不料，此事被陈云得知，当即给马骏以经济帮助。马骏完全出乎意料，陷入久久的激动之中。

笔者两度赴南昌采访了马骏，又赴八号院及江西化工厂石油机械厂采访，还访问了陈云秘书老肖。以上的记述，得助于他们的回忆，使笔者能够大致勾勒陈云蒙尘江西的那些鲜为人知的经历。遗憾的是，在那特殊的年月，陈云在江西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这件事本身，也足以说明在他“靠边”时处境何等艰难。一位工人说，曾在车间的行车旁给陈云拍过一张照片，只是如今找不到了。

马骏陪笔者步入八号院，他觉得庭院依旧，只是那棵桂树仿佛猛然间长粗了许多。哦，已经二十个春秋飞逝……马骏却恍若昨日。

[责任编辑 东蕾]

叶永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著有《红色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等大批畅销书。



## 第二次

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中共老党员潘汉年在第二次国共和谈期间“秘密投降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

## 国共谈判

此事究竟如何，其中自有奥秘。

## 中的

## 秘密使者

●尹 骐

### 莫斯科——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办事处里，一片温馨的气氛

莫斯科。1936年2月初的一天。

北国严冬，寒气袭人。大街上只有稀少的行人裹着厚厚的冬装匆匆地走过。街道两旁干枯的树枝在冷风中微微抖瑟着。

在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国际代表团办事处里，此刻却是一片温馨舒畅的氛围。暖气烧得很热，室内春意盎然。人们的心情似乎也很不错。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充满着一种乐观的期望。自从半年多前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新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以来，许多国家的革命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关于停止国内战争建立反对日本侵略者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宣言（后来史书通称《八一宣言》），已经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国内的一些进步政治力量做出了积极反应，呼吁国民党政府改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些地方实力派已经表示不参与所谓“剿共”内战。国民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政见分歧日趋明朗，许多有识之士主张停止内战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就国民党的决策层而言，一些实权人物开始采取了较为松动灵活的态度。

在代表团的一间小办公室内，王明正在和数日之前才来莫斯科的潘汉年进行着重要的谈话。王明以中共代表团主要领导人的权威身份和理论家的雄辩姿态，对潘汉年分析了自共产国际“七大”以来形势的巨大变化，他指出，实践已证明共产国际所确定的组织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策略的正确性。我们党提出的在国内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战线的主张，也是完全正确的。他说：“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政府推行的坚决反共的政策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些军队的领袖人物也不愿意继续参加“剿共”内战了。蒋介石政府已处于进退维谷之中，他们也并非不想抵抗日本的侵略，但又深感其财力物力的不足，强调要做好准备，特别是需要寻求国际援助。英美等西方国家虽一贯支持蒋介石政府，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也不能给中国政府以大量的援助。只有社会主义苏联，已经明确表示愿意援助中国政府抗日，蒋介石政府对此极为重视。但苏联的援助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中国政府必须停止剿共内战，把援助完全用于抗日的目标。苏联的这一外交行动对于我们是很有利的。面对这一情况，蒋介石政府已经从坚持剿共灭共的顽固立场上有所退步，开始寻求和中共联系谈判以实现停止内战的途径。南京方面不仅已通过某些渠道和国内的中共领导机构进行了初步联系，且通过他们的驻外机构来和



我党进行联系。他强调说：“不久前国民党中央的重要决策人物陈果夫、陈立夫通过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来和我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接触。这些情况你是已经知道的。现在他们要求我们派人回国去和南京方面直接联络，沟通国共双方的意见，为进一步谈判做准备，我们已表示同意。”

说到这里，王明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他就以部署工作的语气对潘汉年说：“今天同你谈，就是准备让你尽快回国去和南京进行联络，由你去当面转达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主张，同时也直接听听他们的具体意见和建议。你在国内已经有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你和陈铭枢、蔡廷锴、陈济棠等人都打过交道，相信你此番回国也一定能很好地担负起这项重大使命的。对此，你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吗？”

潘汉年想了想回答说：“要我去担当这项任务，我没有什么意见。我何时动身，行前还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可否请你再具体谈谈。”

王明说：“你同意去就好，动身时间不必太急，交通路线由组织上来安排。我们当前的目标是要求蒋介石政府停止剿共内战，实现国内和平，然后再谈判组成一个联合的国防政府和联合的抗日军队。我们党愿意接受这个联合政府的领导，我们红军可以接受政府统一指挥参加对日作战。”王明要求潘汉年在和南京方面取得联系，并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之后，再设法去西北地区找到党

的中央机关报告情况。他最后说：“你在动身前，还要和共产国际专管中国事务的部门联系一下，带去通讯密码，到达西北之后交给中央，以便尽早恢复中断很久的中央和‘国际’间的电讯联系。关于你回国之后怎样和南京方面取得联系，你可以再和邓文仪联系见一次面，直接商谈一下。”

和王明谈话后不久的一天傍晚，潘汉年在共产国际曼努意斯基的陪同下，来到莫斯科市中心的苏维埃大旅社。在一间宽敞的客房里，潘汉年见到了事先约好在此会面的邓文仪。潘汉年过去没有和邓单独接触过，但知道他颇受蒋介石器重，邓曾在苏联和蒋经国有过同窗之谊，回国后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工作过。蒋介石派他出任驻苏联使馆的武官，据说不仅是为了加强对苏外交活动，而且还设法寻找当时下落不明的蒋经国、向苏方交涉让蒋经国回国的任务。

在曼努意斯基简短致词后，潘汉年首先说：“邓先生，我此次奉命回国和贵党中央进行联络，但我现在连进入国门自由都没有哩！”邓文仪立即答复说：“潘先生到达香港之后，请先给陈果夫先生直接写信通知他。他将派人到香港去和你联系，然后一起去南京。”说完，邓随手递给潘汉年一页写有陈果夫地址的信笺。

接着邓文仪问道：“中共方面对于即将开始的两党谈判的基本态度如何，可否请潘先生说？”

潘汉年回答说：“我党对国内问题和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实行联合的基本方针，在我们公开发表的《宣言》中实际上都已明确提出了。现在的情况是，国内战争

### ●毛泽东与陈诚、张治中合影





## ●美国特使马歇尔同蒋介石亲密交谈

仍在进行。国民党的军队还在追击红军。当前首要的步骤是必须立即停止内战，结束军事行动，这应当是谈判联合的前提。”

会见很快就告结束。当香槟酒被放在客人面前时，曼努意斯基请潘汉年和邓文仪共同干杯，祝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未来的谈判与合作中取得成功。

## 香港——潘汉年和张冲在九龙酒店会面

香港。1936年7月8日。

这一天本埠的《生活日报》上登出了一则寻人广告：

“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遭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

这则在局外人看来极普通的寻人启事，实际上却是极不寻常的。“叔安”是潘汉年，他给南京陈果夫的

信中用的就是肖叔安这个化名。黄毅，是陈果夫、陈立夫的代表，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CC派大将之一张冲的化名。登广告是潘汉年和邓文仪在莫斯科约定的潘与陈果夫派的人在香取得联系的办法。

广告见报第二天，潘汉年和张冲在九龙酒店会面。一条联结国共两党的谈判与合作的新的渠道就此打开。

打通这条联络渠道，仅从2月在莫斯科约定到7月在香港见面，就用了足足半年时间。

2月在莫斯科接受回国任务之后，潘汉年稍事准备，即由中共代表团干部欧阳新护送（潘汉年不懂外语。欧阳原是潘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的助手，来苏已久，由他护送，既当翻译又当向导很合适）前往列宁格勒，从那里乘船去希腊，绕道回国。不料船离列宁格勒不久，共产国际急电要他们中途靠岸时速返莫斯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希腊政治情况发生突变，他们将无法在希腊港口安全上岸。直到4月初，组织上重新决策，让当时正在莫斯科逗留的胡愈之陪同潘汉年一道回国。这次是以旅游者身份乘国际列车取道巴黎，转赴马赛再乘船直达香港。因有胡愈之陪同，语言方面没有困难，胡是精通外语的。胡愈之原是中共秘密党员，不久前才从上海经香港、巴黎，赶到莫斯科，任务是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报告，经过杜重远的积极工作，已争取到张学良决心联共抗日的情况。因为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已久，胡愈之获得情报后无法直接向中央报告，只好舍近求远，去向中共驻莫斯科的机构传递信息。可是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和长征途中的中央也已中断联系。潘汉年还是半年多之前，即1935年9月，和陈云一起从长征途中辗转了很久，才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有关状况的。潘汉年回国的主要任务是去南京和国民党当局进行联络，另一重要任务便是设法到西北去找到中共中央。为此，他在回国之前，还由卢镜如陪同到“国际”机关去用强化记忆的方法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新编密码，以便回国后提供中央机要部门使用。

潘汉年和胡愈之在上海左翼文化运动时期就已相识，这次同行，组织上事先交代，以后胡的工作由潘直接领导。朋友加同志，两人在漫长的旅途中倒也减少了寂寞，他们多次倾心长谈，从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5月末到达香港，潘汉年立即给南京的陈果夫发出信件，要他派人到香港联络。与此同时，他又派胡愈之到上海，去了解目前中共在沪组织活动情况，并进一步打听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的情况。

潘汉年是一位勇于开拓的干部。他在香港等待南

京和上海方面的情况时，不失时机地展开了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他先后拜访或约见了当时在港的各方面人物，包括救国会的成员邹韬奋、陶行知，原十九路军的陈铭枢、蒋光鼐，桂系驻香港的代表王公度、刘仲容，以及梅龚彬、胡鄂公、钱铁如、叶挺、柯磷等一批朋友和同志，一面向他们了解目前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状况，一面积极宣传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准备和国民党进行谈判合作的意向。当时在港的一般进步人士的思想认识，还停留在福建事变前后提出的“反蒋抗日”的口号上，一些人还在酝酿联合西北各军事力量进行反蒋抗日的统一行动。潘汉年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和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建议他们突出抗日的大目标而不要强调反蒋的要求，以便创造条件争取实现联蒋抗日的目的。例如救国会当时提的口号就比较“左”，而过“左”的口号对于统一战线的形成是难以起积极作用的。潘汉年便说服在港的邹韬奋、陶行知，让胡愈之帮助他们按《八一宣言》精神重新起草了一个文件：《告全国同胞书》。这一文件拿到上海后，沈钧儒签了名，章乃器却嫌文件过“右”而不签名，坚持要改。这一文件被转送到陕北，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名义给章乃器等救国会领导人写信作了解释之后，才形成共识。

派往上海的胡愈之很快就完成了预定的任务：“他通过关系找到了刚刚从陕北派到上海不久的冯雪峰，将潘汉年到达香港和此行所负的重要使命告诉了冯。冯便迅速赶到香港去向潘汉年介绍了他从陕北到上海前后所了解的情况，并告诉潘说，上海和陕北之间已有秘密电台可以直接联系，从西安到陕北去也已经有秘密交通渠道。

但是，写给南京陈果夫的信却迟迟未得回应。直到7月的第二个星期，才见到《生活日报》上的那则广告。

原来，陈果夫和陈立夫收到潘汉年发自香港的信件之后，并没有采取积极行动立即派联络人员前往香港。原因是复杂而微妙的。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二陈，尤其是陈立夫，确实比较倾向于主张停止剿共内战，和中共进行谈判，促成联合抗日的。但他们也知道反对这一主张的还大有人在。而蒋介石当时在“攘外”与“安内”问题上还远没有做出明智的决断，依然在坚持剿共的旧政策轨道上运行着。他当时正在洛阳前线亲自指挥剿共战争，声称不解决共党的“武装割据”决不停止军事行动。因此，二陈虽自去年秋季以后就采取了一系列的秘密行动设法沟通和中共的联系渠道，为谋求通过谈判停止内战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他们也不想操之过急，立即打开谈

判的大门。他们事实上还处在一种政治试探的过程中，只想先了解一下对手的谈判价码，更寄希望于蒋介石的剿共军事行动获得顺利进展以便增加国民党方面的谈判筹码。他们还担心，一旦把中共的代表请到南京，消息传出去不仅会受到一些顽固人物的非难，而且可能会引起蒋介石的责怪，说干扰了他的军事决策。因此，在收到潘汉年的信件后，他们没有立即回复。但他们也清醒地知道，已经打开的联络渠道，决不能轻易放弃。他们认识到，谋求和中共谈判解决国内问题，事实上已经是国民党摆脱被动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他们和中共的秘密联络行动，实际上已经得到了蒋介石默许，只是眼下还没有形成非立即谈判不可，除此别无选择的政治气候而已。经过再三斟酌，决定采取低姿态，以不紧不慢的节奏和中共代表接触，既可以讨价还价，又留有余地。

这样，到了7月初，二陈才派出了他们的代表张冲，前往香港迎接潘汉年。

## 南京——潘汉年抵达后被安排在扬子饭店住下

张冲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是位颇为能干又比较开明的人士。他原是一热血青年，投靠国民党实力人物陈果夫、陈立夫，成为CC派的得力干将，深受器重，直到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他思想敏捷，头脑清楚，较早地认识到国民党实行坚决反共政策不会有根本的出路，而主张停止内战和中共实行合作。后在国共谈判期间曾秘密访问过陕北，并会见了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人物，受到了积极的影响，更使他确信反共剿共的政策不可取，进一步增强了必须和中共实行联合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信心。此后，他一直是一位热心促进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多次参与沟通联系和谈判活动，和中共方面建立了较深的关系。后来不幸病死于重庆时，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曾亲往吊唁。

在香港九龙酒店会见之后，张冲便请潘汉年随他一起前往南京。轮船从香港到上海足足航行了三天。潘汉年和张冲同处一室，他们虽然是分属于对立政治集团的代表但又都是具有相当政治素养和文化素养的人物，即使是初次接触，也不能不进行适度的交谈。张冲首先向潘汉年坦率地介绍了自己的重要经历，并且毫不隐讳自己的思想政治观点。他说，他曾经信仰过共产主义。大革命后在哈尔滨做过一段时间的地下工作。后来被当局逮捕坐了监狱，是国民党把他从监狱中释放的。从此他便信仰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服务。

潘汉年也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经历与观点。他说：“我信仰共产主义已有十年。我原是个文学爱好者，也写过作品，编过刊物，希望用文学为改造社会人生服务。但我后来更相信革命是改造社会与人生的最有效办法，我因此也就放下了文学，专门干革命了。我去过江西，参加过长征，到过莫斯科，现在奉命回国和国民党联络，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达到联合抗日的目的。抗日是我们共产党人当前的主要奋斗目标。谁赞成抗日，我们就同他联合，并不问他信仰什么主义。”

张冲说：“我个人赞同你们这个观点。当前主要的任务是停止内战联合起来抗日。信仰的不同不应成为联合抵抗日本侵略的障碍。在强敌压境的危机严重之际，我们没有理由继续内战下去而不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潘汉年觉得张冲对联共抗日的态度是积极的诚恳的，便又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对他讲述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和重要的方针政策。张冲则表示国民党当局已经在重新检讨原有的政策，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政府正准备和苏联修好，争取苏联援助中国抗日。也准备和中共进行谈判解决国内问题，把全国的力能统一联合起来对付日本侵略。

这两位国共谈判合作的联络代表，经过数日的朝夕相处和坦城的交谈，彼此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后来在多次的接触与谈判中，他们也一直以诚相见，比较友好。1939年春天，潘汉年从延安去香港途经重庆时，当时在蒋介石手下管苏联军事顾问工作的张冲仍然热心为潘汉年弄飞机票，亲自到机场送行。

抵达南京之后，潘汉年被张冲安排在扬子饭店住下。过了一天，张冲到饭店对潘汉年说，他已将潘的到来向陈果夫、陈立夫先生报告了。二陈要他向潘先生转达的意见是：

一、他们对于潘先生回国奔走国共合作谈判表示热诚欢迎。潘先生在南京的安全绝无问题，但请潘先生不要外出活动，保守此行的秘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二、他们目前还不便向蒋先生报告国共谈判的事情。因为蒋先生现在不在南京而在洛阳前线指挥战事；

三、他们决定派曾养甫作代表先和潘先生进行初步会谈，以便同潘先生交换一些国共双方关于谈判的意见。等潘先生去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等诸位先生见面，并将中共方面的具体谈判意见带来南京之后，再进行正式谈判。

几天之后，潘汉年和曾养甫就在扬子饭店进行了初步会谈。曾养甫也是二陈手下的大员，CC派的骨干人物。当时任铁道部次长，一直以从事实业和建设方



## 殒星篇

YUNXINGPIAN

面工作为主。由他出面和中共代表会谈，据说是有助于掩人耳目，便于保密。会谈中，潘汉年首先向曾养甫转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三条主要意见，即：（1）立即停止内战；（2）必须释放所有的政治犯；（3）军队实行联合抗战。曾养甫表示，他将把这意思报告给国民党中央。接着，他代表陈果夫、陈立夫向潘汉年转达了两条意见，即：（1）国民党对于抗日是有决心的，但需要做好准备。蒋先生反对空谈。目前外交问题敏感而险恶，希望中共方面不要利用目前的秘密接触搞对外宣传；（2）国民党认为，国共合作谈判中最重要的是解决军队问题。欧洲各国共产党都没有武装，而中共目前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中共能否象北伐时期那样，不搞军队只搞政治活动。曾养甫最后说，请潘先生把这两条意见向在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先生等报告。等陕北有了具体意见后再通知国民党中央。国民党方面仍由张冲负责和中共进行联络。

和曾养甫会谈结束后，潘汉年便结束了这次神秘的南京之行。他立即赶到上海进行前往陕北的准备工作。他和冯雪峰一起研究了去陕北的交通路线，并决定请在西安负责交通工作的刘鼎到上海来一趟，以便共同做到妥善安排。

在等待刘鼎来上海的空隙时间里，潘汉年又抓紧时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他通过地下党的联系，分别会见了宋庆龄、沈钧儒等上层民主人士，向他们介绍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得到了他们的理解与赞同。不久，刘鼎应约到了上海。潘汉年和刘鼎几年前在中央特科曾有过一段共事的经历，关系颇深。他们一别数年，此番相见倍感亲切。潘汉年简要地向刘鼎谈了他此次回国以及即将赴陕北的主要任务。刘鼎则向潘汉年详细介绍了目前经西安去陕北的交通路线，同时汇报了他目前在西安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红军与张学良之间的联络工作。

在刘鼎的陪同下，潘汉年8月初到达西安。他在西安停留了两天，然后根据刘鼎的具体安排，由东北军护送穿过军事防线，于8月8日抵达了当时中共中央驻地保安。

## 保安——1936年，聚集了一大批 中国革命的精英人物

位于延安西北百余公里的保安，原是一块偏僻落后的土地。但在1936年至1937年间，这里却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领导机构所在地，聚集了一大批精英人物，策划着中国革命与未来的命运。

潘汉年于1935年春奉命离开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队伍，时隔一年半，他又在保安这偏僻角落回到了党中央和红军的中枢机关。这一段时间政治风云变幻和他个人的艰辛跋涉，使他感慨良多。他没有和红军一起走完长征的全程但却经历了一条也许是同样险阻的长征之路。离开红军时，他是扮做商人，混在一群不法商人和鸦片烟贩子当中，偷越层层封锁线，从贵州经广西、广东长途奔波到香港的。然后又经上海、海参崴赶到莫斯科。整整费了半年多的时间。此次由苏联回国同样经历了许多周折，历时半年之久，才回到党中央和红军队伍之中。

潘汉年在保安受到了中央许多领导人亲切热情的接待。他是自1934年秋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央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以来第一个恢复了直接联系的使者。他带来的新编密码，重新沟通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令人鼓舞的事。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被孤立和隔离近两年之后，终于冲出了国民党的军事和政治重围，走出了困境。潘汉年被特意安排和张闻天住在一起，以便向这位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详尽地汇报莫斯科的一切以及他南京之行的经过。

潘汉年到达保安后的第三天，中央于8月10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潘汉年汇报的关于他在莫斯科接受指示以及在南京和国民党当局初步会谈的情况。毛泽东、周恩来都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中国国民党。并且同意周恩来在会上的建议，决定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

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8月25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9月15日，中央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了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的问题。潘汉年列席了会议。

会后，张闻天通知潘汉年，要他准备起程前往南京与国民党继续进行联络与谈判。毛泽东这时正忙于战事。他在前线特地给潘汉年发了一份电报，指出“南京政府已确实开始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电报说“现急需兄去南京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谈判方针亦须面告”。潘汉年离开保安之前，在听取了张闻天的谈话后，又分别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住地，接

受了他们的具体指示。

9月24日，潘汉年携带着《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简称“八项条件”）以及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亲笔信等重要文件从保安出发。临行前，中央又指示他途经西安时去拜访一次张学良，代表中共向张介绍中共中央最近决定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尤其要说明从联合反蒋抗日到争取联蒋抗日策略转变的意义，说服张“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同时要和张学良一起商讨蒋介石正企图将东北军调离西安开往福建的对策。

和潘汉年一起离开保安前往西安的，还有一位中央大员叶剑英。他是奉命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和张学良谈判有关军事防务的。和这位红军儒将结伴同行，潘汉年颇不寂寞。他们一路上谈了许多彼此感兴趣的问题。

在西安，潘汉年原计划立即会见张学良。不巧张患牙疾就医。潘只得等候，并给张冲发电，说明要在西安逗留几天，不料张冲接电后立即飞抵西安，找到潘汉年，询问中共领导对国共合作谈判的最新决策精神。潘觉得张冲对国共合作的态度积极热诚，也就坦率地向他介绍了中共中央最近决定的有关国共合作谈判基本方针和各项条件，以及目前陕北的大概情况。

大约一个星期后，张学良牙疾痊愈，潘汉年在孙铭九、苗剑秋的陪同下会见了张学良。他向张详细地陈述了中共中央最近确定的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方针和基本条件，并转达了中共希望张学良将军“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争取国民党政府能够转到抗日的立场上来。他们又共同讨论了对付蒋介石准备调东北军去福建使东北军和红军完全脱离接触的企图，认为必须采取积极灵活的办法，不让蒋的隔离与孤立东北军的企图得逞。

在此期间，叶剑英也会见了张学良，就军事防务问题进行了讨论。

10月5日和7日，潘汉年和叶剑英两次联名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电报，报告他们在西安与张学良分别会谈的情况。

为了尽快将陕北中枢的精神向在上海的上层民主人士转达，潘汉年在离开西安到达徐州中转津浦线火车时，提前给南京的张冲发去电报，请他到浦口见面，他本人将不在南京停留。

当火车到达浦口时，张冲果然已在迎接。潘汉年将保安带来的几份需要交给国民党当局的文件亲手交给张冲，让张转达。潘说，他将在上海住下来。南京方面在研究了中共的这几份文件之后有什么答复和建议，请及时和他联系，他将和他联系的地址与办法

告知了张冲。随后，潘汉年就过江直接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 上海（一）蒋介石和陈立夫 都把形势估计错了

潘汉年是继4月间陕北党中央派冯雪峰来上海之后的第二位中央代表。冯的主要任务是恢复联系、了解情况。潘这次来却肩负着更重大的多方面的使命。

潘汉年除等待南京国民党当局的消息外，首先抓了中共的组织建设工作。按照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央驻上海办事处机构。他被任命为办事处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办事处迅即开展了工作。

潘汉年还积极展开上层的统战活动。他首先会见了宋庆龄，向她面交了毛泽东的信件，并按照毛在保安时的嘱托，向宋庆龄“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意见”，和宋一起“商酌公开活动的办法”。同时约定以后由地下党员李云（祝秀贞）担任他们之间的交通联络任务。接着，潘汉年又将毛泽东致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救国会领袖人物的信件亲自交给他们。毛在信中特别写道：“托汉年先生与诸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先生的热烈希望。”并将中共中央最近讨论决定的方针政策，一一向他们介绍，并征询他们的意见。事实上当时在“反蒋”还是“联蒋”问题上，党内外还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说服党外上层民主人士中的不同意见，并不简单。

不久，张冲到上海邀请潘汉年去南京和陈立夫见面。到南京后，潘被安排住在中央饭店，第二天，就由张冲陪同到陈立夫官邸和陈正式见面。陈对潘再次来南京联络表示欢迎之后说：“你带来的几份文件，我们都已拜读了。现在已经呈报到蒋先生那里。蒋先生还没有正式召集会议研究谈判的具体条件。今天，我想先谈一谈我个人的一些意见，请你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诸先生转达：（1）对抗日，我们是有决心有打算的。但不能空谈抗日，而应当做好准备。没有准备好，只是宣传空谈，反而会被日本人所利用。（2）贵党文件提出的组织抗日联军的建议，好象是两个国家在谈判，这使我们感到不解。西欧各国都有共产党，但都没有军队。中共既有军队，又有所谓苏维埃政府，形成了一种‘割据’状态。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3）我们的意见，是希望中共放弃这种‘割据’，交出军队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抗日。至于中共的干部和毛泽东、朱德等先生的位置那好解决。干部可以适当安插，毛泽东、朱德等先生如感不便，可先出国考察一个时期。”

陈立夫的这些意见，反映了国民党决策层虽然表示愿意谈判国共合作，但反共的立场并没有丝毫改变。他们迫于国内外形势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做出准备和中共谈判实行联合抗日的姿态，但又企图利用联合抗日的名义将中共的武装力量瓦解，将中共的根据地政权取消，迫使中共在国民党统一领导下成为国民党政权下的附庸力量。

对于陈立夫所谈的意见，潘汉年当场并未直接批驳。因为陈声称这只是他“个人的一些意见”具有某种试探性质。潘这时的主要任务是联络，是以联络代表身份工作的，因而也就没有就谈判具体条件问题同陈立夫争辩。他只表示可以把陈的意见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转达。

和陈立夫首次会晤后，潘汉年立即返回上海，他一面将与陈的会晤情况电告陕北中央，一面继续在上海开展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并不理睬陈立夫所说的“不要空谈宣传抗日”的要求。

中共中央根据潘汉年报告和形势的最新发展，决定正式委派潘汉年为谈判代表。1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打电报给潘汉年，要他以中共代表身份邀请陈立夫到上海举行正式谈判。

11月10日，陈立夫应邀到上海沧州饭店和潘汉年会谈。这次潘以中共谈判代表身份首先发言，他以中共中央拟定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为依据，对各项条款作了具体的阐述，其主要内容包括：立即停止内战，联合进行抗日，释放所有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等。他最后指出，中共希望以上各项条款作为谈判的基础。国民党方面当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条件。

陈立夫这次也以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政府的代表身份发表正式意见。他说：“我们的意见，主要就是军队和政权的对立并存问题应当解决。既然中共表示要开诚合作，那我们的条件就是：现在和政府对立的中共政权和军队都应当取消；中共的红军可保留三千人由政府统一管辖，红军师长以上的长官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再召回录用。”陈立夫最后说：“军队问题如能这样解决，则中共所提的其它各项要求就都好办。”

针对陈立夫所提的上述意见和条件，潘汉年当即指出：“这是蒋先生仍站在剿共立场上收编红军的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为什么目前仍有此设想？大概是误以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了，或者就是受困于日本防共的提议？”

陈立夫见潘汉年态度如此强硬激烈，不愿造成僵局，马上又改变语气转移话题。他对潘汉年说：“你我均非军事当局，谈判也难有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先生出来，蒋先生愿意和他面谈。”

潘汉年说：“如果不把贵党的条件向他报告，仅说蒋先生愿意见他，岂不是要把他骗出来。我想他是不会出来的。”

沧州饭店的这次谈判实际上毫无结果。潘汉年立即将和陈立夫的谈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张闻天在联名给潘汉年的复电中强调说：“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沧州饭店谈判情况表明，蒋介石政府企图瓦解和收编红军，是他误以为红军已到了无力作战的地步。中共中央为了配合谈判，决定在军事上进行必要的反击，以显示红军的力量不容轻视。迫使蒋放弃收编红军的企图，停止内战。11月18日，中央军委下达粉碎蒋军进攻的命令。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11月21日在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歼灭了胡宗南部一个整旅又两个团，达到了预期的军事与政治的双重目的。

蒋介石也是军事和政治双管齐下的。他一面部署三个师的兵力“围剿”红军，一面又由陈立夫出面邀请潘汉年于11月19日举行又一轮会谈，企图在军事压力下迫使中共让步就范。会谈中陈立夫仍然坚持原先提出的无理要求，潘汉年则坚决拒绝。至此，国共谈判似已无法继续下去。不过张冲一再向潘汉年表示，谈判不宜中断，双方仍应保持密切联系。

根据潘汉年报告的谈判情况以及各方面的反映，中共中央12月8日致电潘汉年时指出：谈判显无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之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的让步”。

这一段时间的国共谈判所以无法获得进展，原因就在于蒋介石一直坚持他的那些无理要求。他始终不愿放弃消灭中共的目标。即使军事上达不到目的，也需在谈判中施加压力，企图瓦解红军，取消根据地，在事实上达到“溶共”“灭共”。周恩来后来在谈到这一段时间谈判所以未能取得突破的原因时说：“国民党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的呢？那时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想法。”陈立夫后来在回忆这一段时间的谈判时也说：“那时候的情形，我们好象是接受中共投降，他们只要我方停止剿共，提其他条件，他们都可接受。”

蒋介石和陈立夫都把形势估计错了。

## 上海（二）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潘汉年的精明和干练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蒋介石的顽固态度受到了历史的惩罚。就在国共谈判陷入僵局

之际，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在西安，但在上海的潘汉年却因此而紧张忙碌起来。中共中央在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并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参与协商后，迅即将中央精神电告上海，要地下党及时向各阶层人士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以争取各界人士的理解与支持。12月19日和12月21日，毛泽东接连两次给潘汉年发电报，要他主动与南京政府洽谈有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并重申国共合作的基本条件。

南京一度陷入惊慌失措状态。宋美龄惊魂稍定，就请阿哥宋子文赶到上海会见宋庆龄，希望从这位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阿姐那里打听到中共对此事变的立场与对策。宋庆龄紧急约见潘汉年，潘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及时做了说明。

陈立夫也派人到上海向潘汉年探听有关情况。CC作为国民党中央情报中枢机构，对于此次事变事先竟一无所知，没有发出任何先兆性的警报，致使蒋介石突遭打击。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一次重大挫折。

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又及时赶到南京去分别会见了宋子文兄妹以及陈立夫先生。向他们再次转达了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实现国共合作的基本条件。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12月26日终于签订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各项协议，其中包括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中共早就提出的重要条款。

协议是签订了，但贯彻落实却大费周折。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同意签订协议，但又不甘心于此次的挫折而及时认真地履行协议。他在回到了南京之后不仅背信弃义扣押并审判了张学良，而且继续派重兵进逼延安，准备讨伐异己。内战的阴云密布，东北军内部此时已发生了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严重对立。中共不得不以大局为重，继续向各方进行艰巨的说服工作，努力争取使一纸协议变成事实。

1937年1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嘱他通过各种渠道敦促蒋介石政府实践诺言，履行协议。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从西安给潘发电，要他去和宋子文取得联系后速去西安报告情况。潘汉年在张冲的协助下，乘国民党军用飞机赶到西安，稍事逗留又急返上海。

1937年1月5日，张闻天再次给潘汉年打电报，向他部署一系列任务，包括：通过关系向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活动，要他们促进解决西安事变协议的实现；向宋子文做工作，要宋“继续担负调解责任，表示我们拥护他调解的诚意”；通过杜重远从熊式辉那里了解何

应钦等亲日派目前动向。潘汉年接到电报后迅速展开活动，积极完成上述各项部署，并很快就向张闻天复电报说：“已请大姊（指宋庆龄）同宋子文说项，设法由他负责调停”，“已派人去孙（科）冯（玉祥）处活动”，“已嘱杜重远、叶挺设法往南京”。

为了尽早促成和平协议的实现，中共方面在具体问题上还做了一些主动的让步。1月25日，毛泽东给潘汉年发电，要他向国民党当局表示“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要求”，但要求给红军“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同一天，周恩来又给潘汉年发电，要他敦促蒋介石政府保证在和平解决问题之后不再发动战争，并要求蒋先生手书保证以消除各方疑虑。

在中共和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贯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协议的许多障碍终于逐步消除，一度出现的危机也随之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新的国共合作，终于出现了转机。1937年2月下旬，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经过宋庆龄、何香凝等左派人士的努力，通过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联合抗日的相关决议。

随后不久，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等在西安进行了国共合作的实质性谈判。3月下旬，蒋介石邀请周恩来来到杭州会谈。去杭州之前，周恩来在上海让潘汉年将中共方面所提出的有关国共合作的15条具体意见先选交宋美龄，请她交给蒋介石，为会谈作好准备，然后，周恩来由潘汉年陪同前往杭州和蒋进行谈判。

蒋同杭州谈判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双方在若干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原则的共识。随后，蒋介石指定陈立夫、宋子文，周恩来派潘汉年，就政治合作和红军经费预算等具体问题分别进行洽商、谈判，到“七七”事变前，上述具体问题的谈判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并达成了一系列协议。

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基本上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体上形成。

大量资料显示，自1936年春自莫斯科受命回国到1937年夏在上海、南京和陈立夫、宋子文谈判取得了一系列的结果，潘汉年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可以说是历经艰辛的，尤其是在西安事变前后几个月非常困难而又特别紧张的时间内，他成了陕北中枢机构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之间一条最重要的联系“热线”。他肩负重任，风尘仆仆地活动于上海、南京、西安、保安等地，辛辛苦苦周旋于敌、我、友以及各方实力人物之间；或苦口婆心，或唇枪舌剑，为贯彻执行中共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落实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各项决议，推动新的国共合作的实现而竭尽全力。

潘汉年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所做的重要贡献，不仅受到了中共许多领导人的表扬，凡是和他有过接触同他打过交道的人们，对他也是深为赞许。宋庆龄、沈钧儒等进步朋友固不必说，他们和潘汉年之间从那时起便建立起真诚友好的关系；就是国民党当局的一些当事人如陈立夫、宋子文、张冲等，也不能不承认潘汉年的精明干练和积极负责的工作精神，并对他表示钦佩。



●马歇尔一面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谈判，一面同国民党策划向解放区进攻。





●周恩来和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延安

## 尾声

### 一. 历史是曲折的

1963年1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一份刑事判决书上写道：被告人潘汉年从1936年起叛变革命，投降了国民党，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内奸活动。1936年4月被告人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从苏联回国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国共谈判联合抗日的意见。被告人到达香港后，竟秘密写信给国民党中委和中统局特务头子陈果夫要求会见，随后由该局另一特务头子国民党中委陈立夫指派特务张冲到香港和被告人联系，被告人向张冲密告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和具体条件，交了自己的履历，秘密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国民党特务。被告人充当了国民党特务后，同陈立夫及其部下张冲等保持密切联系，供给了国民党有关中共在国共合作中同国民党斗争的策略，以及陕北红军人数、物资供应情况，红军与东北军前线情况等许多重要情报……

### 二. 历史毕竟是公正的

1982年8月2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写道：关于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

党”的问题，经复查，1935年8月1日，我党发表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宣言以后，南京国民党当局曾派其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多次会谈。潘汉年同志当时正在莫斯科，也参加了这些会谈。随后，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他回国找陈果夫、陈立夫合谈国共抗日合作事宜。潘汉年同志回国后，一面同国民党当局联系，一面通过党内秘密交通关系，到达陕北，向中央报告了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争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意见，以及与国民党取得联系的情况。不久，中央就决定派他带着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的信，去南京进行谈判。这段经历是完全清楚的，党中央是完全了解的，潘汉年同志在1936、1937年间，是我党同国民党方面谈判的正式代表。当时，他与陈立夫、张冲等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经常联系国共谈判的事宜，根据中央1935年《八一宣言》和其它通电的精神，向他们谈了我党对国共谈判的方针和条件，介绍自己的一般经历，均属于正常来往和正常工作范围，并没涉及党的机密。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根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当时的文电档案材料证明，他是坚定地按照党中央的谈判方针行事的。在此后几十年中，也无任何事实表明，潘汉年同志有勾结国民党给我党造成危害的行为。因此，所谓潘汉年同志“秘密投降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的罪名，根本不可能成立。……

尹驥：中国警官大学教授，《潘汉年传》作者。



# 1954年

● 李威海

1954年9月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人代会上，达赖当选为副委员长，时年十六岁；班禅当选为常务委员。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班禅当选为副主席，时年十九岁。之后，达赖、班禅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在全国各地参观视察，翌年5月返回西藏。

达赖、班禅两位活佛同时到祖国首都北京还是第一次，具有历史意义。

## 达赖、班禅

### 达赖当选副委员长

1954年9月15日下午，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就要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了。这天，达赖、班禅都装束一新。达赖身穿紫红色绣金龙袍，班禅则着金黄色镶绣圆形传统图案的长袍，胸佩鲜红的代表证。两人并肩走进礼堂，代表们向两位年轻的西藏宗教领袖投来亲切的目光，达赖向代表们不时地报以微笑，班禅却神情庄重地低头看着胸前佩戴的代表证，小心地把它扶正。

达赖、班禅在翻译彭措扎西的陪同下来到休息室时，屋里也有不少人，彭措扎西尽自己所知轻声告诉达赖、班禅，哪些是开国元勋，哪些是解放军高级将领，哪些是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哪些是誉满中外的科学家和学者。这些人都是主席团的成员。

“叮玲玲……”入场的铃声响了，达赖、班禅随着主席团的成员向入场口走去，彭措扎西告诉他俩说，自己去翻译室工作了，即离开。主席团成员见他俩来了，都友好地笑着闪在一边请他俩先行。



●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副委员长。

## 进京写真

一进场，他俩有些发愣，只见主席台上有上百个座位，自己该坐在哪里呢？这时两个扎着长辫子的姑娘笑吟吟地迎上来为他俩引座。他俩坐好后，环顾全场，见主席台除第一排空着外，其它座位均已坐满，他俩感到能与各族各界代表在这里隆重聚会，共同讨论国家大事，非常荣幸。

达赖发现自己面前的桌上，有一副小巧的耳机，便拿起试着塞在耳朵上，耳机里传出彭措扎西熟悉清晰的声音。啊太好了，有了这个玩意就不愁听不懂代表们的发言了。他用目光在礼堂里搜寻彭措扎西的身影，他找来找去却找不着，只好作罢。

班禅兴奋地在座位上左顾右盼，啧啧嘴唇觉得有些口渴，他摸摸摆在面前的青瓷茶杯，杯子竟是热的，服务员已经倒好了水，他掀开杯盖，一股浓香的奶茶味扑鼻而来，啊！太好了，是谁想得这么周到，连藏族爱喝的奶茶都考虑到了。班禅轻轻喝了一口，好香的奶茶，香在嘴里，甜在心里。

突然，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热列掌声。啊！是毛主席来了，他俩也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毛主席笑容满面，一身灰色的中山服贴地穿在身上。刚修饰过的头发使他显得格外精神，毛主席边走边鼓掌，不时地向代表们挥手致意。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随在主席身后，依次走过来。毛主席走到台前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全场回荡着他那富有感染力和鼓舞人的巨大声音。

达赖、班禅的耳机里传来彭措扎西的声音，“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毛主席充满自信地抬起头，两眼炯炯有神，全体代表向他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毛主席致开幕词后，刘少奇副主席以宪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这一天的会议直到天黑才结束。

9月20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下午3时，代表们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走进会场，他们期待已久的神圣时刻终于到来了。4时45分开始投票。达赖、班禅填好选票，排在投票的队列里，亲眼看着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依次把手中的票庄严地投入票箱，该达赖、班禅投票了，他们的藏族服饰吸引了众多代表和新闻记者的目光，当他俩投票时，只见一片白光闪烁，记者们在相机中留下了这具有纪念意义的宝贵瞬间。当他们听到大会宣布以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也和全体代表一样起立热烈鼓掌。

9月27日，大会选举国家领导人，这天对于达赖来说应是难以忘怀的日子，他被提名为副委员长候选人，当大会宣布毛泽东、朱德以全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时，全场掌声雷动，全体代表欢呼庆祝。

大会接着宣布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名单。

委员长：刘少奇

副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阿旺洛桑丹增嘉措，赛福鼎·艾得孜。

当公布副委员长名单时，达赖感到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他专注地听着大会宣布名单。怎么没有我？怎么还没有我！当他终于听到自己的名字时，一下子松了口气，当代表们掌声热烈地响起时，他才想起来应当与刚当选的委员长、副委员长一道起立向代表们致谢。作为十四世达赖喇嘛，他是生逢盛世了。自有达赖喇嘛以来，除五世达赖于顺治九年（1652年）到北京会晤清朝顺治皇帝外，再无达赖喇嘛到过皇都（首都）更没有参与过国家大事的领导的，更别提担任国家的高级领导职务



## ●班禅同达赖交谈

了，而他十四世达赖喇嘛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如此重视，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是本着全民族的利益，从西藏地区的建设发展出发来对待他的。

达赖走出会场，深深吸了两口秋夜凉爽沁人心肺的空气，顿觉精神为之一振，抬头看看天，深邃的夜空星光灿烂，达赖心想：这喜讯传到西藏时，僧侣群众及三大寺喇嘛听后，不知该有多高兴呢，该是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笑得不住地眨眼睛吧。

“副委员长请上车”，一声招呼，打断了达赖的遐想。达赖扭头一看，原来是卫士长张效苏请他上车，达赖一愣，副委员长这个称呼对他来说有些陌生。“请上车，副委员长”，张效苏再次请达赖上车，达赖没料到，卫士长这么快就改口不叫他“大师！”了。他很快省悟过来，高兴地上了车。

9月28日，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今天主席台的位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达赖的位置挪到了前排同毛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的位置在一起。他对坐列无遮无拦的第一排，有些不适应。面对上千名代表感到有些拘束。虽然他做为活佛在拉萨举行过无数次盛大的法会，接受过上万人的顶礼膜拜，但哪一次也没让他感到今天这样新奇。

## 达赖险误迎接苏联代表团

1954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的大喜日子。为此，苏联政府派出了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会议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为团长，以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布尔加宁、副主席米高扬为副团长的

最高规格的党政代表团来北京参加国庆庆祝活动。为此，中共中央和政务院也组织了高规格的党政欢迎团到西郊机场迎接苏联代表团。9月29日，达赖接到人大常委会的通知，请他下午到西郊机场迎接苏联代表团。

这是达赖当选副委员长后第一次参加政务外交活动，达赖极为重视，早上就做好了准备，张效苏见达赖在一楼无所事事地等待出发，就对他说：“副委员长，时间还早呢，打两盘乒乓球也来得及”。达赖看看手表，“真的来得及吗？可别迟到了。我是头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晚了可不好。”“没关系，我掌握时间。”“那好，打几盘。”达赖一跃而起，来到乒乓球室兴致勃勃地打了起来。

说起达赖是怎么爱上打乒乓球的，话就长了。达赖原本不会打乒乓球，只因他去参加人代会时在家的工作人员无事可干，就找来一个乒乓球台在楼里打了起来。一次达赖从楼上下来，听见一间屋里热闹异常，传出阵阵呼喊声和乒乒乓乓的声音，好奇地推开门一看，立刻被眼前的热闹场面吸引住了，一个雪白的、小小的圆球被两人飞快地推来挡去，来回跳跃，真是太有意思了，而打球的人兴致勃勃，浑身大汗，气喘吁吁，乐此不疲。他不禁也想试试，达赖年轻气盛，好动好玩。他接过球拍，拉开架式紧盯着对方手中的球，对方是达赖的一名卫士，他知道达赖从未打过乒乓球，就发了个好接的和平球，谁知就是这和平球达赖也未接起，他抡起球拍狠狠地拍了一下，却连个球边也没碰到。达赖和工作人员一起笑了起来：“不算，你再发个球。”达赖拾起球扔给对方，对方又发了个和平球。这次达赖看准来球，挥起拍子狠狠地抽过去，欲将球一拍打死。谁料乒乓球从拍子边缘飞了出去，不偏不斜正好打在一旁观战的工作人员的鼻子上，人们禁不住放声大笑，达赖也笑着连声向被挨打的人道歉！然后拾起球继续开战。周围观战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后退了几步，以防不测。

达赖毕竟年轻，学东西较快，身体也灵活，没多久就可以与人打上几个回合了，虽然是输多胜少，但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兴趣，以后他没事总要叫上工作人员陪他打几盘。

张效苏一边打球，一边偷偷看腕上的手表，生怕错过了时间。距苏联代表团到来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张效苏接住达赖发来的球说：“副委员长，时间到了，别打了。”他计算达赖擦擦汗，洗一洗，时间也来得及。那时北京街上车稀人少，乘车到西郊机场也就十几分钟时间。

“好，不打了。我马上就来”。达赖放下球拍跑上楼去。

张效苏马上通知司机和其他随行人员做好准备，达赖一出来就出发。谁知过了几分钟还不见达赖下楼，张效苏着急了。他蹬蹬跑上楼到达赖卧室一看，没人，到

会客室看看也没人。看看卫生间的门关着，张效苏敲敲门喊：“副委员长，副委员长！”“等会儿！”达赖在里面瓮声瓮气地回答，听声音是在解大手。坏了，这下起码要耽误几分钟。达赖早不解，晚不解，偏偏在这个时候解手！张效苏急得一下子出了一身汗，事先他可没把达赖大便的时间留出来呀。可他又不便催促达赖，在门外急得顿足踱步。

又过两三分钟，随着一阵水箱的响声，达赖边整衣襟边走出卫生间，他也意识到可能晚了，急匆匆地下楼，问张效苏：“晚了吧，咱们快点开。”

达赖刚钻进车里，张效苏就“嘭”地一声带上了门，迅速钻进前排座对司机钱映文说：“老钱，要晚了，看你的了，一定要及时赶到机场！”

钱映文点点头：“你帮我看着点儿路上的情况”。

吉斯轿车箭一般地开了出去。此时离苏联代表团到达时间已不足十分钟了，张效苏和钱映文心急如焚。这时就看出吉斯车的优越性了，它车体宽大，底盘沉。行驶平稳，油门一踏里程表的指针就指向100公里以上。钱映文一路上不断地鸣喇叭，老远就催促行人车辆让道。建国初期北京街上的汽车还很少，交通基本畅通，加上沿途路口警察都知道今天有重大活动，见吉斯车狂奔过来一路给绿灯放行。

车上，钱映文咬着牙，瞪圆了眼睛全神贯注地开着车，张效苏不时看看手表，计算着时间。达赖从未坐过这么快的车，紧张地握住车里的扶手。车到公主坟转盘，一辆大卡车在前边堵住了去路。“笛笛笛”钱映文急促地按动喇叭催促卡车闪开，可卡车却像没听见似地依旧慢吞吞地开着。

“妈的，小子不想吃这碗饭了！”从不骂人的张效苏也着急地吐出一句气话。

吉斯车几次想超过卡车都未成功，气得钱映文把喇叭按下就不抬起来了。

前边路口值勤的警察见卡车挡住了吉斯车的路，急促地挥动手臂命令卡车让路停在路边。卡车只好乖乖地闪在路旁。

吉斯车掠过卡车时，张效苏打开车窗冲警察喊了一句：“扣住这个混小子！”这才感到略微平静些。

吉斯车来到西郊机场门口时，苏联代表团乘坐的大型专机也徐徐降落，停机坪上停着上百辆小轿车。“完了，晚了！”这个念头闪过张效苏的脑海，今天是我工作的失职，回去我要做检查。

达赖刚下车，身后紧接着又开来一辆吉斯车，从车上下来的是刘少奇委员长。张效苏暗自庆幸，亏得还超在刘少奇同志前边，否则就糟糕了。

飞机平稳地降落到地面，中国领导人向飞机走去，达赖欣喜地一眼就看到人群中得班禅，正好班禅也看到

了达赖，两人相视一笑，点头招呼。

飞机舱门开了，身材敦实、头发稀疏的赫鲁晓夫首先走出舱门，他高兴地笑着，挥动着手中的帽子向前来欢迎的人们致意。接着布尔加宁和米高扬也走出舱门；刘少奇、周恩来率党政各部门领导人迎上前去与苏联贵宾热烈握手拥抱，接着刘少奇为苏联贵宾介绍前来欢迎的各位中国领导人。当介绍到达赖时，赫鲁晓夫眼里闪过一丝惊异的目光，因为他那么年轻，装束又与众不同。随后赫鲁晓夫用刚学会的生硬的中国话对达赖说：“你好！”接着紧紧握住达赖伸过来的纤细的手，达赖觉得赫鲁晓夫的手厚实粗糙，像只钳工的手，他的手被握得生痛。接着赫鲁晓夫又不由分说地把达赖拉过来热烈拥抱。达赖从未接受过如此热烈的礼节，也不习惯这种礼节，尴尬地笑着，赫鲁晓夫却不当回事似地又与下一个人握手。

盛大的欢迎仪式后，由上百辆车组成的庞大车队浩浩荡荡地向城里驶去，这回不用着急了。达赖轻轻地拍拍钱映文的后背：“钱师傅，今天多亏你才没晚了。”钱映文一笑，头也不回地说：“嘿，别提了，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呢，万一出事怎么办？到机场我才觉得出了一身汗”。

## 达赖、班禅登上天安门

10月1日，北京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国庆阅兵和群众游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达赖、班禅也荣幸地被邀，登上了天安门。

清晨，天色刚亮，张效苏和几个工作人员正在院子里做广播体操，忽然看见达赖从楼里走了出来，这段时间通常是达赖打坐诵经的时间，他一般吃过早饭后才下楼，今天不知为什么这么早就下楼了，张效苏立刻迎上去：“副委员长好！今天起这么早呀？”他估计达赖可能因记着上天安门的事，怕耽误了，便对他说：“咱们这儿离天安门近，误不了事。”

达赖情绪特别好，抬头看看高蓝的天空，做了几个扩胸动作：“今天是好日子，睡不着啦，出来活动一下。”

“一块儿做会儿操吧。”

“不啦，你们做吧，我到花园转转。”达赖说完一个人到花园散步去了。

住在畅观楼的班禅也早早地起来了，他浑身上下焕然一新，新洗熨的衣服把他衬托得格外精神，唯恐有什么疏忽，让随从这里伸伸，那里拽拽。一边不停地向卫士长韩立功打听国庆阅兵式是什么样子，上天安门应该注意什么。

吃过早饭，班禅就在楼下的客厅心神不宁地等待出发。到时间了，韩立功一进来班禅就迫不及待地一跃而起：“到时间了吗？走！”说完率先走出楼去。

御河桥达赖寓所的张效苏接到畅观楼打来的电话，说班禅已经出发了。等了几分钟，张效苏也请达赖上了车，估计能与班禅同时到达天安门。两人果然同时到达开安门后的广场。这时已有不少领导人陆续登上了天安门。达赖、班禅也拿出大红烫金的请柬，从天安门东侧的楼梯登上了天安门。

广场上数万人头攒动，上千面红旗挥舞。

9时整，广场上的播音器里同时响起悠扬的乐曲声，广场上的人们沸腾了，翘首仰望天安门，寻找着毛主席的身影。

城楼上的人也一齐把目光投向两侧的楼梯口。来了，毛主席同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陪同苏联贵宾登上了天安门。

此时礼炮齐鸣，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在广场上此起彼伏，毛主席走到城楼中央向广场上的群众招手致意。

达赖、班禅与毛主席有过几次短暂的接触。

军乐队奏出威武雄壮的进行曲，盛大的阅兵式开始了。达赖、班禅看得出了神，班禅却偷闲向城楼一侧的观礼台察看，想找找家人和西藏国庆参观团的代表。他找到了，班禅一眼就从人群中找到了装束特殊的西藏参观团的人员，只见参观团的人们正看得如醉如痴，根本没注意班禅正在看他们，其中一个代表偶一抬头，马上兴奋地转告其他代表，班禅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台上的藏族同胞都不看阅兵了，连连向天安门上的班禅欢呼，使得汉族代表直奇怪。班禅叫过达赖来，两人一齐向藏族同胞挥手致意。西藏参观团的人们见两位佛爷上了天安门，一同和国家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感到非常自豪和高兴。跳呀，叫呀，笑个不停。藏族同胞在观礼台上的欢快情景，吸引了毛主席，毛主席高兴地向藏族同胞挥手致意。一位眼尖的年轻藏族嚷着“快看，毛主席向我们招手了。”“在哪儿，真的吗？”“那不是，毛主席还在招手啦！”藏族们定睛一看，真的，毛主席是向我们招手呢。他们万分高兴，今天见到了毛主席还见到了达赖、班禅两位佛爷，他们真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

## 班禅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4年12月21日，班禅应邀出席了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一次会议。

当班禅走下汽车步入会场时，班禅发现政协委员们要比人大代表的年纪大得多，自己跻身其中更显得年轻。委员们都是党政军首长，民主党派负责人，人民团体的领导和无党派知名人士。还有科学家、学者、文艺界知名人士等。班禅为自己既参加了全国人大会议又荣幸地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而高兴。

毛主席、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了。会场再次出现了人代会上那样热烈的场面。这一点给班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10月25日，政协会议选举第二届全国政协主席和副主席，当班禅拿起笔准备在选票上填写时，看到选票上赫然印着自己的名字，不禁涌起一股热流。当大会宣布毛主席当选为政协名誉主席，周恩来当选为政协主席时，班禅和全体委员一齐起立热烈鼓掌，他认为周总理当选为政协主席是最合适的人选了。从1951年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到这次到北京和周恩来的几次接触，周恩来给班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班禅心中暗想如果自己有幸当选为政协副主席，一定要好好向周总理学习，在他的领导下努力工作。因此当大会宣布副主席的名单时，班禅心情十分紧张，生怕因自己选不上而失去一次向周总理学习为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效力的机会。

“宋庆龄、董必武、李济深……”每当大会主持人念到一个当选副主席的名单时，全体委员就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表示庆贺。班禅一边鼓掌一边心里没底地猜测着，自己还年轻，政协绝大多数委员对自己并不了解，人们会选我吗？虽不是为一席地位而争，但我是西藏至高无上的活佛，选不选上我也关系到西藏民族在国家和全民族中地位呀！他全神贯注地听着主持人念的每一个名字，生怕漏掉每一个字。

“……张澜、郭沫若、彭真、沈钧儒、黄炎培、何香凝、李维汉、李四光、陈叔通……”听到这里班禅可真有点紧张了，都念了十几个名字了，怎么还没有我，莫非真的没选上我！

“章伯钧、陈嘉庚、班禅额尔德尼·罗桑慈勒伦珠却吉坚赞……”听到自己长长的名字后，班禅长吁了一口气，心一下子安稳地放下了。此时他觉得委员们为他庆贺的掌声特别热烈，时间格外长久。身旁的几位委员都热情友好地伸出手来表示祝贺。班禅特别地兴奋，以至于后面公布的包尔汉副主席名字都未曾听见，还是后来别的委员告诉他的。

这次政协会议一共选出十六位副主席，班禅为第十五位，从此班禅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一齐改称他为“副主席”了。

## 虔诚的朝圣者

藏族群众和喇嘛教信徒，以能亲自朝拜达赖、班禅两位活佛受到两位佛爷的灌顶为一生最大的幸事。

当达赖、班禅已启程赴京的消息传开后，全国各地的喇嘛僧众闻讯纷纷携家带口前来北京朝拜活佛，这里以蒙古族为多。蒙古族群众大多信奉喇嘛教，且内蒙古距北京不远，交通方便。当时雍和宫管理委员会的林主

任整日忙碌地接待各地来的朝圣者，雍和宫南院的房子全部腾出来供他们居住。达赖、班禅在京期间，这里接待了大约数百名朝圣者，住不下的朝圣者就露宿达赖、班禅寓所附近的街头。每过两、三天，林主任就与达赖、班禅联系一次朝拜灌顶之事。每逢有佛事活动，北京市民政局就会派几辆大客车接来朝圣者，有的朝圣者朝拜一次还不行，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朝拜佛爷。如果达赖、班禅因为有重大政治活动几天不能接受膜拜，雍和宫就会人满为患。1954年底和1955年初，达赖、班禅到华东和东北参观期间，北京聚集了众多的朝圣僧众倦宿在凛冽寒风中耐心地等待达赖、班禅灌顶，中央人民政府见朝拜僧众生活困难，责成北京市政府发放了御寒衣被和食品，使他们的毕生愿望终于得到了满足。

## 达赖、班禅在京举行法会

当达赖、班禅抵达北京时，惊喜地发现在他们的寓所里已布置好了经房，各式诵经用具一应俱全，经房庄严富丽，两人十分满意。

到北京不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和副会长赵朴初分别拜会了达赖和班禅。

达赖、班禅久闻喜饶嘉措大名，今日相见十分高兴。喜饶嘉措也是一位藏族活佛，他资深广博，对藏传佛教博大精深，深得广大藏胞拥戴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赞赏。

赵朴初则是汉族，他对宗教界的情况十分了解，对佛教理论也有很深的研究，造诣极深。喜饶嘉措和赵朴初与达赖、班禅的交谈非常愉快，话题十分广泛，他们还就如何繁荣西藏佛教交换了看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达赖与班禅的政务活动稍稍少了一些，得以抽空在雍和宫、广济寺和黄寺等北京几个较大的寺庙举行佛事活动。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喇嘛庙，寺庙高大雄伟，金碧辉煌，殿里供奉佛祖释迦牟尼和黄教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全身塑像，还有一尊举世无双的，用根20多米长、8米多宽的松木雕成的巨型佛像，是北京最有影响的喇嘛教寺院和名胜古迹。达赖、班禅到北京后分别在此举行了诵经法会和灌顶仪式。

50年代初期，雍和宫还不对外开放。寺里有为数不多的几十名大小喇嘛和几名政府工作人员。

接到达赖、班禅要来做佛事的通知后，寺里大小喇嘛就忙活开了，把雍和宫里里外外清扫一遍，佛祖的金色擦拭得一尘不染，金光灿灿。备好香火，布好法具，只等两位佛爷驾到。国家民委和公安部等部门对这项活动也很重视。特别是安全问题。一是达赖、班禅的安全，另一个是僧俗群众的安全。由于前来北京膜拜达赖、班禅的人来自祖国各地，成分复杂，未有组织，也没有介绍信，只要愿意参加灌顶仪式，就可以面见达赖、班禅。而

公安部门又不便在宗教活动中进行搜身检查，万一这里面混进一两个坏人，造成恶性事件，后果不堪设想。而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当时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分裂势力都极力反对达赖、班禅到北京，如果他们搞阴谋，造成流血事件，会把赃栽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身上，说是共产党对达赖、班禅下的毒手，以达到造谣中伤，分裂民族关系的罪恶目的，再就是万一没做好僧俗群众的组织工作，参加膜拜的人们急切接受膜拜，万一一拥而上易发生混乱，造成踩踏挤压事故。

民委、公安部及有关部门为此专门开会研究、布置警力和组织实施方案。事先将参加膜拜者集中起来，讲明注意事项，告诉他们不准携包进入膜拜场所，要排成一路顺序进去。公安部门加强了警力，所有的公安人员要换上便衣，随时观察前来膜拜的人员，发现可疑人物马上叫出来询问检查。感到最紧张的还是达赖、班禅的贴身卫士，他们不错眼珠地注视着每个膜拜者，一遇有情况，即立刻采取行动。由于组织严密，措施得力，达赖、班禅在北京及内地举行的灌顶仪式都进行得十分顺利。达赖、班禅十分满意。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政府为此花费了多少气力，公安警卫人员又是担了多少责任。

僧俗群众膜拜达赖、班禅，向他们敬献哈达和钱财表示虔诚的心，佛爷则要给他们灌顶赐福。一般情况下是佛爷亲手灌顶。但太多了就要分等级了。这主要是依据膜拜者的身份地位和供奉钱财礼品的价值来区分。一等的是有一定地位的僧俗官员、喇嘛、居士和富贵人家，达赖、班禅要亲自为他们灌顶。二等的是一般的喇嘛、道士和小康人家的膜拜者，对于他们，达赖、班禅不亲自动手灌顶，而是用栓在棍上的经包或长缨为其灌顶。最末一等就是普通的膜拜者，大多是藏、蒙族的牧民。这类人出身贫寒，供奉物品不多，但心却极为虔诚，人数也特别多。五体投地，匍匐而来北京的朝圣者多为此类人。生活贫苦，他们向往幸福的愿望就越强烈，渴望佛爷赐福于己，来生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尽管他们对佛爷的心分外虔诚，他们献给佛爷的钱财聊无儿。然而佛爷的赐福不是用虔诚的心来衡量的，只以供奉钱物的多少来决定。且这部分人，又都是衣衫褴褛的下层贫苦人民，不便佛爷亲自为其灌顶，就由法台前四个金刚模样的人代佛爷履行职责。他们挥动长长的皮鞭，抽打着这些膜拜者。皮鞭抽打在他们的脸上，身上发出清脆的“噼叭、噼叭”的响声，给膜拜者脸上、身上留下一道道青紫的印痕。皮鞭很长，一次可以抽打到好几个人，这样就可以省却不少时间了，凡挨到皮鞭者，虽痛犹喜，诚惶诚恐，欣喜佛爷已赐福于己，满心欢喜地离去。

做为共产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实在看不惯用皮鞭抽打膜拜群众的作法，但这是宗教活动，不便干涉。于是，民委的负责同志委婉地向达赖、班禅提出建议。说用

皮鞭抽打朝圣者，代佛爷灌顶，只是一种宗教形式，大可不必下手过重给人们带来痛苦，如果皮鞭轻轻扫过人们，不是一样可以表示佛爷赐福于他们了吗？达赖、班禅很开通，说民委提的建议很对很好，以后再让群众来接受灌顶，两位佛爷尽量亲自为群众灌顶，如因人员多，时间紧，需四大金刚代为灌顶时，也不可挥鞭过猛，只须轻轻扫过众人即可。

每隔三、五天在民委等有关部门的配合下，达赖、班禅就为僧俗群众灌顶一次，多数是他俩亲自为群众灌顶，一天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五、六百人，人们皆大欢喜。

## 佛爷摸顶出趣事

1954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北京秋高气爽，艳阳高照，游园的人们发现绿树红墙，碧水荡舟的北海今天与往常有些不同，许多身穿藏袍和蒙古袍的少数民族正兴致冲冲地向白塔聚去，原来西藏活佛班禅来北海了。班禅在大殿前的法台上已坐了一个多小时，他已为几百名膜拜者灌顶，可院门口等待灌顶的人，仍络绎不绝，不见首尾。一个新婚妻子随着队列走近法台，抬眼一看，见班禅坐在法台上，身披袈裟，神情庄重，却未脱净稚气。“活佛还是小孩呀。”女子暗想，就是这个小孩具有无边法力，能赐福给人们？

班禅正一个一个地为人们灌顶。突然觉得红光耀眼，见一个打扮入时的女子也夹杂在行列中走到跟前，心里就暗想，这样的女人也信佛？这时女人走了过来，班禅也为她摸了顶赐福。时近中午，灌顶仪式结束，班禅乘吉甯回畅观楼。

卫士长韩立功正想着，今天来朝拜的人虽然较多，但秩序还满好，没出任何问题。突然传来身后班禅的笑声来。

“大师，想什么呢？”韩立功问。

“今天真有意思，”班禅笑着摇摇头，“你看见没有，

今天有个烫着头，描着眉，还涂口红穿高跟鞋的女的也来让我摸顶。”

“看见了，那个女的特别乍眼。”韩立功当时就在台下守护，当然注意到这个女人了。一般来朝拜的藏蒙族人，都穿着咖啡色或绛紫色的长袍，即便是汉族人，一般也穿中山服或干部服，从没有打扮这么花枝招展的人朝拜的。班禅把这件事当作趣闻向人们叙说，做为活佛他不理解这个不信佛的女人为什么也来求其灌顶。

达赖在御河桥也遇到过滑稽的事。这天，达赖在驻地举办灌顶仪式，数百名僧众被大客车从雍和宫接来等待灌顶。他们在民委及达赖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指挥下，排成一列纵队顺序走进达赖的住所，灌顶的场所设在一楼的会客室。当朝圣者一个一个地接受灌顶时，卫士长张效苏发现进来一个走路艰难、浑身上下脏兮兮的人，特别是他头顶生着一块块恶疮，上面还流着粘稠黄绿的脓水。张效苏马上想到达赖为他灌顶后会不会染病，但这是民族宗教活动，自己不便出面把他请出朝拜的行列。于是，张效苏不动声色地给站在对面的卫士和达赖的随从使了个眼色，提醒他们注意这个人，看达赖的眼色行事，如达赖露出不愿为其灌顶的表情，就把这个人请出去，卫士和达赖的随从，看见张效苏的眼神，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果然那个头顶生疮的朝拜者，弓着腰走到达赖面前时，达赖刚刚伸出的手，立刻停住了，面露难色地看了张效苏一眼。张效苏立刻向卫士和随从使了个眼色，两人走上前把那人请出了屋，交给了达赖驻京办事处的人，由他们去做解释工作。

当灌顶仪式结束后，张效苏故意问达赖：“副委员长，您怎么不给那个头顶生疮的人摸顶呢？”达赖知道张效苏是在故意逗他，便笑着说：“你说我怎么摸，那么脏！再说我摸了也不见得能治好他的病，搞不好还把我传染上了呢？”

听了达赖的话，张效苏也笑了，佛爷也挺明白呢。

〔责任编辑：晓 渡〕

(上接75页)万里把口子一开，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就如同决堤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拾。陈庭元描述说：“一说分田，我的乖乖，让他到组他非到户，拿刀下死命令也管不住。”分田第一年，凤阳县粮食总产由2.9亿斤一跃而至4.4亿斤。

赵紫阳在四川也走出一条奇路。他把自留地面积一下子扩大到

了15%，同时甩掉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大寨模式，放手搞开了物质刺激。磨洋工的汪洋大海随着大寨红旗一起在这些地方消失了。中国农村很快传开了两句话：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再不提起挨过饿要过饭的陈永贵。

据统计，中国因包产到户问题而遭受迫害、身败名裂的人数不下

400万，因此而丧生者不下10万。真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前仆后继，如涌如潮，只为了躲一个穷。事实上，在大多数地方，大寨模式与贫穷是联在一起的。因为它直接导致了大面积的磨洋工。八亿农民磨洋工，中国受不了，全世界都受不了。

〔责任编辑：刘家驹〕





他递给我一张别致名片，中间是凸出的一个酷似船帆的形状，然而细看却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宾馆，在图案右上角的顶端印有中英两种文字——唐裕和 TONG DJOE，他的中、英文名字。这，或许象征他所经营的航运业和旅游业、地产业，或许寄寓着“直挂云帆济沧海”和“万丈高楼平地起”的涵义，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 东南亚名商

## 唐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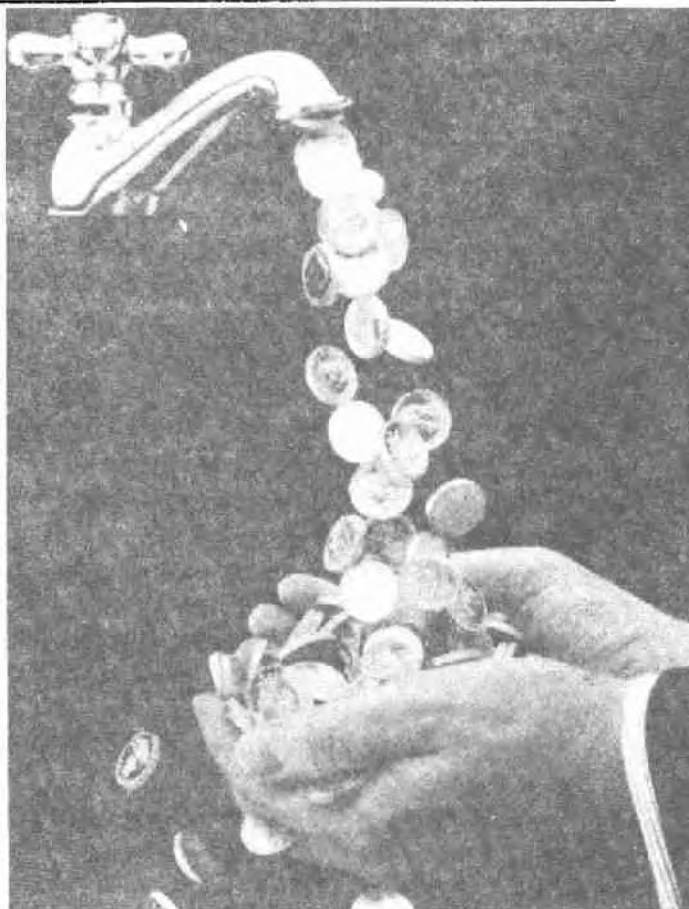
●永志

### 从水手到“船王”

年逾花甲的唐裕先生慈眉善目，脸上总挂着笑容，给人以精明练达、平易和蔼的感觉，他不讳言自己是从一个赤手空拳的水手起家的。

唐裕祖籍为福建省南部山区安溪县，那里是名茶“铁观音”的故乡。1926年，他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棉兰岛，8岁随堂兄投奔新加坡开面店的大哥唐连良，18岁即在他近海运输的船上当水手。五、六十年代，新加坡炼油业兴起，眼光独到的唐裕看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自置油轮经营印尼、新加坡两地间的石油。

刚开始，唐裕的事业并不尽如人意。海上的波涛，生意场上的竞争，埋伏着一个又一个可怕的漩涡；猖獗的海盗，随时都可能把船只和货物抢掠一空。然而，唐裕秉承“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古训，凭着经验、信诚和胆魄去拓宽业务。1957年，他的敦那士（私人）有限公司成为印尼国家石油公司（pertamina）驻新加坡的总代理。



到了60年代,他的事业如日中天。该公司在航运业全盛时期,曾拥有一支200条油轮、200多万吨位的船队,当时有新加坡“船王”和东南亚航运巨子的美誉,此外,他还兼营国际规格的旅馆业、石油业,以及地产业、进出口贸易等,企业扩展到许多领域。他那屹立在新加坡市区的28层敦那士总部大厦,引人瞩目。

从一棵小树长成根深叶茂的大树,唐裕没有忘记给他滋养、给他勇气的故土。他说,老一辈华侨讲究叶落归根,新一代华人注重落地生根,而他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恋根者。

早在60年代,唐裕就为中国银行驻新加坡分行提供过帮助。当中国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时,唐裕又以其睿智的目光注视着中国这块热土。1981年,他代表新加坡船务工会到中国访问后,与中国的合作便正式开始了。1985年,唐裕与10多位工商界人士合作,在香港成立了坚源有限公司;同年7月,该公司与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公司和福建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联合成立了厦门汇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从事有关房地产、建筑材料和建筑装饰工程等方面的业务活动;接着又创立了汇源商业有限公司,引进现代通信科技设备等;1987年,再创建汇兴石材有限公司,从事大理石、花岗岩原料的开采,磨光板材加工和工艺品制作、出口等。

1989年秋,外商在中国投资处于低潮、观望阶段。作为香港坚源有限公司董事主席的唐裕和合作者却在这个时候为汇成、汇兴、汇源三家公司举行择吉开幕典礼。唐裕在庆典上说:中国有丰富的资源,人才济济,改革开放事业必将蓬勃发展,本公司能参加这一伟大事业并作小小的贡献,感到无限欣慰。我相信海外华裔都盼望中国的建设获得成功,因为中国的成功必将促进世界的繁荣与安定。因此,我们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带动海外投资者共同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

商业部部长胡平在致词中巧解“汇成”:三个公司取得的成就,是汇聚了中国、福建、厦门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汇聚了新加坡朋友与中国、福建、厦门合作的成就,也汇集了双方智慧战胜困难所取得的成就。胡平还为三家公司择吉开业典礼纪念刊题写了“基石永固”四个大字。

事业的开创,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大陆,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唐裕不讳言其中的甘苦,但对于这几个公司在中国的业务进展表示满意。他和公司同仁都拥有这样的共识:在中国、在厦门特区投资有奔头,路虽难行,毕竟前景广阔。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以后,唐裕又在印尼和中国方面组建旅游销售网络,接待前往印尼探亲的中国



唐裕(右)与本文作者合影

公民,为中国和印尼的商贸、旅游合作尽一微力,并借助中国的国际服务网络来推动印尼的旅游业。

## 从商人到民间外交家

唐裕是知名的企业家,也是一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精通中、英、印尼三种语言文字,还会讲闽南方言。由于对社会工作十分热心、投入,赢得各界人士的尊重,被誉为“民间外交家”。他的名字列入印尼名人录。

1990年8月,中国和印尼两国政府在断交23年后宣布复交。此举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在两国修好的过程中,唐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出生在万岛之国的唐裕,年轻时参加过印尼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同印尼朝野人士有相当的交往,他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中国和印尼都是发展中的国家,彼此都有丰富的资源,有很多的共同点,因此加强合作,是大势所趋。除了经济因素,唐裕也深刻体会到只有中印两国关系正常化才能使本地区有长期的安全感。它不仅对于各自的国家有利,而且对于所有的印尼籍华人也有良好的影响,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他义无反顾地担当起架桥者的责任。早在1977年唐裕便和一些有识之士推动印尼工商总会访问中国。该会会长苏澳多·苏甘达尼率领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广州交易会。尽管当时复交的时机还不成熟,唐裕仍以其无求无畏的人生哲学去促成其事。

中国、印尼关系历史悠久,虽然中间有波折,但朝野人士都希望发展友好关系。1983年,穆达尼就任印尼三军总参谋长,一星期后穆接见了唐裕。他向穆建议印尼同中国恢复直接贸易,并得到穆达尼将军的回应和支持。

第一个实际突破是在1985年。由苏哈托总统亲自批准,达成了中国和印尼直接贸易的协议。协议由印尼工商总会和中国贸促会于7月间在新加坡签署。

1985年初,唐裕先生和当时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安排中国外长吴学谦同印尼工商总会会长苏甘达尼在新加坡会谈,双方商谈直接贸易问题,并初步达成协议。同年中国贸促会会长王耀庭、副会长郭东坡和印尼工商总会人士紧锣密鼓地加强这项工作的进程。1985年7月,由唐裕出面安排,中国和印尼代表团在新加坡举行两国直接贸易签约仪式,并由王耀庭和苏甘达尼两人签署。到此覆盖在中国外交关系上的积雪开始消融。1985年8月,王耀庭带领100多人的代表团访问印尼,促进了双方的贸易;1987年,贸促会会长贾石率团访问印尼,进一步促进了友好贸易,同时也拜访印尼各有关方面人士。1988年4月,唐裕先生陪同印尼红十字会主席苏多沃将军访问中国,受到了国家主席李先念与中国外交学会会长韩念龙等领导人的接待,访问取得了预想的成功。苏多沃在返国途中经新加坡对报界发表谈话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中国印尼两国复交”。

1989年2月,苏哈托总统和中国外长钱其琛在东京参加日本裕仁天皇的丧礼而进行了会谈,昭示两国关系结束了那段不愉快的一页。1989年6月,唐先生来到中国,表达了印尼修好的愿望,受到了中国贸促会会长郑鸿业的接见,随后又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接见。7月5日,印尼国务部长慕迪奥诺接见了唐裕,详尽地了解到中方的意图。

1989年9月,唐裕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40周年纪念活动。他会见了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晖,并受到了李鹏总理的接见。他向中国总理传递了印尼同中国复交的信息。同年底,由外交部部长助理徐敦信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印尼参加两国复交谈判。至此,两国复交的原则性和技术性问题均就解决。中国代表团谈判结束后,途经新加坡回国,唐裕宴请了中国代表团。作为一个默默为中印交好而努力耕耘的人士,唐裕春风满面,举杯祝贺,一切尽在无言之中。

## 从艺术爱好者到收藏家

商场拼搏和频繁交际,容易让人神经绷得紧紧的。如何动静结合、忙里偷闲?唐裕先生找到了一条志趣高雅、身心相宜的道路,那就是欣赏艺术,收藏艺术品。

早在当水手的时候,他十分欣赏万岛之国印尼的

绮丽风光,喜爱印尼到新加坡之间的热带雨林、海岛山光水色,并迷上了描绘这些风光的画作。随着事业的进展和眼界的开阔,他收藏的范围也越发广泛,诸如名人字画、陶瓷制品、美玉古砚、钱币古董,均在收藏之列。

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他对中华文化有着一种亲切的认同感。几十年来,他广泛搜集流散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印尼、新加坡、香港等地民间的一部分中国珍贵文物。这些年,唐裕经常来往北京,每次总忘不了去琉璃厂文化街和文物商店,精心选购文物。他说,“现代人生活在紧张的氛围中,应该找一些娱乐以遣兴,调节绷紧的神经。收藏便是静中的享受,闲里的纳福,可谓其乐无穷。看到有价值的工艺品、文物,我心里就特别高兴,就想弄到手里。特别是对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品,更是不惜重金收藏。”在收藏和欣赏的过程中,唐裕的眼光也越发犀利,对于一切文物的真假的鉴定,让文物鉴赏家也佩服不已。

近年来,中国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一些中国书画家到新加坡举办书画展览,唐裕只要本人在新加坡,总是亲临展场。

到过新加坡敦那士大厦的人,都会为唐裕的艺术收藏珍品所吸引,为他苦心孤诣收藏珍贵文物特别是中国的古董珍品的精神所感动,他那偌大的几间办公室,简直象座文物博物馆。各种古式家具、屏风排列有序,一幅幅象牙雕刻和名木雕刻的艺术品摆放在屋子的各个位置构成极具氛围的图案;名人书画、古瓷古玩,更是各具特色,熠熠生辉。在印尼他的办公室和住家里,同样陈列着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有很多是中国的。

搜集如此之多的文物,是要耗费很大的精力和财力的。然而让人感动的是,唐裕收集这些文物,并不都是为了据为己有。1990年3月徐悲鸿遗孀廖静文访问新加坡,唐裕在为廖静文访新举行的宴会上,慨然宣布将他珍藏了20多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师徐悲鸿名作《神鹰》,捐赠给中国徐悲鸿纪念馆,并当场将作品捧交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

新加坡、香港和中国新闻社均以“徐悲鸿抗战期间名作《神鹰》新加坡商界名人捐赠中国”为题,作了报道。报载:徐悲鸿在抗日战争期间喜闻中国战机“神鹰队”袭击在汉口的日本侵略机队大捷之后,挥笔画下一只展翅飞翔的神鹰,名画题为《神鹰》。唐裕认为,这幅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不能占为己有。他以大我胜于小我的博大胸襟,再次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和爱戴。

[责任编辑:张 蕾]

我自1981年初夏结识刘晓庆后，至1992年深秋的今天，屈指算来，已有12年之久。虽交往时密时疏，有时甚至一年两年也没见过一面，但却友情不断，一直保持着联系。

最近，有机会与《炎黄春秋》副总编杜卫东等十来位作家赴东北鞍山参加笔会，彼此谈起文学创作轶事。杜卫东执意约我为其刊物写篇刘晓庆的专稿，并起题为《与刘晓庆的十二年交往》。盛情之下，我答应了。

# 与刘晓庆 结识交往 十二年

## 在新迁人的“刘公馆”做客

按响了门铃之后，首先出面“欢迎”的是一片嘈杂的有高有低的小狗吠叫声。这肯定是主人在电话里告诉我她养的三只心爱的大小洋犬了。

刘晓庆新迁人的“公馆”，位于北京亚运村东隅幽静美丽的新居民区里。这是一座辐射式六层新楼。刘晓庆拥有一号门内的五层至六层楼面的全部单元房，打通房间，重新布局，做了全面精致的装潢修饰。在四至五层的楼梯中间安了一个保险铁门。

前几年，刘晓庆举家从北京南迁到深圳的蛇口。那里的住所是一座优美谧静的海滨别墅。常年伴随晓庆居住的有她的父母亲、九十多高龄的外婆和她的巴黎读书的妹妹的小儿子，还有她的一位堂兄在此为其操持一切内外重活。1992年5月，一家又北上回到首都。暂住朋友的一处干休所。直到七月份，公寓装修竣工后才迁入此新居。

这是1992年8月下旬的一天，登梯步入新居，一股豪华清新的氛围扑面而来。五层楼面有会客室、书房、餐厅、厨房等。上一层楼则是





卧室、书房和健身房等。各类房间均按不同用途需要而装修。变化多样而华丽新颖的顶棚、吊灯和墙布窗帘，还有家俱，都给人一种温馨宁静舒适的感觉。最为引人驻足的是五至六层楼楼梯中间的墙壁上悬挂的一幅用巨大画框镶嵌的足有一米七八高、一米一二宽的大幅油画。画面上是一位充满艺术美而神圣的全身女子裸体画像。这是印度尼西亚政府赠给刘晓庆的苏加诺藏画，其艺术造诣和价值，可说是我见过的世界著名油画中的佼佼者之一。据说，此画在晓庆极为艰难的离婚案中，还曾引起了极不平常的“风浪”……

到得晓庆家，已近中午。晓庆下楼来，彼此述说了约两年来未曾见面的时间中双方的大概情况，便进午餐。如今，相当多的影星歌星艺术家，多是工作至深夜，而翌日的近午才起床。晓庆也是这个习惯。因此，早餐和午餐就“合二为一”了。她脸上的倦意还没有消失。显然，略为苍白的面颊上写着她多年来为艺术为生活而奔波的多少辛劳疲惫，还有不久前因车祸治伤中引出的败血症尚没有完全治愈的痕迹……

在长方形的大餐桌前就餐的，除了客人外，有晓庆和她的父母亲，上小学二年级的侄儿，充当厨师的堂兄，还有内向寡语的女秘书和年轻伶俐的四川籍小阿姨。餐桌下，还有三只小洋犬缠绕在刘晓庆的脚边。

餐桌上，是普通的家常便饭，加上啤酒等饮料。当然，大多是川味的。五六个菜中，最为突出的是晓庆最喜欢吃的红烧肉。但她并没有只管自己用餐，而是专门拣起一块块肥肉去侍候桌下的熊仔、点点等三只爱犬。她与熊仔等的深厚感情确是难以用文字表述的，它们伴随她度过一些艰辛、寂寞而苦涩的日子……这在她最近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我这八年》一书中已详尽叙述过了……

“晓庆，气色不甚好？”我问。

晓庆点点头，微笑一下，又埋头关照她的爱犬。

“是的。在医治败血症时用的一种药物，听说有副作用，再加上没有痊愈她便急于出院，又四方奔忙。医生告诉她说千万不要太劳累。如果过于疲劳，便会有旧病复发的危险。可她不听劝告，也不听我的话。”晓庆的妈妈说，“她常常对我隐瞒一些难事和苦衷，不让我为她操心和

担心。这回她住院时也没让我知道。直到我们到北京后，去海军医院看她时，我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

“我对妈妈常常报喜不报忧。”晓庆风趣说，“我的妈妈和爸爸退休后，身体一直不太好，我不愿让他们多操心，我希望他们过个安宁幸福的晚年。我妈妈前几年身体极差。这两年总算好些了。”

“现在住在这里，环境不错。”晓庆的妈妈继续说，“晚上我一般休息得较早，陪着小孙子，好让他睡足觉，第二天好精力充沛的去上学。我早上五时多起床，便下楼去，沿着安惠桥、四环路绕一周，散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做些锻炼。上午读读书刊报纸。午饭后，去一趟邮局取信件报刊……”

晓庆的爸爸是个知识分子，身体差些。但借着拐杖，仍可以上下楼。她的妈妈原是中学校长，身子骨还硬朗，上下五六层楼梯，啜啜的，依旧极为麻利。

用餐之际，姜文突然冒了出来。

“哟，老傅来了。”他急忙与我打招呼，“多年不见。”

“可不是。”我说。

●刘晓庆与本文作者在一起





前几天,我与姜文通过一次电话,但上一次见面是好几年以前了。那时他和丛珊等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青年艺术剧院,我去看望他们。那会儿他还是个又瘦又黑的不甚起眼的小伙子。今天,他已是名望赫赫海内外的健壮的中国男子汉了。

他们这个班,出了不少名演员,除姜文、丛珊外,还有吕丽萍、岳红和江澄等等。当时,我通过爱好文学的江澄的朋友关系认识了他们。后来先后采写了成功后的丛珊和岳红,分别发表了报告文学《她从梦中来》、《记丛珊》和《野山上的女子》(记岳红)等。

餐桌上,聊起了姜文他们班上同学的一些情况。

“丛珊刚从巴黎回来,现在住在蓊门饭店。她正在拍一部戏,她是主演。”姜文对我说,“前些日子,我去看她,还谈起了你。谈起她出国前你写她时的情况。她让我向你问好。”

“她还那么爱做梦吗?”我问,“她出国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也许。她好象说起过那时要请你为她圆梦似的?”

“不错,不然,那时写她怎么会用‘她从梦中来’的题目?”

姜文端起酒杯与我碰杯,十分随意爽快,毫无名星架子。

……

“你们谈吧。”晓庆起身说,“我今晚要去东北,得去准备准备。”

“怎么啦?”姜文幽默地说,“我

一来,你就走?”

“哪能呀。”晓庆笑哈哈地说。

“你给我收拾行李?”

“好说。坐下一起聊聊嘛。老傅来了,难得相聚一次。”

我被逗笑了。

“上厕所总可以吧?”晓庆也逗乐道。

“不行,坐下!”姜文故意命令道。

“瞧他多专横呀!”

“在银幕上,李莲英也听慈禧使唤……今儿个,慈禧得让李莲英……”姜文继续逗趣地说。

这下,全餐桌上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看到人民日报出版社再版的晓庆的《我这八年》的扉页上,有你画她的一张漫画肖像。画得很不错。”我问姜文,“你练漫画多久了?常画吗?”

“学生时代就喜欢作画,全是画着玩的。漫不经心的。想起来就画一张。不刻意去追求什么。”

“你对王朔和他的作品,如何看?”

“我觉得我的心与他很相通。读他的作品有一种沉浸于其中的激动……人们对他的了解还太少。他是从痛苦熬出来的。他的小说没有故作深沉,可都有很深的意思在里头……”

午餐后,我们继续天南海北的聊。

后来我们的话题涉及到影坛现状。

“我觉得中国电影的路子还是太窄,标准太单一。就象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原著)所表现的那样,一夫多妻。中国电影的洋丈夫是国际的那个奖,国内的丈夫则是领导的认可。大伙儿都在一个丈夫面前争宠,结果把人弄得特傻,特扭曲。如果一女一丈夫,就会坦然轻松得多”姜文侃侃而谈,“今年3月23日到4月23日,我去了一趟美国。这是美国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全世界杰出青年人才的邀请项目。美国建立这个项目已有几十年历史。我国的老舍、曹禺、吴贻弓等名流,都曾在这个项目之列被邀请过。我在美国走了许多地方,接触了各界人士。我发现,在美国这个地方最容易使各种事物同生并茂。有具有忧患意识的阶层,也有文盲和社会渣滓。美国这个民族的特点是,做事从不一窝蜂,而是各有各的爱好和口味,从不对不同的志愿说三道四。对我们一古脑儿地去‘卡拉OK’,甚至全民玩‘呼拉圈’,他们认为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电影的毛病要害之一,也宛如都来玩‘呼拉圈’一样,喜欢都来树样板,一起大吹大捧某作品,非把它吹成样板不可,一窝蜂地跟着模仿,直至捧杀,‘瞎菜’了之……《一个和八个》、《黄土地》,什么时候拿出来都是好东西。但后来,一些人把它捧成那个样,有人就心里不舒服:‘至于吗?’就象毛泽东吧,挺伟大的一个人,但后来被神化了,人们便疑惑起来:‘他是神吗?’……”

“姜文的话的确击中了中国影坛和社会弊端。”晓庆接过话题,“前几年我就有那种话哽喉头的感觉,因此便到处寻找突破口,故大胆地以制片人及主演头衔拍摄了《无情的情人》这部片子。不料在大陆被禁演了好几年,才开放……当然,有这种想法的人可能还有不少,但没有说出来。今天姜文系统总结

出来了……总之，要真正执行毛主席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切才能繁荣发展，天才才有土壤……不然，一切都会枯萎的……”

“这两年，你都在做些什么呀？我似乎没听到过你的什么信息。”我问姜文。

“拍过《大太监李莲英》后，我已两年左右没有接过戏了。”姜文陷入了沉思，“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干别人意料之中的事。7年前，我拍《末代皇帝》时，还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与潘虹配戏时，她以赏识的口吻对我说：‘你将来可以成为孙飞虎那样的演员，专演溥仪。’可我却从此下决心不再演溥仪。拍过《芙蓉镇》之后，许多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形象的角色蜂拥而来，要我扮演，我全都谢绝了。有一回，我见着上影导演赵焕章，恳切地建议道：‘你农村片拍得不错。咱俩是否合作一回？’他非常客气地笑了笑说：‘可以，可以。’可我品出了他的言外之意：‘你象农民吗？’等我把《红高粱》演轰动了后，大批没头没脑的粗鲁农民形象又都寻到我这儿来，我厌倦了，发誓不再演这类人物。我的故乡是唐山，在北京长大，喜欢京味儿。所以在凌子风导演的《春桃》中我和晓庆合作，主演了刘向高这个人物……我喜欢出人意外……总之。我不想一再重复自己，而是爱凭自己的感觉和爱好，想做与人不同的事。我准备改编和主演王朔的小说新作《我是你爸爸》（由张艺谋导演）。我还准备改编并自己执导王朔的另一部小说《动物凶猛》……这并不意味着我要改行。这只不过想试试自己到底有多少才华。年轻人应该永远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潮流和生命力，这是不可忽视的。电影艺术家应该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永远感受流动的生活……在美国访问期间，美国著名导演奥立佛·斯通发现我会讲英语，并赞同赏

识我的许多对美国和中国问题，还有对毛泽东这个伟人的看法；因而邀请我在他即将导演的《毛泽东传》里饰演毛泽东。我欣然地对他说：‘我了解毛泽东的历史，理解他的内心，要演的话没有第二人能演得过我……你无法理解一个中国人对毛泽东怀有的特殊感情。你的剧本里的一些描写，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另外，你如果要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拍，出来的影片感觉上显然不对。因为毛泽东不可能出现在越南或者其它亚洲国家，他只能出现在中国。’我说的这些对中国电影的看法，绝对不是一个人的看法。是代表着代电影艺术家的……当然，尽管我国现在好的影片不太多，但能与美国、英国、法国等海外好片媲美的也还有几部；至于优秀的电影艺术家，我国并不少……我们国内把美国的奥斯卡奖宣传得实在太过于神圣神秘了。它只不过是美国电影的一个奖。其实，美国人对它并不太重视……”

“世界电影界中，我觉得最优秀的演员在英国。美国和苏联的也不错。我认为中国的一批优秀的电影演员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中国的电影演员最少可以拥有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观众。因此，我感到作为中国演员是幸福的……”刘晓庆接着发表了她的另一些看法，“这些年，中国电影界，已有了新的崛起，新的起色，出了一批好片和优秀演员。他们大多是从学院里出来的，是‘学院派’。我呢？我是‘院外派’，我是自学成才的，现在，他们是‘在朝派’。”晓庆对着我风趣地用筷子指点一下姜文，笑了笑又说，“他就是‘在朝派’的代表人物。我是‘在野派’，是少数派，几乎在孤军作战了……”如今，影视界的一群耀眼的名星，如姜文、巩俐、吕丽萍等等，的确都是正统的科班出身，从戏剧学院出来的。……

“不过，我并不认输。我仍然在努力，继续丰富提高自己，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晓庆补充道。

在与晓庆同时代的影坛上，各方面的成就达到顶峰的，受到海内外一致推崇的，多才多艺的大影星，似乎也只有她一个……

刘晓庆对艺术的追求是十分刻苦认真的。北京电影制片厂老厂长汪洋正是这样评价她的。他说：“我第一次见刘晓庆时，便认为她很有前途，将来会是个好演员……果然不错。”当时，八一厂导演张勇手在四川发现刘晓庆后，便要她来扮演《南海长城》的女主角。她初露锋芒，便受到人们的注目。之后，一路顺风。

著名导演谢铁骕等说：“刘晓庆善于塑造人物，能够从多侧面去刻画人物。她积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有胆识饰演各种各样的人物角色，也勇于作出牺牲……”

在扮演老年慈禧，拍摄《大太监李莲英》时，她毫不犹豫地剃去眉毛，显得那样的难看。但她说：“为了艺术，我什么都可以做。”海内外的不少艺术家为此都十分感动赞叹。她曾四度出演慈禧：《火烧圆明园》中的16岁慈禧；《垂帘听政》中的27岁慈禧；《大太监李莲英》中63—74岁的慈禧……有人对她逗趣地说：你都可以申请演慈禧的专利了。为了演老年慈禧，她每天大早就到公园里的老太婆群中，同她们一起打太极拳，舞剑、交往……

自在美国举办《刘晓庆之夜》个人演唱会之前之后至今，她大约已在国内外演出了一千多场。有一天连演十一场，从早上7时到第二天清晨5时，简直把她累爬倒了……不过，她十分珍惜为普通观众演出的机会，她觉得这是与观众交流提高自己的极好渠道……

她说：“我小学毕业考入四川音乐学院附中，弹扬琴。我是学音乐

出身的。这给我后来演电影带来了许多好处。不过，我想，我要是一直搞音乐的话，做音乐家，也会做得不错的。”

刘晓庆多才多艺，善歌善舞，且善器乐，钢琴也弹得不错。观看她的演出中，谁都赞叹她的表演唱《大碗茶》独具特色。这个节目的服饰、伴舞、形象和表演等设计，全出自她那巧妙的思维。她扮演的一个阔少爷逛茶楼的清新角色，极是维妙维肖。

“演员要力求有独特的个性和心理的多样化……这就象是一个丰厚的苗圃……当你扮演某个角色时，就可以用全部心血去浇灌每一棵小苗，使它长大成树。我演每个角色都是这样做的。”刘晓庆对我说，“我希望自己的个性丰富多彩，五花八门……”

刘晓庆既有艺术成就，做人又十分坦率。电影圈里戏称她是“乱世英雄”，“银海弄潮儿”。

汪洋说：“刘晓庆这个演员很单纯直爽，性格爽快开朗，高兴就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从不掩饰伪装自己……”

“其实我有我自己的苦恼。有时，我极羡慕做个普通百姓。”刘晓庆对我说，“我去过许多地方。可从来很少出去观光。有时演出后，被群众包围住，许久许久突破不了包围圈。有时，只好在公安人员保护下，悄悄走后门……我在北京住了多少年，可从没有到过王府井大街的商店去玩过。许多风景区更没有看过、去过。我不知道物价，不知道公共汽车开向什么地方……毫无私人生活秘密，一切都处在曝光之下，具有很大的透明度……有时，很痛苦、很孤单、很寂寞……我常常想，如果能同时做一个优秀艺术家，又不是明星，那就太幸福了。不过，这是不可能的。”

“有一段时期，谣言、蔑视、攻击等等污水向我泼来……我只好动

笔写了《我的路》。写自传，本不是我的本意，只是想向人们解释点什么，表白点什么……现在看来，这样做好象有些幼稚。因为一个人要做明星，必然就会有很多附加物。如诽谤、误解，什么的……正象做游戏一样，就要遵守其中的规则……如今，我对这些‘规则’似乎已经习惯了。

“我们十亿人的大国，要想做一件大事，如果不引起众多争议，只能说是平庸之作了。实在说来，争议是件好事。”

有人对刘晓庆写的《我的路》的评论说：如果没有刻骨铭心的体会经历，断然不能写下这种熔尽生活苦涩艰辛的精粹语言——

做人难。

做女人难。

做名女人更难。

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

这确实是她深深地窥视了人生大海之后，得出的至理名言。现已家喻户晓了。

她一向我行我素，绝不因为外流的流言蜚语，而去改变自己的作风，改变自己的人生轨道……相反的，她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特别是感情、友情、爱情……

“我认为，一个人一生当中，爱情是非要不可的。”她坦然的对我说，“不过，婚姻倒可以不必。所以，在我个人来说，我是不喜欢结婚的。这也是我在两次失败的婚姻之后，逐渐体味出来的一种看法。当然，这不一定代表别人……”

“有一个浙江省的作家给我写信，说要写我的传记。”交谈中，她问我，“你认识他吗？他能写得好吗？”

“不认识。不知道。”我摇头反问道，“你有时间让他采访？”

“没有。”她说。

“过去我也看过一些人写了你的一些所谓传记。都详细采访过你吗？”

“没有。”

“那就难以写好传记了。不采访，全凭搜集的文字资料，七拼八凑的，既不生动，且有些是不准确的，甚至道听途说的，谬误的……”

“你了解我，与我交往十来年，可以写我的传记嘛？”

“你有充足的时间让我采访吗？”

她摇摇头。

“将来嘛。”她接着说，“你可以写《刘晓庆评传》，不光记录我的经历，还应有你的评论。不要一般化……”

“你最近除电影外，还在做什么呀？”

“我正在写《我的路》的第三部分……”

“你如何评价自己呀？”

“我对今天以前的过去的自己，还是满意的。不过，我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

“你想在什么地方又有所新的突破？”

“我演了许许多多角色。但我认为我能演得最好的和最能发挥我表演才华的角色，好象还没有到来。例如，我很想演一个有神经病的女人，演一个老处女，演一个心理状态有问题的女人……如果让我演这些角色。我相信我能演得很好，会超过我的过去，大大地超过。我希望并确信，今天以后的未来，我对那时的自己一定会比过去的自己更加满意。”

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道路。各条道路都通向不可知的远方，每一个人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条。她说，她面对自己的选择，至今不悔。

## 第一次见面与“攻击型”个性

铃铃铃。电话铃声响了。

正在编稿的我，搁下手中的笔，



抓起听筒。

“喂。请找傅记者，傅溪鹏同志……”一个陌生的男子汉声音明晰热情地在我耳边响着。

“请问——”

“我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室的张华勋……”

“唔，是《神秘的大佛》的导演。久闻大名。”

“我有一件事想请您帮忙。听说您写过不少武术运动员。想请您提供一些素材，我打算编导一个武术题材的影片。”

“欢迎。”

张华勋多次与我接触交谈，最后他编导了一部武术故事片《武林志》。我们两人年纪相仿，很快成了好朋友。后来，他又拍了许多好片子。如最近的《外来妹》，就是他导演。

那时，我还在《新体育》杂志社当记者和编辑。

一天，他邀请我到北影看看，顺便见一些与他合作的演员。这是1981年初夏的日子，天气十分晴朗。我们的情绪也都如同灿烂的阳光和蔚蓝的苍穹那样，心旷神怡，一路走，一路谈电影。他激动地谈起了他导演的《神秘的大佛》，不停地称赞年轻主演刘晓庆。

“我们先去看看她。她住在北影招待所。今天上午正有空。”他热诚地说。

“太好了。”我在体育界接触的都是运动员，艺术家、演员还见得不多，尽管也极为喜爱音乐和电影等艺术，但机会太少。

在招待所二楼最西头房间里，我们见着了刘晓庆。

年轻的刘晓庆，圆嫩的脸蛋儿红扑扑的；一对圆圆的大眼睛黑亮黑亮扑闪扑闪的，好象会说话似的；长长的黑睫毛，更增添了她的魅力。她身段高挑匀称，轻盈灵捷，举止言谈洒脱大方……

她毫不生份地主动问我是否搞

什么的。我说我又搞新闻又搞文学，报告文学。

“太好了。我也喜欢文学。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就读长篇小说。那时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草原烽火》。”她没有给客人插话的机会，快嘴快舌的说着，“每到寒暑假，我就要妈妈为我借回来好多好多的书。我一本一本地啃，全啃完了。我贪婪地读，常常读得爱不释手，读到天亮……”

第一次见面，刘晓庆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她完全是主动出击型的个性。这是我当时在听她侃侃而谈时，脑海里闪现出来的字眼。

“最近你读了那些类型的书呀？”我问。

“近几年来，我读书的爱好由小说转到纪实传记文学了，”她说，我读了许多西方名人传记，如《基辛格传》、《居里夫人传》等等，不下十几本……”她说到每本书时，几乎都能把其中一些精彩的哲理名句背诵出来，其时情绪显得极为亢奋。可惜，时过十来年了，我记忆不起她背过的那些章段文句了。

我这次来本没有要写什么的打算。可她的独特个性和对文学的造诣，尤其令我赞叹。她说，她还读过不少西方名著，如《飘》、《简爱》、《牛虻》、《呼啸山庄》、《红与黑》、《三剑客》等等。所以我心中生出了写她的念头。

“写篇刘晓庆的印象的小文如何？”

“可以嘛。”她爽快地答应了。

“当然应该写，我帮助提供材料，”张华勋在旁支持鼓动道。

我无意看到桌间和书橱中，高高地堆放着一叠叠各式各样的信件。

“这是观众来信？”

“是的，太多了。有的还来不及拆开看，”晓庆顺手抓过一堆信件给我，“这是《神秘的大佛》上映后寄

来的。最多一天收到七十多封。”

“看来，你在扮演梦婕小姐时，是下了很大的苦功夫……”读着观众来信，我的脑际浮现出了影片中精彩的武打场面，“恕我直言问一句，这些镜头场面是否全是……”

“只有在怪面人深夜挖掘石碑时，梦婕小姐从丛林中极高的山坡上空翻下来的镜头，用了‘替身’。其他的武打场面全是刘晓庆自己演的。”张华勋同志笑着打断我的问话，解释说，“晓庆在拍摄影片之前，就刻苦的跟武术教练练武术，一天三身衣服全湿透了。武术教练说她几十天就学会了武术运动员一两年才练就的功夫，少见，不简单？虽有天资，但主要是刻苦，胆大，不怕伤痛，甚至不怕死！有人赞美刘晓庆既是银幕上的巾帼英雄，又是艺术上的巾帼英雄……”

张华勋特地讲述了两个十分艰苦的苦练和拍摄故事。

一回，她练翻跟斗，不料左膝盖把左眼和鼻梁撞伤了，半边脸肿的象只馒头似的，充血发紫，疼得她头昏眼花，吃饭睡觉都困难。导演和武术教练让她休息两天，可她依旧挺着身苦练。

在排练梦婕与沙陀爷斗打的场面时，晓庆在青石板上一共摔了十二次，重拍了两遍，才基本满意过关。她的身体多处摔伤，疼痛难忍，连着四天四夜无法入眠……

艺术！用痛苦和毅力换来的真正艺术！

当然，晓庆对表演艺术的追求是多方面的。

当时，她正在拍《潜网》。

一天，我去北影摄影棚看她。

这是一场内景戏。她扮演的女主人公体操教练初次失恋后出奔，在没有真正爱情中结合下的一幕家庭生活场面：黑夜。窗外暴风雨狂作。她呆滞地望着小女儿在灯下玩珠算……

开头，由于布景工作人员用水

龙头、鼓风机和吹来的垂柳，布弄风雨时，不够真切，一再中断拍摄，晓庆赔进去好几次“表演”。后来，却是导演及晓庆对“妈妈”和小女孩的表演不够满意而再三再四地重拍。晓庆不厌其烦地听取导演的指点；并在停拍时，不时主动征求在场的其他同志的意见，苦苦思索，力求于“静”中更贴近地通过脸部表情表达出内心活动……这场展现于观众面前仅有几分钟的戏，居然用了足足一个下午。晓庆的这种反复探索、精益求精的精神，令我甚为感动。她的同事也说，她拍戏时，历来如此，一丝不苟。

交谈中，她深有感触地说：“要爱心中的艺术，不要爱艺术中的自己。”她把一位戏剧理论家的名言，作为自己的格言。

第一次见面后，又约了另一次采访。其间，相隔没几天。还是招待所的那个房间。

这次采访纯属聊天性质。我没有出题，而由她爱说什么谈什么。

那时，她的第一次婚姻正遇危机。所以她从家中搬到招待所住。暂时分居，以办“后事”。她极为坦荡地谈了她这一次结合的失败。这个婚姻正在“死亡”。这是她幽默的话。

她的丈夫也是搞艺术的。我现在回忆起来，他大约是在一个部队文工团弹钢琴的。好像还有些名气，水平不低。但她俩彼此对生活的安排看法，似乎相距甚远。

“我在外拍片的时间很多，很少在家，当然难以尽做妻子的责任；而他要求我能多承担这种责任……，于是，分歧越来越大……”晓庆陷于苦苦的沉思之中，许久没再说出话来。

沉默的气氛重重地压在房间里，压在我们彼此的心头。

“偶尔，我拍戏间隔之中回来。他就不愿让我外出，要我多呆在家里……我理解他的心情。但这也不

是个办法。”晓庆接着说，“总不能把我锁在家里，我又不是他的个人财产。我是个活人，我要工作，要生活，要活动，要接触人……我们都太年轻。开始时，对婚姻，对爱情理解得太浅薄，太简单。恋爱时，总把爱情想得那么浪漫美好。可一成立家庭，一过上日子，一切全变了。原来的心态适应不了现实……”

我一直处在同情的心态之中，静静地认真听着她的真切叙述……

突然，一个意外的“事件”打破了这一沉闷的气氛。

光天化日之下，一只硕大的耗子居然从我们脚边一闯而过，钻进床底下去。

晓庆呀的一声，跳起来想抓住什么东西来打耗子。我也急忙起身，看到门边有把扫帚，便飞快过去拿来。我们俩个七手八脚地捣弄床底下。不一会儿耗子从床底下冲出来。逃到暖气片底下。晓庆三两下追过去，用手上的棍子向里使劲地捅。耗子被迫出来，闻到我身边。说时迟那时快，我用力把扫帚冲地上猛拍，终于把它打爬下了。

这虽然是个小事。可我发现晓庆那“攻击型”的个性又再次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见着耗子、小虫之类东西，一般女人较为胆小，多半要吓跳惊叫起来，或连忙逃到一边去。可她却不加思索地出击进攻……

后来，我们又谈到电影上来。

她说，她在第一部影片《南海长城》中便和著名电影名星王心刚合作，实在幸福得头晕目眩，不知姓什么了。她青少年时看了许多电影，就特别崇拜王心刚，就下决心要学王心刚，要……

在海南岛拍片时，解放军某部请他们剧组去联欢。

“剧组演员坐在主席台下边前头几排的座位上。解放军战士列队进入大礼堂。不一会儿，眼前便成

了一片绿色的海洋。”晓庆对我细细地回忆描绘当时的情景，这时，一位军官上台，大声喊着说：‘同志们，今天著名电影演员王心刚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为我们讲几句话。’话音刚落，狂风暴雨般的掌声，在大厅里响起来，震耳欲聋。王心刚潇洒地走过我们面前，跃身上主席台，威武地行了个军礼。顿时，台下又爆发出十二级台风般的掌声……他讲了几句话，跳下讲台，身披万道霞光向我们走来。我羡慕他极了，我沉入了梦幻似的，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

“你那时的心情只是羡慕吗？”我有意地发问。

“不。我的心态很复杂。”她说，“我从眼花缭乱的梦幻中收回自己的思绪。我在心中描绘着自己……我突然莫名其妙地对我身边的一位与我配戏的大姐陈祖荣说：‘看着吧，将来我一定要超过王心刚！’我用眼睛瞟了她一下，在心里加了一句话：‘你信吗？’”

“她有什么反应？”

“她也看了我一眼，目光有些疑惑，大约感到我太唐突。她说没一句话。也许她觉得我这个小妞儿太狂了，刚步入影坛还没干什么，便自不量力地吹起来……不过，她是好大姐，她爱护我。她从没把我的那句狂言向别人提起过……她在保护我。”

刘晓庆毕竟是刘晓庆。她的个性就是那样坦荡。在我后来许多次与她接触中，和与她交往的朋友的言谈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这个女孩不管什么场合，也不管别人能否接受，她总是毫无遮掩地把自己的心坦露出来，一点也不晓得自卫和防备什么……她会要吃好多苦头的，因为社会是复杂的，人们的心态和相互关系是复杂的……

不过，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古有的断言，一点不假。刘晓庆后来在美联社记者问她谁是中国最好的

女演员时，她竟然不加思索的脱口而出，说：“是我！”也就不奇怪了。她既有天才，又刻苦进取，又有成就，又敢说真心话……这在别的中国艺术家和普通人，都是难做到的！

“我对有的人，做人的虚伪、假谦虚，是极为反对反感的。我认为，做人要坦白些，自己行就说行，不行就不行。不要绕圈子。不仅浪费时间，又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自己。那就品行不端啦！”后来，我们在重提这个戏剧性的风波时，晓庆对我发议论道，“我当时不过自己投了自己一票而已，象选举那样，我是公民嘛，有选举权，也有被选举权。坏人才被剥夺被选举权嘛（说到这里我们两人相对大笑起来）！不是吗？就算没有人投我的票，我也可以投自己一票嘛。我相信我的能力。或者是谦虚说一点，我希望成为最好的女演员。你可以认为张三李四最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又没有强加于人。何况我更没有说别的演员不好。也许还可以说，我不过是把我自己给我自己所定的标准说出来而已。此后别人都会用这个标准来要求我，衡量我。我真真是给自己出了个大难题。我真傻！”

后来的又一次见面，还是那个房间。不过已是炎夏了。巧得很，这回，晓庆的妈妈正好从成都来京探望女儿。她们母女自己做了好些“红茶菌”，请我品尝。当时社会上到处流行喝“红茶菌”这种新饮料。她们母女俩与我畅谈了晓庆小时候的许多趣事。

晓庆上下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小她好几岁的妹妹。姐俩感情极好，小时候便常在一起捉迷藏，一起玩“演戏”。虽有时也会发生些争执，但姐姐总让着妹妹……

似乎为了弥补家中没有男孩的缺陷，小时候的晓庆浑身充满了粗野男孩的个性。她上小学时，在文体活动方面十分活跃，是市少年宫

歌咏队出色的小演员，善歌能舞。

“晓庆小时候是不是很调皮？”我问晓庆的妈妈。

“嘿，象个野孩子。爬树、游泳什么都玩。和别的女孩子就是不一样，什么事都敢干；什么话都敢说。有时，比男孩还皮哩！”妈妈沉入回忆，“不过，她干的倒不是什么坏事，只是好玩，不损害别人。”

“你管她吗？打她吗？”

“自然要管她，一个女孩子，这样太那个了……”

“我常挨打。”晓庆逗乐地对妈妈和我比划着手势，“妈妈常打我。”

“不听话嘛。”妈妈说，笑起来。

“乖的时候多。”晓庆辩解道。

“那就记不得了。有多有少……”

“她小时候，爱哭吗？”

“爱哭。不过，长大了就坚强了。再也不哭了。”妈妈说。

“不在妈妈面前哭……”晓庆诡诘地说，做了个鬼脸。

“反正我没有见她哭过，她长成大人以后。”

结识刘晓庆约半年后的当年10月至11月份，我作为中国男女排球队代表团记者，赴日本去采访排球世界大赛，先在东京，后飞北海道的札幌等城市，并沿着日本西海岸南下，到达富山、广岛、大阪、福冈、名古屋、京都等城市。中国女排第一次为祖国抱回了世界杯冠军金杯。我随团于拉练比赛中采访，写了长篇特写《会当凌绝顶》，登载在《新体育》后，曾寄去刊物给刘晓庆。她读后，给我回了一信。这已经是1982年初春了。

她在信上说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谈的很简单。她说，离婚的事办完了，终于解脱出来了。她说，她觉得轻松多了，有一种鸟儿飞出鸟笼的感觉，看到的太空更蔚蓝，阳光更灿烂……

第二件事说，她接受了新的拍片任务，怀着兴奋的心情，朝气蓬勃地北上前往长春电影制片厂。春天来了，万物生意盎然。她说她此时的心田如同春天的大地，一切都复苏了……她很快投入了新片《心灵深处》的拍摄工作。这次，她扮演的女主人公是一位从抗美援朝战火中归国回来的女护士。她为了抚养烈士遗孤而无私地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她在信上说：“开拍新片的镜头，一幕幕展现在我们面前……走进北国一望无野的田野上，多么令人心旷神怡……然而，要表现一个美丽的心灵，塑造一个崇高的形象，却要进行艰巨辛苦的思想和体力劳动。这是与我以前扮演的人物不同的角色，是一个非常有思想深度的心灵美的女性。因此，就迫使我得向更深一层的艺术宫殿去探进……”

拍过《心灵深处》回京不久后，刘晓庆曾陷于心情极为压抑忧郁的境地。有一回。她约我去聊聊。在她新分配的北影宿舍里。

新居里，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一样象样的家俱，她睡的是一只可折叠的“行军床”。床的旁边，就地堆放了几堆书籍和刊物，因为没有书架。只有一台冰箱，似乎还是朋友寄放在此似的……

她告诉我离婚后，她几乎无家可归了。遇到没有戏拍的时候，就没有招待所可住了。只好到处打游击。葛优的父亲葛存壮等北影同行帮她借过住房。

那回，她愤慨地对我说过，人生太难了。1980年深秋，她在东北大森林中赶拍外景时平白无故地传来了她倒卖黄金、自杀和企图谋害丈夫的流言蜚语，弄得她啼笑皆非。但是她并没有被谣言吓倒，也没受到什么影响，而是努力克制自己，不为这些无稽之谈所干扰分心和耗费心力。她日日夜夜沉浸于对角色的体味探索塑造之中……可现在又有

一股污水泼来，说她的生活作风怎样怎样，编织出来的谣言，有眉有眼的，好象某人亲眼看到的……

我有意询问她对社会上的这些谣传有何看法？

“这些谣传说来可笑。而我一个低工资的年轻演员，如有黄金，倒真是好极了……”她眉毛一挑，莞尔一笑，露出顽皮、幽默的神情，“谣传终归是假的，艺术才是真的！”

“可眼前的这些……”

“这个，说来叫人可恨。我是个单身女人，我有权利谈恋爱，谁管得着……说实话，我吃过苦头。我真想好好自己清静些日子，并不去想做爱情这件事。我独自一人单枪匹马地去闯生活，更无牵挂，更顺心些！”她认真地说：“即使我恋爱了也不关别人的事……我就是这个个性，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不违反党纪国法，不违背社会道德……”

“我欣赏你这样的人生态。”

“不过，说起来可以，容易；做起来难呀。古人说，人言可畏。一点不假！”

在谈到她的抱负时，我无意地间起她名字的来源。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妈妈好几次。她的回答很简单，并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她很喜欢她的一个妹妹，也就是我的一个姨妈。姨妈的名字中有一个庆字，妈也疼爱我，因此就给我起名叫小庆。这是极普通的事。”晓庆随意地说着，没有加什么发挥，“后来我步入影坛，拍第一部影片时，突然心血来潮，预感到将来可能有什么神灵会把这辉煌的光环投射到我的心上，因此，便私自把大小的“小”字，改为拂晓的“晓”字。而且我觉得，这样组成的三个字，很特别。用繁体字写起来的刘晓庆三个字甚为复杂，笔划那么多，显得很有学问似的。这是一种极幼稚单纯的心理……这三个字

的书法很有艺术性，很好看，有书法家的气质，既漂亮又有神秘感……”

### 生活再一次磨难了她

香山饭店孤独地座落在香山脚下。白色醒目的艺术性建筑，别具一格，富有苏州园林式风韵。据说，这是出自于出生苏州而名闻世界现已移居美国的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之手。

这年冬天，我拟采访著名的画师范曾。我们俩相约进住香山饭店。深冬，旅客甚少。整个饭店静悠悠的。吃饭时餐厅里只偶有三两位外宾。

我与范曾相识。媒介是七十年代后期就相识的著名歌唱家李谷一。那时，我们三家都住在团结湖居民区，相距极近。范曾住谷一楼上。一天晚上，谷一引着我到范曾家中看他作画。这大约是1984年。

采访闲聊之际，提起了刘晓庆。

“刘晓庆和我都是全国青年委员。可我和她还没机会结识。”范曾说，“你和她那么熟，请她来饭店玩玩嘛。”

“好说。”我应允了。

结束采访，进入笔耕之前。我给刘晓庆去了一个电话，说了范曾的邀请，她欣然接受了。

于是，我要了一部出租，驱车到北影宿舍。

进得晓庆的家，一屋子的人，有熟人，有生人。此时正好刘晓庆的妹妹刘晓红来京旅行结婚，临近春节了，晓庆的父母及几位亲戚也都在这里。这些人，我都见过，不生份。突然，我发现屋里站着一位从未见过的三十多岁的男子汉，个子虽不算很高，但十分健壮，甚有“彪形大汉”的体格。顿时，我的脑

海里莫名其妙地跳出来两个字：“保镖。”

屋里人声哄哄，十分忙乱。

刘晓庆没作介绍。他没有和我说话。我也没同他打招呼。当时，他的形象我不过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并不在意，很快淡漠了……因为晓庆那里，人来人往太多，朋友太多，也没功夫没必要——去追究认识。

我们匆匆上车返回香山饭店。晓庆的妹妹晓红随同而来。

我把晓庆姐妹交给范曾，便“闭门造字”去了……我的中篇报告文学《鬼才范曾》，后来发表在《花城》上。

范曾与晓庆姐妹聊天，参观饭店内外的商店和各种景观……

过了些日子，范曾邀请其他的朋友，到虎坊桥的一个饭店吃饭，因为他为这家饭店题了一个横匾，老板作东，画家请客。

这是个星期天。那时，我已调《报告文学》杂志工作。上午10时多，我约请我们编辑部的司机驱车到北影摄影棚去接刘晓庆，虽是假日，她仍在赶拍戏。

不料她的戏拍得不顺，都快中午12时了，戏还没有拍完，我们焦灼地等待着，那天，司机带着他的漂亮的小女儿，约三四岁，挺好玩的。我看拍戏看累了，就同小朋友聊天，逗乐。过12时半，我们才上车从西北郊往市南区的虎坊桥赶路。越着急，越出岔子，惹麻烦。到得虎坊桥十字路口拐弯时，车子稍微违反了点交通规则，被民警叫住了。不过也到饭店了。

司机把他的女儿递给我，应付民警去了。

我抱着小女孩，带着晓庆，先到饭店。饭店不大，就在十字路口的东南角上。

这是一家大众饭店。大厅里有几十只桌子，吃饭的客人拥挤不堪，四处人声嘈杂，乱哄哄的。不知宴席在何处。我怀疑是否走错门了。

“你在这里等一等。”我把小女孩塞给刘晓庆，“我进后面看看。你千万别动，站到墙角的那边……”

人们意外地发现刘晓庆到这里来，如同从天而降，大家喜出望外。平时想见都见不着，现在就在眼前，能不抢着多看一眼？几乎所有的视线都集聚成一束强光柱，直射到刘晓庆身上。

“那是她的孩子吧？”

“那是……”

人们议论纷纷。

我推开人墙，辟出一条人缝，挤进厨房，穿过走廊，进到后院，才发现范曾他们在一雅座里。他们已等不及，开宴了。原来，后院另有一条路，一个进口。我们不知道。要是走后院的大门，就不会引来刚才的麻烦了。

我和范曾等撞回大厅，把刘晓庆和司机父女接了进来。

宴席上，有几位画家和作家，还有中央电视台的台长和助理等。

宴席上，谈到当时北京正在建筑的最高最豪华的长城饭店。这种高级的饭店对当时的北京人还是新鲜事，好些人都希望去见识见识。饭店虽说没有全建好，但下面的几层已开始营业。

当时我采写过的北京建筑工程局局长杨嗣信正是这个工程的总指挥。

宴席结束后，我们一起去市建工局拜访了杨局长，杨局长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参观长城饭店。

几天后，杨局长要了一部车，接我，再去北影宿舍接刘晓庆。

这回，晓庆的妹妹晓红等家人都去了，还有上回我见过的那个“陌生人”——彪形大汉。

晓庆仍没有向我介绍他。

长城饭店副总经理等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餐饮部经理还特地请刘晓庆和我们到咖啡厅喝咖啡，并合影签名留念。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我原准备的50元拟付喝

咖啡的费用，原封没动。那时，到饭店喝咖啡，还被看做是一种甚为奢侈的享受……

在长城饭店的最高层上——尚未装饰好的圆形大厅上，观看俯瞰北京城之际，我禁不住好奇心，主动询问了那位陌生人。

“请问，你是——”

“我叫陈国军，是武警的。”他坦然地回答，笑了笑。

之后我们便频频攀谈起来。后来很熟了，成了好朋友。我才知道他是晓庆在东北拍戏时认识的长影演员，是暂时借调到武警文工团的。他和晓庆逐渐确立为“对象”关系了。

关于他俩的感情纠缠和恋爱经历，晓庆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我只是在后来，有一回江澄来看望我，带来了长影著名演员宋晓英到我家做客时，他们详尽地向我叙述了陈国军与长影演员赵亚敏离婚（友好分手）等的详细细节，我才知道其中的前后因委。

不过，后来的一次见面中，刘晓庆曾真诚地就与陈国军的关系问题，征求过我的看法，我们之间有过一次颇为“相对立”的对话。

“你看陈国军这个人怎样？”

“人好像不错。还好相处。”我说。

“你认为他的才干呢？”

“不了解。但凭感觉，似乎一般。这个感觉不一定对。”

“不。你不了解他。他是很有才干的，只是没有机遇，没有表现的舞台。我把他弄到北京来，他会有大作为的。”晓庆说话很恳切，那时她确实是这样看的，“他对我很好。你看，我们相配吗？”

“这个——不好说。你要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听真话。”

“我有一种预感。从长远来看，你们俩的结合不一定合适。”

“这个——”晓庆对我的回答感

到意外。

沉默。许久。

许久。沉默。

“说真的，他能下那么大的决心，放弃了他的家庭……这个我很受感动！”晓庆说。

“正是因为这个——”我想说出我与她相反的另一看法，沉思了半天，还是没有说出来，只大概地道出了个通常的观点，“找对象这种事，第三者的推测往往是不准确的，这和选干部选人才大不一样，是好人不见得就适合当丈夫或妻子……”

“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在一段时间里，我曾经想过，能否找一位年纪比我大几岁又在事业上已有建树的而且在性格意趣上相投脾气好的中年男子。这种人，我遇到过，且似乎对我也不错，可人家都有家庭了。他们谁能为我牺牲自己的家庭？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新的婚姻问题，看来只有你自己在生活现实去体验，思考，裁决，处理了。处理得好，你的生活或顺些，要是弄得不好，婚姻还可能再磨难你一次……”

此话，不幸为我言中。

……很久以后，晓庆见着我，重提此事，深感后悔。不过，这也不大好怪她。只是她这个人，心肠太好了。凡事总爱从好的方面去想，很少为将来多琢磨一着棋……

“我想，弄一笔钱让国军出国留学或作事算了？”她说。

“这也是个出路。”

……

此事后来的结局，我就不清楚了。

他俩还是结婚了。结婚前后这段时间，我因太忙，与晓庆几乎很少接触。只从晓庆的朋友那里听到一点信息。据说，他俩的结婚，晓庆还是出于好心肠，为了国军能调进北京。准备结婚后再离婚。也就是说，她又再次作出牺牲。该着她



命运不佳！

果然，后来的离婚官司打得那样艰苦，耗尽时间，费尽心力，把她弄得身心憔悴……

那时，她还仍然是太“年轻”，太单纯了！

尽管如此，之后，很久时候，晓庆从来也不提国军的一点不是……

还有另一件事，晓庆也是因为“好心、单纯”而吃了大亏……

有一回，晓庆与范曾和我在当时我正在采写的报告文学《十字架下》中的主人公——港商李铭义开办的“巴蜀酒家”吃饭时，提及了当时文坛上的一位怪女人遇罗锦。

“她给我来了一封信，希望和我交朋友。”晓庆说。

“我也收到她的一封信，也说要同我交朋友。”范曾接过话茬。

“这个人可不能沾边呀！”我突然想起她写的纪实文学《冬天的童话》和《春天的童话》，文中把他父

母的隐私以及她后来的“情人”的隐私全都抖了出来，把她的“情人”害得好苦，好没面子……

“可她极为热情。”晓庆说，“她想到我的剧组里工作，例如当场记，什么的……”当时，晓庆与陈国军正计划拍摄《无情的情人》。

过了不久。好心的晓庆还是让遇罗锦进入她的剧组了。

遇罗锦没有“盯”上范曾。也许是范曾对她不屑一顾，或因相距太远，“鞭长及不着”，范曾住东郊团结湖地区，与遇罗锦相距甚远；遇罗锦住西北郊，正好近北影，到晓庆处方便……结果，合作没有多久，遇罗锦与他们便露出分歧来。据说，她同陈国军一起到西南某省看外景时，双方就弄得很不愉快……

终究，她和晓庆闹翻了。到底怎么得罪了她？晓庆后来对我说，她自己也没弄明白……晓庆只是一味地好心待她，连一些私事也同她聊

了，这就种下了后患……

遇罗锦认为是对方撕毁合同的。离开后，还不时来要“工资”，居然在大年过春节时还上门来找晓庆“要钱”。

更令人不可容忍的是，她居然把她了解的晓庆的一些生活走样地编成一个短篇小说，在广州的一个小刊物上发表出来。文中虚构了一个贬义的女主人公，把“影星”改为“歌星”，以影射攻击……

可此事，晓庆也没计较，从没对我提起，由它去……

晓庆心中自然不愉快。她把苦水自己吞了下去……

生活再二再三地磨难了她……

[责任编辑：晓渡]

傅溪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多都报告文学》。

1987年7月24日，新华通讯社向全世界发布了一条重大的考古新闻：“辽宁西部山区发现5000年前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家群址。考古学家根据出土文物初步推断，5000年前这里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重大发现使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消息传出，立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一些中外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美术家纷纷来辽西考古发掘工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察，他们兴奋地称这里是

笔者有幸多次访问这个“神秘王国”，与这里的考古工作者——敲开“神秘王国”大门的人促膝长谈，深感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其出土文物的极其重要的价值还远没有被国内外所认识。现在笔者愿与读者一起共同神游一次这个“神秘王国”，看看它，到底蕴涵着什么。

## 红山文化坛庙冢——小北京

1979年5月，辽宁考古工作者在辽宁西部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村发现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1983年至1985年，考古工作者经过多次试掘，又在相距50公里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村发现一座女神庙、数十处积石大冢群，以及一座面积约4万平方米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经 $^{14}\text{C}$ 测定和树轮校正，这些遗址距今已有5500年。遗址里出土的文物精美绝伦，世所罕见，令人叹为观止。

东山嘴遗址坐落在一座山梁正中缓平突起的台地上，长约60米、宽约40米。遗址下面大凌河奔腾而过，四周为开阔平川地，远望，群山环绕，气势雄伟。这座石筑遗址，石加工技术和砌筑技术相当讲究，外侧可明显地看出错缝砌法，长条基石打磨的棱角突出，表面光滑。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祭坛和方形祭坛，总体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主次之分。这种反映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的建筑遗址，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还是首次发现。祭坛内出土有当时人们崇拜的“生育神”和“农神”的陶质塑像。

牛河梁遗址可以说是上古时代的一个宗教圣地和艺术宝库。遗址群中的女神庙，出土了一尊完整的与真人一样大的泥塑女神头像，面部为朱红色。这个女神的两颧突起，圆额头，扁鼻梁，尖下巴，是典型的蒙古利亚人种，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型接近。女神的眼珠是用两个晶莹碧绿的圆玉球镶嵌而成，显得双目炯炯。令人难以想象，玉眼球竟是用玉铆钉连接起来的。整个女神头像造型准确，雕塑手法基本与现代雕塑一样。这样精湛的技艺显然出自专业艺人之手。和女神头像同时出土的6个大小不同的残体泥塑女性裸体群像，有因年龄差异而发育不同的乳房，有圆润的肩膀，还有完整的手臂、大腿。最小的与真人大体相近，主室中心出土的大鼻、大耳竟等于真人的三倍！在这个遗址里还有泥塑的大鸟的翅膀、猪的鼻子、鹰的爪子等残块出土，女神庙的墙壁上似乎有壁画存在。

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可以说是上古时代的一个神秘王国。坛、庙、冢布局范围约有50平方公



5000年前的  
神秘王国

——红山文化遗址探幽

● 昭文

里，这种“三合一”的布局，有点类似北京的坛、太庙和明十三陵。祭坛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和方形祭坛，建筑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而且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主次之分；女神庙有主室和侧室，泥塑残块证明有体魄硕大的主神和众星捧月的诸神；积石冢群都在山顶或小山包上，具有山陵性质。冢群中心是大墓，周围有很多陪葬的小墓，墓中有的完全没有或仅有少量的随葬品，有的则随葬有大型精美玉器，从中可以看出氏族成员的等级分化已相当严格，已具“礼”的雏形。东山嘴、牛河梁的坛、庙、冢和北京的天坛、太庙、明十三陵为什么这样惊人地相似，似乎有某种继承的关系，它们之间有什么奥秘？这确实值得深入研究。

辽西考古的惊人发现，震动了考古界。我国传统史学一向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象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坛、庙、冢却首先发现在山海关外的辽河之滨，这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 中华民族的共祖：“红山女神”

1986年12月的一天夜里，我国考古界权威苏秉琦先生万分激动地给他的学生郭大顺（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开头这样说：“自红山文化‘女神庙’发现以来，国内外震动，尤其彩版头像，栩栩如生，凡是看过的人都会想象，日后复原起来，那将是多么令人神往的所在啊！我一想到这里，就使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去了，只好起来写信。”

苏老为什么对辽西考古新发现寄予如此大的热情？用他的话说：“我们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体系，通过它来阐明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轮廓，并以它为骨骼系统复原起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考古学应该担负起参加诸如中国文化体系是怎么回事，把十亿中华民族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是怎么回事等项伟大的系统工程。这个提法，我认为是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而且可以做到的，不是高不可攀的。”

苏秉琦先生在70年代中期提出了考古学区系类型论后，迎来了中国考古事业的黄金时代。他对辽西考古事业的关注非自今日始，从1979年以来，他就多次来辽西考古发掘工地考察，1983年7月，他观察了辽西喀左县东山嘴5000年前的祭坛后说：辽西朝阳地区是联结燕山南北这一大地区与辽东、东北、东北亚广大地区的重要环节，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东山嘴好像提纲挈领，是一个重要线索，追究下去，围绕它，找

遗址、墓地、找来龙去脉，找这个遗址背后的人是谁？这些遗址摆在那儿，不认识它就发现不了它，不是任何人看到它就能一眼看出它的重要性。辽西的重要性是不需要怀疑的。

果然不出所料，两个月后，辽宁的考古工作者又在相距东山嘴50公里的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牛河梁村发现了“女神庙”遗址和数十处积石大冢群。值得注意的是，已出土的女神上臂塑件空腔内带有肢骨，因遭火焚多成灰渣，有可能是人骨。联系中亚曾有在人头骨上涂泥成像的崇拜形式，这一现象可能说明，牛河梁女神像有可能是以现实中的人物为依据塑造出来的。当苏先生看到那个栩栩如生的女神头像时欣喜之情难以表述。他认为：华（花）人、龙的传人、中国人的源、根从何而来，三者成为同义词从何说起？（即中华民族是怎样凝聚起来的）中国考古学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对于这个问题总算已经找到解答的钥匙。“女神”是5500年前的“红山人”模拟真人塑造的神像（或女祖像），而不是由后人想象创造的“神”，“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大量共造的玉器、陶器反映的“华与龙”的结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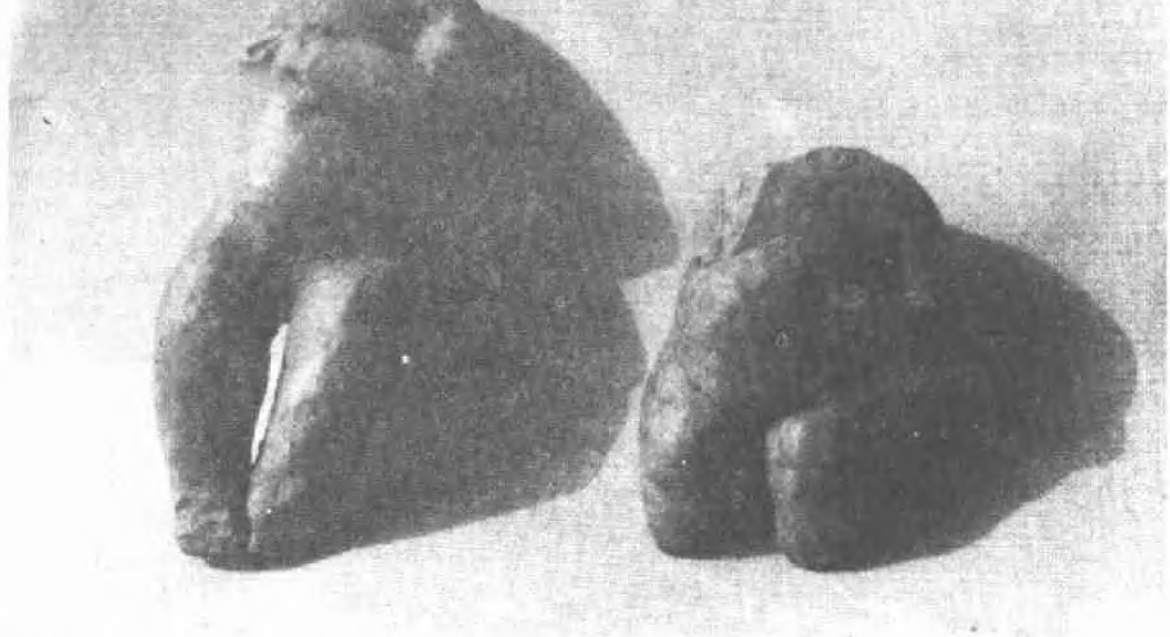
“华与龙”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苏先生论述道：中国古文化有两个区系，一个是源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即“中原古文化”。以玫瑰花为标志；一个是源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即“北方古文化”，以龙为标志。两者真正结合到一起的证据就是辽西考古新发现。这两种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不能把北方古文化看成是中原古文化诞生的一个支系或地方变体。东山嘴、牛河梁的新发现是红山文化的高峰。那里近年来发现的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含有玉雕猪龙、玉雕玫瑰、玫瑰图案彩陶筒座与彩陶盆的巧妙结合。玉雕猪龙放在男墓主人身上，彩陶玫瑰图案盆和筒座配置在积石冢四周。可以看作是龙和华（花）为象征的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结合到一起，从而迸发出文明“火花”。

## 金字塔群与“三阳开泰”

辽宁西部山区发现5000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以后，人们期待着再有惊人发现。三年过去了，果然不负众望，这个5000年前的神秘王国——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又发现了一座5000年前的巨型“金字塔”式建筑和红山文化时期的冶铜遗址，还出土一批很值得研究的玉雕。

在距离女神庙1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土山，山上到处散布着带有红山文化特征的“之”字纹彩陶片





●小型妇女陶质雕像，是我国考古界翘首等待了 30 多年的古代文化遗产。

●这是两件裸体孕妇立像，腹部圆鼓，下肢稍弯，通体打滑光滑。

以及冶铜钳柄片，这个现象早就引起考古专家、辽西考古发掘队领队孙守道的注意。他多次到这座土山察看，长久地思索着……终于，在 1989 年夏，经过初步发掘证实，这座土山竟是全部用人工夯筑起来的，地上部分夯土堆直径近 40 米，高 16 米，外包巨石；内石圈的直径为 60 米，外石圈的直径为 100 米。夯土层次分明，估计总量在数十万立方米以上。金字塔的形状为圆锥形，小抹顶。土山上面有三圈石头围砌起来，每一层石头伸进去 10 米，高度为一米，山下面亦有三圈石头围砌起来。金字塔顶部是炼铜遗址，有 1500 个炼红铜的钳柄，每一钳柄约有 1 尺多高，锅口约有 30 公分，像现代人用的水桶一般大小。围绕大金字塔周围的山头上发现有 30 多座积石冢（小金字塔）群址，整个积石冢群都是圆锥形，大抹顶。和古埃及的金字塔相比，布局是一样的，古埃及也是以大金字塔为中心，周围是小金字塔群。

这座巨型“金字塔”式建筑物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目前学者们说法不一，有的认为这可能是辽西原始文明古国用以祭天的坛；也有人推测是王者的陵墓，其结构和性质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证实，总之，它确实又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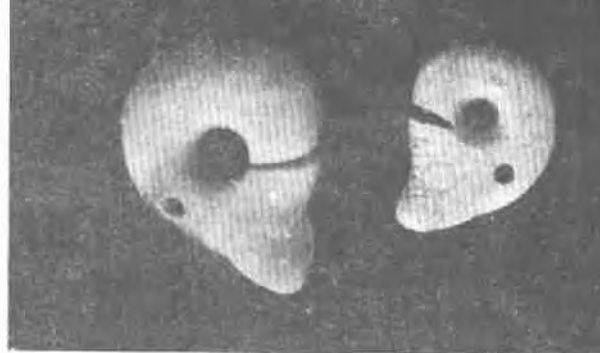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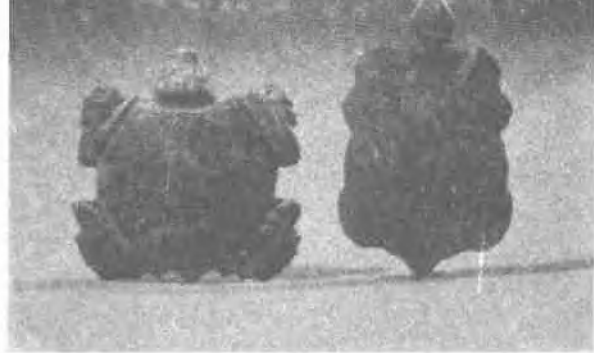
考古工作者对围绕大金字塔周围的小金字塔（积石冢）群进行了部分发掘，其中出土大批玉器，收获是丰富的。一座积石冢的中心大墓里出土一具完整的男性骨架，头部两侧有两个大玉环，胸部佩带着双龙

相交的勾云形玉佩，头的上部有玉箍，腕部有玉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死者双手各握一玉龟，一雌一雄，相配成对。苏秉琦先生认为，玉龟可能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死者可能是个仅次于王者的首领人物。有的专家则认为玉龟可能是当时的氏族部落集团的图腾崇拜物或保护神，当然，最有身份的人死时手中所握的也可能是这个氏族的标志即图腾神，以返回他们的始祖。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考古专家靳之林曾到牛河梁作了全面考察。他激动地说：过去，我看过很多考古发掘遗址，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样动感情，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小北京”，看到了一个 5500 年前的“哲学王国”已经屹立于世界东方。过去报纸上介绍过，说这些积石冢象征天圆地方，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天圆地方，我认为“积石冢”就是小金字塔，小金字塔群中心的巨型夯土山就是大金字塔。大小金字塔内涵的哲学观念是值得深究的。

纵观牛河梁的圆形抹顶金字塔群，它内涵的哲学观念，不仅是通天观，而且具有环天观念。古埃及的金字塔是方锥形、尖顶，可以认为只具有通天观念；而中国的独特哲学，一开始就具有环天观念，认为天是圆形的，所谓圆形，就是太阳东边出，西边落，具有一种环天旋转，永生不息的观念。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崇拜天，崇拜太阳，就是因为它环天旋转，生生不息。

牛河梁的通天观集中反映的数字是“三”。大、



## ●红山文化玉龟

小金字塔都是三层石头垒上去，外面又是三层石头圈；通天通地的无底筒形器的边缘也是三道彩绘。可以说，牛河梁遗址无处不包含着“三”，即当时红山人崇拜的天是“三重天”。原始数字最多就是“三”，郭沫若的考古学第一卷中讲了三是形容多的意思。“三重天”就是最高的天，后来数字发展了叫“九重天”。“三重天”、“九重天”，这在我国民间艺术和民俗活动中，屡见不鲜。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内涵阴阳观念亦是无处不有，如筒形器上的彩绘子母扣、雌雄玉龟、双龙相交的玉佩等等。天人合一的“三孔双人首玉雕”最能说明问题：中间三个圆，两边两个人形，双人首是一阴一阳相合，中间三个圆（即三个太阳）是横下来的“三重天”。阴阳相合通天，通到三重天，通到最高的天，通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使人联想起我国世代流传的“三阳开泰”，这件玉雕很可能就是“三阳开泰”的原型。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从商周的青铜器和历代出土文物到清代皇帝陵墓前的石雕、现代民间艺术品和画家的手笔都可以见到“三阳开泰”的图形。“三阳开泰”即“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直到现在仍具有旺盛的活力，它仍在指导着人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探索宇宙发展的规律，探索社会科学领域的未来。

牛河梁遗址和出土文物所反映的哲学观念不是个偶然现象，从已经完全符号化了的遗迹和遗物，可以看出它已经形成一个群体的哲学意识，说它是个“五千年前的哲学王国”，当之无愧！

## “玉猪龙”与龙的起源

龙，是由哪一类动物神化形成的？学术界一直说法不一，有蜥蜴说、鳄鱼说、以蛇为主的多种动物的结合体说，或龙首来自马首、牛首之说，从牛河梁和辽河流域广大范围内出土的红山文化时期的龙形玉、兽形玉提供的线索看，最早可能同猪有密切关系。

“玉猪龙”是牛河梁出土玉器群中最有特色的动物

## ●“玉猪龙”佩饰

形玉雕。它首尾相连。外部边缘切开，圆形圈曲似龙，首部似猪，有吻前突，前端并列双鼻孔，同时有特大的头部、宽厚的双耳和肥硕的躯体，颜面有皱纹多道，更有露在嘴外的獠牙。雕刻高度概括、夸张、原始古朴，如同新石器时代的石环。这种玉猪龙在其他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中也多有发现。造型完全一致。

玉猪龙是怎样演变成龙的，据专家考证，现在有了确凿的证据。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保存的一件红山文化时期的大型龙型玉雕，其首部像猪，颈上有长鬃形体恰似一个C形，似甲骨文中象形的“龙”字。两者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龙首来源于猪首似乎无可置疑了。

龙崇拜，自古以来就是同农业丰歉有直接关系的天的崇拜联系在一起，猪同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密切相关，从实际生活中猪的形象向超现实的龙的形象演化的过程，正是以原始农业发展和原始信仰的发达为其历史背景的。

闻一多先生说，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以牛河梁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出现为标志，意味着中国远古文明的黎明时期已经到来。

“红山王国”为什么崇拜猪？考古界认为一出现猪就是农业文化。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这也是对的，但有的学者却认为不仅仅是如此。远古时代，猪是作为天的观念、阳性观念存在的，龙蛇是地的象征。从史学角度、神话角度可以说它是猪崇拜、龙崇拜。但从哲学观念来讲，它应该是天和地的合一，很可能是先有天地的合一，然后才有猪龙的合一，这可能更符合本来的面目。猪作为天和太阳的象征，整个人类的原始文化都是这样，如外国把羊、蜘蛛、甲虫象征太阳，鱼、蛇象征水，象征地，这正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崇拜羊头龙、狗头龙、牛头龙是一样的。

整个红山文化太阳崇拜、天崇拜、通天通阳观念到处可见。一个积石冢里的男性墓主人，双手各握一玉龟，一阴一阳，一般观念龟是长寿永生的象征，但在墓主人的阴部却放上一个玉雕猪头，这说明猪是象征阳性，象征太阳的。5000年的猪崇拜一下子就和



## ●红山文化建筑物

辽宁的传统民间艺术与民俗遗风结合在一起了。如辽宁的民俗剪纸《猪头龙》也叫《猪头花》就相当流行；阜新一带农村，过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做一个好几尺长的大面猪来供奉；新宾的满族民俗遗风，不崇拜任何偶像，只崇拜八角梭箩——一块四方木头，有威望的长者把这块木头放在一个盒子里，50年打开一次，打开时必须杀一头猪来祭祀，猪头不能砍掉。据考证，八角梭箩的八个角象征太阳的光芒。可见，辽河流域的猪崇拜、太阳崇拜是有来龙去脉的。

## 重要的启示

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问题是牵动亿万炎黄子孙的大问题。由于夏以前无地下史料，只能凭借传说，从考古学角度看，只好存疑勿论。这样，中华形成国家的时期就是4000年前的夏代，比两河流域、埃及晚了近1500年，比印度也晚了近1000年。夏以前的三皇五帝传说是否可信？中国的考古界一直期待着能够找到实物依据。

中国传统史学观点一向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但一些考古专家来到辽西实地考察以后，得到了十分有益的启示：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问题是多元的，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辽河流域与号称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长江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因此，认为中华文明仅仅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传统观点需要重新考虑，中国的编年史也需要增补修订。

回顾考古学的历史，从30年代起，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问题就被中外考古学家尖锐地提了出来。半个世纪过去了，不少中外考古专家为寻觅中华文明的曙光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有人从仰韶文化遗存中的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去寻找；从大汶口文化遗存中的陶器刻划“文字”等迹象去寻找，以此试图论证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可以早到距今5000年，甚至6000年前。但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中国殷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源头究竟在那里？

## ●女神庙遗址

会不会来自北方？为什么国家的雏形首先发现在辽河流域？这些都是考古学家感兴趣的问题。

苏秉琦教授说，迄今为止，仰韶文化的晚期遗存中，还没有发现过同辽西地区红山文化遗存可以比拟的遗物和遗迹。因此，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辽西考古新发现是否反映了氏族社会解体或开始解体时期的面貌，它是否传达了中华文明源流问题的新信息，牛河梁高度发达的红山文化是否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在缔造中国古文明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的反映在这里，不仅秦统一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的。如果我们还是搬史书，查“四夷传”，恐怕永远也回答不了实质问题。

红山文化的灼灼英华，正象晨曦透过云霭，照亮了探索者的心扉。它使人们看到了中国殷商时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中有红山文化的影子，如东山嘴、牛河梁出土的玉猪龙、赤峰地区出土的大玉龙，它们都与殷墟出土的玉龙和青铜器上的龙很相似，但又有不同之处，似乎有某种继承的关系，这就是有力的佐证。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巨型“金字塔”式建筑物，成群的彩塑女神像，高度发达的玉器工程，等等，这些都意味什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幅员辽阔的大国，古文化不会是清一色的来自一个源流，各个地域都有它自己的特征，但又有它的共同性，有个性，又有共性。山海关外，辽河之滨的古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已愈来愈为专家学者所肯定，这一点殆无疑义。

象征中华民族文明的的红山王国的文化巨人，已经在5500年前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我们作为中华民族龙的传人，站在牛河梁的群山之巅，放眼世界，当引以为最大的骄傲和自豪。

[责任编辑 穆 图]

昭文：女，新华社高级记者。

阳春三月，古城咸阳。一大早，各机关单位还没有开始办公，中国咸阳保健品厂的门里门外已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南腔北调的吵嚷声使过往的行人以为出了啥事？细问才知，这些操上海、广东、四川等地口音的人都是来采购505的。他们中有的人先汇款到厂又专程来催货；有的人一下飞机就直奔工厂；有的采购员来咸阳为买505，已坐等一个多月了，还毫无收获；有的人与供销科的同志争执得脸红脖子粗。505神功元气袋系列产品供不应求，暂时脱销了，他们能不焦急吗？

505神功元气袋自1991年以来，早已声名鹊起，誉满中外。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万人腰上戴着老陕的505。它的发明者来辉武也在纽约第十一届世界发明博览会上获得了“世界发明家”的桂冠。这个在三秦大地黄土窑洞中磨练出来的关中汉子，以他传奇般的经历和成功业绩吸引着千千万万的人们。

## “小草脚下拥有整个地球”

1949年，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迎来了五月端阳，在离渭水河畔三里之遥的茅草屋里，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了。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小生命就是来辉武。

从宝鸡峡谷奔腾而出的渭河水，滋润着八百里秦川肥沃的土地，也哺育着来辉武，哺育着渭河滩上一片片生机勃勃的小草。

来辉武最喜欢小草。它能喂牛羊，其中还有叫不上名的中草药。他从小体弱多病，爸爸用中草药多次给他治病免灾。他更爱小草火烧不绝、刀割不尽、践踏不死的品格。每当寒冬过去，春草复生的季节，来辉武都会为萌生的春草而感到喜悦。他由衷地赞美说“小草步调固然细微，但脚下却拥有整个地球。”

来辉武祖籍湖北西部的神农架。当年，爷爷和奶奶挑着一副担子，两个箩筐，逃荒要饭来到这渭水河

# “神医”来辉武的

## 人生起步

——《国宝之光》之一

● 荏 苒 晓 寒 方 美



畔，落脚在一个小镇的破庙里。勤劳的爷爷每日上山砍柴采药，靠卖柴糊口。爷爷爸爸两代都是基督教徒，他们行善于人，积德于世，名扬于方圆数十里。凡到镇上逃荒的、要饭的、病残的人都得到过老来家的竭力相助。

来辉武的爸爸时常给他讲述爷爷奶奶用草药为村人治病的故事，还对他说：“娃呀，要记住，多积德，不做恶。男人积路边，女人积炕边，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一句好话三冬暖，恶言出唇六月寒，吃亏是福，便宜是祸……”。爷爷奶奶的故事和爸爸的话，在来辉武幼小的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象，他多想自己长大也能上山采药，去救助世人呵！

1966年来辉武已是户县二中初中的学生了。初中毕业后，是升高中再上大学？是学文、学工还是学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李鹏总理在陕西宾馆亲切接见来辉武，并与他合影。左一为李鹏夫人朱琳，右一为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

医？他还没来得及选择，“十年浩劫”开始了。神州大地一片史无前例的混乱，到处是天真的激动，莫名其妙的派战。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全被卷了进去。老太太，小娃娃也不甘落后。学校停课了，有的工厂停产，机关不办公，各级政府被冲击，被砸烂，领导干部统统靠边站。到处是检举、揭发、游行、辩论、抄家、戴高帽子、大字报、批斗会。人妖颠倒了，是非不分了。来辉武起初满腔政治热情，怀着对领袖无限敬仰，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投身到这滚滚的政治洪流之中。后来，随着混乱的升级，甚至出现打、砸、抢，才使得这个思想单纯而又爱动脑子的青年认真思索了。在户县二中，他和多数学生一样，最崇敬老校长白德全。白德全是语文教师，1937年参加革命，多次弃官不做，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上，是位治学严谨，为人刚直正派，爱护学生、德高望重，深受学生爱戴的人。突然一夜之间老校长却变成了走资派、叛徒。一次，一群红卫兵在殴打老校长白德全和其它老师。他气愤不过，上去劝阻，为此，遭到几个红卫兵的围攻，还挨了几拳头……他想不通，疑惑不解，无法忍受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径，从此慢慢地“逍遥”起来。他把自己封闭在小天地里，采集些小草标本，学习中医书刊，贪婪地充实自己。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一个人不能没有自己的信仰，也不能没有自己的追求！这

个追求应是干一番对人类有益的事业”。

1968年10月底，当人们还在热衷于清理阶级队伍，深挖阶级敌人之时，来辉武却约了几个要好的伙伴，在一天拂晓悄悄地告别了妈妈，带上几块家做的大饼，去了新疆。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虽然戈壁滩的刺骨风沙常常使他们冻饿不堪，但来辉武却格外高兴。渭水北岸是一片黄土高原，这里却是茫茫无际的大沙漠。祖国啊，好大的天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新疆，他寻觅拜访百岁老人，询问他们长寿的奥秘。他采集中药标本，向药农请教，记录本写满了珍贵的长寿经验。艰苦的生活换来了丰收的喜悦和精神的充实。他说：“大西北给了我痛苦的磨练，也使我深深地感到祖国中医药是全世界得天独厚的文化宝藏。由此使我萌生了将来一定要研究中医药，造福人类的愿望。”

1970年来辉武从学校出来，到户县八中当教师。那时，二中老校长白德全还未“解放”，正在传达室劳动改造。他经常给老校长以安慰，慢慢地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老校长的女儿白启华同来辉武都是户县二中的学生，只是她比他高一级，在校时彼此甚少来往。后来他们两人都到户县八中当教师，来往就亲密了。

1972年1月，这对情深意长的年轻人结婚了。新房里没有时兴的家具，漂亮的摆设，只有两颗挚爱的心碰撞在一起，共同踏上了人生的征途。白启华心地善良，理解丈夫。来辉武是个一心扑在工作上，推倒墙连土担的“拼命三郎”，还是个热心助人爱管闲事的“专家”。他犟，认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他对人热诚，别人给他一份心，他能将十份心全都给别人。白启华信任丈夫，全心支持他所做的事业。来辉武爱上了中医、中药，爱得如醉如痴，有钱都花在购买书籍、订书刊、买药方上。有时连家也不顾，甚至忘了妻子和孩子，她有说不出的委屈。然而，为了丈夫的事业和工作，她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她是教师，也有自己的工作，需要备课、批改作业，还要料理家务、孝敬老人、照管两个孩子，她用柔嫩的肩膀支撑着这个家，从不拖累丈夫。来辉武几经调动工作，她毫无怨言，就是在丈夫贫困的日子里，白启华也与他同甘共苦，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她是丈夫心中坚实的支柱，是来辉武事业成功的一半。丈夫感激通情达理、吃苦耐劳的妻子，是她给自己免除了多少后顾之忧。

1974年，平头布衣的来辉武，已是八中团委书记兼校办工厂厂长，他白手起家，七拼八凑借来2500元，凭着他在西安拜师学艺的本领办起了电机厂。他当技术员，生产、销售、装卸，啥都干，而且是拚着命干。

由于他以身作则，善于经营管理，头一学期，工厂就获利润3万多元，使近千名学生免交了学费，还给学校建起了十多间校舍。给每个毕业生发一把镰头一把锄，勉励他们为农业做贡献。后来小小的校办工

厂年创利润十几万元，经济效益和人均产值名列全省乃至全国的首位。当时校办工厂的供销员说：“来辉武办工厂，以身作则，勤俭办厂，艰苦奋斗，开拓前进，是他施展才华的一次演习。”

后来，他又担任了县委机要秘书、地区行政公署秘书、县委交通部副部长、县经委党委副书记和对外经济贸易局副局长。从当官那天起，他就发誓不谋私利，做人民的公仆，不做老官爷。

在户县、咸阳，不论职务高低，官大官小，平民百姓，凡是有求于他的，他都热情奔波，竭力相助。他说每一个官都象一味中草药，只有综合配伍才能为社会机体平衡阴阳，调养血气。想被重用，你得合时而来，成为如法炮制的一味。不然，便如孙思邈所说，徒有药名并无药实，与朽木无殊，不但于社会无益无补，反成为浪费。

### 楼观台寻道

1986年，刚满36岁的来辉武在党校深造之后，热情满怀地回到户县时，却不但没有被重用，反倒失掉了发挥才能的机遇，他烈火般的热情被泼了一瓢冷水。来辉武碰到人生旅途的第一个坎坷。

人，从呱呱落地到离开人世，总是在欢乐悲哀、幸福与痛苦、高兴与忧愁、顺利与艰难，甚至在血泪、火海中度过的。人生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有政治的、事业的、追求的、前途的、爱情的、生活的、疾病的，等等等等，还有说不清的七灾八难。来辉武在这艰难的人生十字路口犹豫、徘徊、发愁了。

父亲严格的家教，农家生活的熏陶，人生的某些



体验，以及三年中医、中药刊大的学习，使他养成一种怪僻的秉性，遇事老爱在祖国古老文化的宝库中寻找答案。看看炎黄子孙的先哲圣贤们，当他们困厄潦倒时，是怎样从失意悲愤中得到精神的解脱、重新激励振作的。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三秦汉子，可先哲圣贤的精神、品德，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啊！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在与贵族斗争中被削职为民，逐放于汨罗江岸。在失落潦倒的悲愤中，依然深入人民，了解人民，歌颂人民，写出了伟大的诗章，成为我国最早的伟大爱国诗人和世界文化名人。

西汉的太史令司马迁是三秦韩城人，因为同僚争辩而被免职入狱，经受了残酷的腐刑，仍然念念不忘著书立说。他的《史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通史，开创了纪史体的先河。

还有孙子、吕不韦……等等。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

在那些心烦苦闷、孤独寂寞的日子里，来辉武在陋室里徘徊，在我们民族文化宝库中遨游。他向先哲请教，和圣贤交谈，向他们质疑，请他们答辨。他的心灵和先哲们的心灵碰撞了，闪现出点点火花，一点点一束束的火花。这火花是精神营养，是巨大的力量。他失落的心得到了安慰，惆怅的情绪宽松了些，苦恼的思想解脱了些。夜深了，古城马路上的人流车往停滞了，人声喧哗没有了，隔壁电视机的音响关闭了，热闹嘈杂的大千世界暂时安静了。他从斗室的二屉桌前站起身，仅在一席之地空间踱来踱去，他瞅了瞅桌子、床上和简陋书架上、箱盖上堆满的中医药书刊。这是他独有的小天地，象是狂风巨浪中一个安宁的孤岛，又好似千里沙漠中的一块诱人的绿洲。在汹涌澎湃的生活激流中，只有这间斗室是属于他的。他从中医学古典著作中得到新的启示，会心自得地笑了。并自言自语说：“中医学理论真个妙，说是治病，也是治世；为人治病，也为自己；可医肉体，也可医灵魂！”他把中医书往桌边推了推，从书堆里翻出了一本《老子》来。老子曾是春秋时代的大思想家，道教的祖先。他朴素的道教唯物观点对我国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老子从河南来到陕西，在楼观台传授授道。来辉武专心致志地看着看着，耳旁似乎有楼观台隐隐约约的钟声在回荡。他嘴里念出声来：“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嘿！他重重地拍了一下大腿，高兴极了。猛地站起来，就连把老子的话念了三遍，一遍比一遍高，一遍比一遍快，第三遍几乎是引吭高歌了。

后来他还专程朝拜了楼观台。这里南依秦岭，北临渭水，竹林茂荫，风景秀丽如画。来辉武一口气攀上楼观台的主峰。往西，在太上老君庙后的悬崖上，有个黑咕隆冬的洞穴。据《周至县志》载：此洞左壁有

个石穴，不断有荫风溢出，透骨渗髓，凛冽不可久留。这就是老子用来炼长寿永生仙丹的炼丹炉。他在说经台徘徊了许久，似乎在聆听老子说经传道：“无为自化，清静自正！”那里有八角亭，有赵颀手书“上善池”的墨迹。旁边有一小水池，泉水从石雕龙口中喷出。此泉传说有二：一说老子有一天拄了拐杖来到此地，他把拐杖插在地上，用七香草化作美女，借以考验其弟子学道是否虔诚。插拐杖处变为一股泉水，称作“化女泉”。二说，元代周至流行千年不遇的瘟疫，死者无数。老子托梦，让人挖出此泉，凡饮泉水的患者，不过半天就康健如初。

他从楼观台下山时，遇到一位住在破窑洞里80高龄的道人。道人清贫如洗，精神却怡然自得。窑洞里摆满了五颜六色的易拉罐，来辉武好奇地问：“那里装的啥？”“全是药，是研究治癌症的药。”

他说不清是同情他，敬重他，还是怜悯他，在离开窑洞时来辉武说：“我今天上山没带啥好吃喝，给你留点钱吧？”

“不缺，啥也不缺。只是……”道人摆了摆手，他凝视着西墙上那幅太极图，灿然一笑，说：“只是缺德。”

听了这话，来辉武心灵深处突然震撼，就象童年躺在渭水河滩，夜晚在斗室听见那无声的钟声一样。过去只是隐隐约约，此时如雷贯耳，响彻云天。

在从楼观台返回的途中，他感到沉重，精神沉重，思想沉重，心灵沉重，沉重得难以支撑。什么失落、潦倒、寂寞、抱怨、惆怅，统统是个人的私利。为私利而忙，为私利耿耿于怀、不择手段，惶惶不可终日，此乃缺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乃大德。人生的坎坷，不幸的遭遇，无穷的嘈杂，不断的纷争，私利的计较，精神的烦恼等等，似乎全被楼观台清新的微风荡涤一净。这些天精神深处的一切，说到天上，摔到地上，他，中年的三秦汉子，到底要做个啥人？无私无畏，无私心胸宽。他的精神、灵魂、思想深沉了，净化了，他勇敢地迎接生活的严重挑战。

## 探求生命的奥秘

不知有多少个人，多少记者，多少次向他提出：“来厂长，你啥时候想起搞505的？”

起初他仔细地想，说不清，道不明，脑子里模模糊糊，朦朦胧胧，只是憨厚地笑笑，再问他，又是憨厚地笑笑。笑得单纯，单纯里有点稚气。哪一天哪个时辰？在啥地方想起505？天晓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来辉武从小受爷爷和爸爸的耳濡目染，20余年来，祖国医哲贤思想的潜移默化

化，滴水穿石的功夫，一时难以说清。在记者穷追不舍时，他思之再三，说，兴许是从“万寿无疆”几个字起的头。

问题很简单，人为啥会死？活蹦乱跳的人，吃五谷生百病，就病死了？老死了？能不能千岁，万岁，万寿无疆？

在神州大地人们高喊万寿无疆的年代里，他也喊过，那是向领袖虔诚、真诚的祝福，因为他是共和国的缔造者，理应万寿无疆！后来，他慢慢懂得了，向领袖美好的祝福只是一种朴素的感情，过份的愿望啊！

长寿和永生的愿望是与人类同步而生，古已有之。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人人不可违抗，千百年来，人类对生命的珍惜变为美好的奢望，寄托于既美妙动听又虚无飘渺的神话故事里。

中国神话里有彭祖活了800岁，有偷吃长生不老药的嫦娥，有与天齐寿的玉皇大帝、西天佛祖和各路神仙。希腊神话中有宙斯，印度神话中有安罗贺摩，西方神话中的夏娃、亚当，还有至今仍活在九天的上帝。这些无一不是生活在极乐世界的九重天宫、法力无边的永生者。

长寿永生的梦，人人都在做，梦境却因地位不同而各有不同。对帝王三呼万岁是权杖的作用。从秦汉武帝到清代末帝，历代王者无一不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利用权势，求仙药，接甘露、炼仙丹，饮人血，以求不死，永远占据统治地位的宝座。平民百姓也做求生的梦，为得到神人的可怜恩赐而虔诚的信教信道，烧香叩拜。少数人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参禅养性，修道成仙。求生的梦，一个接一个，一代接一代，是人类求远做不完的梦！

永生，也曾是科学家的研究命题。16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培根写了《生命和死亡的历史》后，曾设计一种青春丸和药水，以图延年永生。19世纪的俄国著名生物学家和老年学家梅契尼科夫认为，衰老的起因是大肠中释放的毒素使人自身中毒，他推荐人饮用酸奶，并切除大肠以延缓衰老。法国外科医生赛尔格·伏罗诺夫认为，各种腺体的退化是衰老的基因，曾把猿猴的性腺植到老年人体内，结果失败了。苏联学者博戈莫莱茨曾提出不少预防衰老的主张，他想使斯大林返老还童活到100岁，但也绝望了。

执拗的人类，世世代代都在追求着长寿和永生，但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欢喜。长生不老是梦幻，延年益寿是可能的。

来辉武徜徉在祖国的医学宝库里。他在春秋《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大论》看到古人是怎样摄生的。他在唐代《千金方》、元代《格致余论》、明代《遵生

八笺》中看到古人养生延年的论述，关于人的发育、成长、壮大、衰老的阐述，关于耐老、不老、增年、延年的药物，防病治病的论述。“养生”、“摄生”、“道生”，古代医学家主张适应环境，调摄精神，卫固身体，防避外邪。古人认为：医已病之病，为下医；医欲病之病，为中医。医未病之病，为上医。防病防老，延年益寿，就是大医之道。

《素问》载：“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来辉武从资料上看到历史上年龄最大的长寿老人是古代高僧慧昭，活到290岁。唐代医学家甄权、王冰和药王孙思邈等百岁开外仍能著书立说、出诊看病。英国的弗姆·卡恩活了209岁，经历了12个王朝的变迁。匈牙利一对长寿夫妻，丈夫约翰罗文172岁，妻子约翰沙拉164岁。共同度过了147年的恩爱生活。日本有一个叫万部的农民194岁时被天皇召见。当时她的妻子173岁，儿子155岁，孙子105岁，堪称长寿之家了。

但他们还是死了。咋样死的？为啥而死？

一个英国农民托马·斯佩普活了152岁，经历了9个国王。当他被宫廷召见到伦敦后，他死了，据说死于饮食过度。著名解剖学家加费解剖了他的尸体，惊奇地发现，他的肢体和脏器没有过早衰老现象。那个活了156岁的土耳其人托罗·阿加，是因前列腺炎引起尿毒症昏迷而死的。来辉武看到了现代解剖学家的结论：经过对老年人的解剖证明，所有的人都不是由于年迈，而是由于患病才导致死亡。科学的结论使他高兴极了，人生70古来稀应改为人过百年不稀奇。他走南闯北，跑遍了渭水河两岸，爬越秦岭巴山，到处拜访老寿星，问他们的性情，问他们的起居，问他们对人处事的态度，问他们的爱好？问他们有病没病？没病。他听了一楞，然后欣然笑了。他说真理就是简单。简直叫人难以置信。万寿无疆敌不过四个字：人死于病。

来辉武静坐斗室，在桔黄灯光下游历在苍苍茫茫的医学瀚海之中。他的目光在那黄旧的书页间粘连着，思想在书页之间奔驰着。

那是为深夜昏厥假死的楚太子虢施行针砭术，起死回生的扁鹊吗？他问扁鹊：你三次提醒蔡桓公身有疾病要及时诊治。他不听劝告，终于病入膏肓。你断生死如神，这是为啥？扁鹊说：“人有阴阳。阴阳失调，藏气不足，谓之不治也。”

那是在书案前著书，思想与儒、墨三足鼎立的庄周吗？他问庄周，您妻子老死了，您为啥不哭，反其踞鼓盆而歌呢？岂不怪哉？庄子不答，而桌上的书中却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气……故曰通天下一气耳。”



那是 141 岁才告别出诊看病、采药之途的药王孙思邈吗？药王走秦岭、上太白、攀峨嵋，终生不仕，甘为布衣解痛治病。来辉武崇敬他，早已把“天地有可消之灾，形体有可愈之病”、“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等至理名言，铭刻在心。

那是身背药囊，手拿药锄，穿梭于五台崇山密林间采药的李时珍吗？他采集的是普通草药，一剂能使患者回春。

5000 年古国的文明史上，诞生了多少位医药先哲？莽苍苍的医学之海，涌现出多少个医药学派？雷公、岐伯、仓公、华佗……是哪一位先贤为来辉武指点迷津？张仲景说，张从正说，朱震亨说，张介宾说……是哪一派学说为来辉武阐释病因学中的疑惑？他知道，悠久的中医学临床实践中，每一个学派都有其疗人治世的功德和魅力。哪一位医圣都是在寂寞的岁月中期盼后人发展他们的思想，造福子孙后代。

灯光依旧昏黄，斗室寂静得出奇。来辉武灵魂深处不再磕磕绊绊。他忽而百年，忽而千年，与古人交谈，与今人商榷。他的思想在阴阳、气血、经脉、肺腑间自由地翱翔。此时此刻，人世间所有的烦恼、嘈杂、纷争都被执着追求的洪流冲刷到隘谷险峡之外。在天地混沌与明朗间，在漫天雷电的欢腾与狂舞中，他却安祥地又一遍精读《内经》。“百病皆生于气”。这振聋发聩的 6 个字如一闪电在混沌的天地间划过，突然雨过天晴，豁然开朗。

《内经·素问》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流成”。

《内经·灵枢》说：“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

来辉武研读这部仅“气”一词，就频频出现 2952 处的《内经》。一次次地由表入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一次又一次地拓宽对气的生理与病理的认识深度和广度，从《内经》中的病症、机理剖析中，汲取营养，开拓自己的思维。

宇宙皆由气生，人是个信息开放的系统结构。人的生命是气在不断地运动。气在人体中沿经络运行不息，循环往复，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气是人体内的原动力。气分阴阳，可消可长，可升可降。气的运动是人的生命之源。气机不畅，若有丝毫壅塞，则脏腑失和，气血不调，必百病丛生。气又可分为正、邪两气。人体的抗病力和机体生存的物质基础及正常活动为正气。一切致病基因皆为邪气。邪气所凑，正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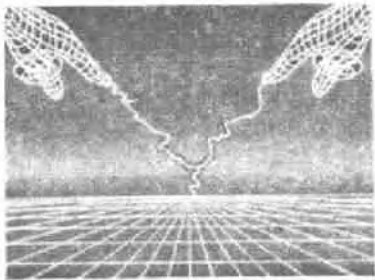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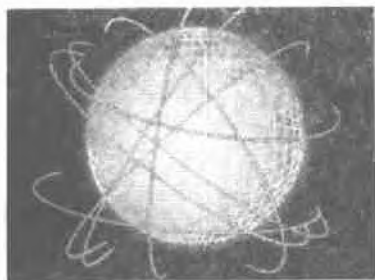
他大声朗读孙思邈的话：“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众灵



●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来辉武在美国纽约第十四届世界发明家博览会上获“世界发明家奖”。

之苦。”“不得问其贫贱富贵，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通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勿避险阨，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谓苍生大医。”

承继着古代医圣的成功实践，采撷着中华医学的理论精华，来辉武在探求生命奥秘的人生道路上起步了。



报社等各方面都意味巨大的经济利益。最终在法国大革命整十年后，巴黎一家名为《讨论报》的报纸以其宣言结束这场跨世纪论争。标题是：我们必须生存，因此也必须放弃拒绝登广告。

从此报刊便驾起广告的马，而且其速度愈发神奇。对一个世纪以前的任何一张报纸来说，简直不可想象，广告版面会大于其它内容。而今天对中国大陆以外的报

广告是一种宣传，而对这宣传的宣传却极少，正如形形色色的文艺节目制作人那样，观众极难注意其存在，而事实上他们才是真正的主宰者，也许古人云：“真人不露相”也包括这一层含意。

其实只要揭开形形色色眼花缭乱的广告，便会发现一群东奔西走、神通广大且颇为富裕的神人或称人神，仅在北京他们便有逾千之多。笔者曾阴谋创办一民办联系广告者协会，且颇自信该协会将成为中国最神通广大的民间组织，但终因众多未来之会员重任缠身并且绝大多数都以为此行当不可过于张扬，否则于事业于自身弊大于利，故协会便夭折于摇篮中。

### 引子：轻舟已过万重山 ——拉出一段广告小史

中国广告究竟起于何时？韩非子曾记载过：“宋人有沽酒者，为酒甚美，悬帜甚高”。所悬之帜后人称酒旗或酒帘，若此招算广告，那中国广告史便可前推两千年，也够得上世界之最。

不过祖宗们的广告好象也就是酒旗多。象唐代杜牧的名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象元曲《后庭花》里“酒店门前七尺

布，过来过往寻主顾”。最招人眼的要算“水浒”中武二郎在景阳冈下看到的那幅“三碗不过岗”，它既说明酒好，又为顾客的生命安全负责，比起如今众多山呼海啸的广告来实在是要高出几分。

除酒旗之外，当然还有叫卖、装饰、幌子等等。不过现代意义的广告还得说是在产生印刷术之后。

据说，中国第一幅印刷广告产生于南京，广告中有两位戏装男子，一人手指右眼，表示自己右眼有疾，另一人手执一瓶眼药示意。

然而报刊广告却让老外占了先，尽管他们也曾为报刊能否登广告争来闹去打了二百年，时而这个皇帝禁止，时而那个总统又宣布提倡。或曰：传播广告信息不是报刊义务；或曰：广告位置应优于新闻，因为它对登广告者、看广告者以及

● 张梓 刘凯

# 中国广告黑洞





## ●矗立在深圳闹市区的政治广告

纸来说不如此倒不可想象。报章的2/3甚至3/4应该是广告，这几乎成了报人心中不可撼动的法则，否则他们会直着眼问你：那靠什么来发薪水呢？不仅仅是报人，杂志电台电视也争先恐后，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斥广告的灿烂与肮脏。目前全世界仅纯商业性（也就是广告的代名词）电台电视台就各有500多家，很难设想每天播来播去都是广告的电台电视台居然会有大批忠实观众，可的确是有的。

广告在新中国同其它所有事物同样，有一个起而后衰终达昌盛的过程。建国之初，大量旧中国存留物被禁绝，而广告却一如既往得到延续。1949年9月30日的《解放日报》与10月1日的广告同样，在“庆祝人民政协，拥护世界和平”的通栏标题下登出上海亚美药厂的广告：九九维他，粒粒滋补，人人必需，个个爱服。

大东南烟公司的白兰地版香烟广告：魏郁芬芳，回味无穷

内容无异，意义却迥然，前一日所登可谓旧中国的最后一批广告，而后者则堪称新中国广告首篇。

自然，这兴旺绝不可同国外广告相比。建国17年大陆报纸的广告版面从未超过1/8，而且每况愈下，文革伊始便被列为资产阶级象征而被彻底禁绝，除演出、比赛、杂志目录广告以外，整整14年再无任何广告踪迹。那个年代长大的孩子对广告的印象就是旧中国殖民地的表示，如日本仁丹、美国电影《出水芙蓉》。经过漫长的空白后，1979年仲春，《人民日报》小心翼翼地在4月4日第6版最右下角，刊出了荣宝斋半块豆腐干大一幅广告：收购古今名人书法绘画、古旧砚文具，按质论价，手续简便。

编者用心良苦，以至于不属于那种看报从第一个字一直读完最后一个字的细心读者绝不会注意到这个微弱的信号，而且即便有人谴责它，也尽可以辩解为告示。

疏忽，也许是因为默许，使《人民日报》的老少编辑决定放胆再走一步。13天后，4月17日《人民日报》第4版正式刊出商业广告，为重庆地质仪器厂推销S9002半九英寸9轨双缝磁头，配有照片且版面比13日前猛增数倍。

### 上篇：世人皆醉君独醒 ——拉出若干广告骗局

令枪响过，闸门升举。从那天至今，广告如浩浩长江黄河奔腾而下，滚滚不断，且愈发汹涌。不算形形色色的街头广告，全国上千份报刊和同样多的电台、电视台无一不染，真让人惊讶它们竟然会有如此之多，都从哪里来？

广告多，拉广告的更多，在文化界可谓是人动手，大打人民战争。

由于报刊数量与广告客户之间比例不同，前者是多多亦善，而后



者尚不能达到前者要求。于是报刊特别是大量小报刊为了自己的经济效益便在多拉广告上展开明争暗斗，这争斗不仅使广告质量特别是真实性大受影响，即引起范围不同之声讨，也使新闻文艺界遭遇若干麻烦。

1987年，河南内乡县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波及全国28省、市、自治区的重大广告诈骗案。作者是个年仅24岁、初中毕业的青年农民，名叫王阳。他利用广大农村青年急于寻找就业门路的心理，通过国内的17个省市级广播电台及7家省级以上报纸发出如下一段广告：

为了加强经济技术与协作，河南省内乡县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招聘特派驻地办事员40名，……分驻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大城市……每月发给80元基本工资，奖金另定……考试费每人4元2角，按分数高低报名先后录取前40名，1987年3月10日寄发录用聘书……

短短3个月，除西藏和台湾省外，有28个省市的2300名青年报名应试。王阳初骗成功，他一手攥着2300张汇款通知单，另一手编出一张新的收款理由，将每人4元2角费用提高到30.2元，并且规定：不补寄款则不批改答卷，超过1987年2月25日未补款者答卷自动弃权。至于试卷，是他最不操心的事，绝不如广告自称是“经有关

专家学者拟出、经本委员会审核定性”，而是全部抄自初、高中的课本，且把四门课程列在同一张试卷上，其中是半数以上连他自己都做不出来，更没有什么“专家学者组成的批改小组及电脑计分显示器”。事实上他从来就没打算在试卷上批改一笔，除了钱以外，他对其它毫无兴趣，所有试卷都被他扔进城外河沟的污水中。

仍然有500多位天真的年青人上了他的当，或者说是上了广告的当，再次汇出28元钱。一个四川考生事后写信说“我如果不补交这28元，那4元2角就算白交了。”直到破案之后，许多人还不相信这是一个骗局，电台播过，报上登过，怎么可能会是假的呢？原来他们牢固的信任全部维系在电台报纸的保险系数上。

其实这保险系数近等于0，对新闻单位来说，除去国家拨款之外，唯一收入便是广告。没有广告也就意味着没有奖金及众多福利，在物价大涨的今天，没有这些收入将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可除去极少数热门新闻单位，一般的报刊电台都吃不饱广告，尤其是象王阳这种自己找上门来的就更不多。想拉还拉不到呢！“别说他的广告上有内乡县经济技术协作委员会、内乡县新闻宣传部的正式公章（公章均为王阳私自刻印），即使没有，只要他肯出血，找个单位内部熟人说说，我们

也发，原因很简单，我们也是人，也要穿衣吃饭。至于找熟人还不容易吗？几张票子甚至一盒鬼子烟熟人也就有了。”一个签发过王阳广告的编辑这样告诉笔者，说此番话时，他坐在办公室破旧的藤椅上，两眼直盯盯地瞄准屋顶剥落的墙皮和水浸的花纹，仿佛那是一幅百看不厌的美妙图案。

此仁兄的描绘及观点肯定不是个别的，正因为不属个别，所以王阳共寄出39份登广告的函件，结果2/3的单位予以播发，王阳为此支付了5000元广告费，这钱来自镇信用社的贷款，而他回收到总共2921张价值3万多元的汇款通知单。县邮局的所有职工还从未见过这样多的汇款寄给一个人，因为他们尚不明白广告的威力。而产生这种威力的那24种电台报社谁也没稍稍品味一下王阳私刻的那枚公章：“内乡县新闻宣传部。”这种官方称呼无异于一个玩笑，它说明作者的无知，而如此无知的作者却靠这枚公章敲开众多电台报社的大门，究竟是王阳傻，还是电台报社更傻？

此事被揭穿也属必然中的偶然。凡是一有钱在里掺和，必有人讲究认真二字。黑龙江一位年轻人不知出于何种动机（也许是不甘心白交32元钱，也许是真想得到那份工作）千里迢迢自费寻到内乡，住进王阳租作办公室的招待所，在那块挂着“内乡县经济技术协作委员会”的小木牌下还贴着一张纸条：“上郑州开会走了”。这条子在十天中内容一字未变，而落款日期却魔术般地不断更新。黑龙江小伙感到自己受到愚弄，于是便在3月的最后一天上告县政法委员会，王阳这个原属师岗镇王营村的农民也立即法网难逃。这案子简单到不用侦破，只是没人管而已。

这种简单到不用侦破的广告案近年很有几起。河北献县一农民在

北京海淀成府街上自挂一电子公司的标牌，搞什么“记忆灵学习机”，在广告中把产品吹得天花乱坠，而首都许多报纸对此并未稍加考察，便原文照登，使2万多中学生大上其当，等国家工商局接到举报后查封该公司时，这位同样是20多岁的农村小伙子已经到手100多万元，另一“电子增高器”案更叫人啼笑皆非，众多矮人（其实很多人并不矮，只是渴望长得再高大些）被报上的广告哄得如痴如醉，争先解囊。谁知那玩意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多人被电击晕，更多则是被电极灼伤，至于身高则巍然不动，花了钱受了罪却毫无报答。

还有用不着明眼人细琢磨，明明白白地透着假，照样在耀眼处理直气壮地站着的“致富信息”，好象买上一条顷刻便会黄金万两。笔者信手翻开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办的《追求》杂志1989年第11期，内有：为您致富！传受肥皂、洗衣粉最新生产技术。用100元设备可生产肥皂600条，每条成本0.25元；或洗衣粉500袋，每袋成本0.5元，体积、重量均达到国家标准，原料各地都有。单项学费250元，两项360元，食宿自理，学期3天，包教包会。

据温州市消费者委员会应全国上当受骗者的强烈呼吁在1990年6月底《中国消费者报》上公布的第一批广告骗子名单，收款不发货11家，产品名不符实的10家，象丰乳器、针灸美容器、美容消斑露、记忆增强器、空心面条机等一概均属骗人，但公布结果也只能是要求有关单位组织力量查处，况且这公布的效果不敢说没有，但确实有限。

广告的刊登者到底应该痛骂还是应该得到某种谅解？

比起为了钱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他们来，有些人走得更远。

1987年6月11日，《中国人才报》出版一期中外新闻史上少见的

“双胞胎”。刊期同样是17号，内容却迥然不同。其中一张四个版面刊登的都是通常的新闻和文章，另一张从第一版新闻便有不同。

二版整版是：记平谷县山东庄经济联合总公司。

三版整版是：大兴县乡镇企业专题报导。

四版整版在“招才纳贤，振兴大兴”的通栏标题下，以新闻形式介绍五个企业及县政府关于人才引进的优惠办法。

前一张，按该报正常印数5万份向全国发行。后一张印了2万份，一部分回给平谷、大兴两县，另一部分悄悄做了处理。在3个半月的时间中，两个县的人一直蒙在鼓里，以为他们手中的这期《中国人才报》是发行到全国的正常报纸，他们为这张只有自己才能读到的报纸支付了21500元人民币。

大兴县长刘振山火了：“这根本是做生意骗我们嘛！”

县横向经济联合办公室刘玉章更是气愤：“只听说袁世凯的儿子印假报骗他老子，没想到今天有人靠印假报来骗钱。”

这真假报纸便是拉广告者创造的杰作。

5月下旬，大兴县来了位名片上印着“《中国人才报》经理部记者”的年轻人（经理部而为记者，这可称为一大新闻），代表该报社提议为大兴县搞两版专题报道，按广告面积计算收取费用（新闻之二：经理部记者有权拍板替主编做报纸新闻的主。被世界新闻史称为“最伟大的报人”的普立策先生在85年前就曾警告：商业主义在报业经营中占有合法的地位，但它仅仅限于经理部。如果它侵犯了编辑权，那便成为必然的堕落与危险，一旦发行人仅仅注意商业利益，那将是报纸道德力的结束”）。

初闻此纯商业化建议，县里人还感到有些为难。“记者”又表示将

在专版上分别刊登县长和乡镇企业局长的照片和讲话。

绿灯亮了！县府有关部门把“任务”分派给下属工厂，乡镇企业局的干部则陪着“记者”到各乡企业去“洽谈”业务。

几乎在同时，《中国人才报》的“记者”，也正为9500元的专版，以同样手段，在北京平谷县游说。

结果自然把当地领导、企业家如幼儿园小朋友一般哄得团团转，但该报极失策处却是为何不假戏真做，却要闹一个一身二脸的笑话，试想如果不露此怯，即便通篇皆为赤裸裸的广告文字，谁又能拿它如何？

有些貌似浮浅之事，却需从极深处着眼，否则便中了对方的障眼法。

提起1987年春夏之交首都十几家新闻单位组团西北之行的往事，也许还有人记得。此事先属公开的秘密，后成为“公开的新闻内幕”，并见诸报端，令人多为感叹。

记者团西北之行名为笔会，实则拉广告，以致于有些记者团成员后来对此事进行了抨击。事实上许多记者虽自称启程时被蒙在鼓里，但此行的真实目的他们还是略知一二，只是后来事情发展得越来越离谱，并引发其思考直至思想斗争，导致记者团分成两大阵营，一部分继续西行，另一部分打道回京。

最明白的当属此次活动的牵头者——《中国广告报》西北记者站。该站能量颇大，敢想敢干，由于活动中途若干记者离团，便数次派人直飞北京搬记者来撑场面，并周旋于西北诸多厂家之间，将活动弄得沸沸扬扬。不仅如此，该站拉广告也很有一套，最能干的当属一位女记者，一年中拉了26万元，在公共汽车上都能拉成广告，只可惜不知何因英年早逝，过早离开工作岗位。

记者团一行途经西安、延安、宝

鸡、天水、西宁、兰州，历时40余天，采访了西安石油勘探仪器总厂、陕西重型机械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国营262厂、黄河机器制造厂等厂家，当然也吃遍了这些厂家，并由厂家派车游遍整个西安及至整个西北。

从《新闻采访团组织计划（草稿）》中可以得知：此次活动预计行期50天，计划参观23个企业，预计支出50000元（包括摄制电视片费用10000元）而《组织新闻采访团情况一览表》则表明预计收入110500元，这说明此次活动下来，可净赚60500元。另外，作为甲方的《中国广告报》西北记者站与若干厂家签定了协议书，其中甲方与作为乙方的甘肃天水长城电合金材料厂签定的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甲方保证按乙方要求的报纸（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机械报）上稿并明文规定文字质量；乙方在5月15日前汇款5000元到甲方银行账户；如甲方没有按协议办，全部退款。

也许这可算作一桩买卖，也许这是一种新闻捐客行为，也许若没有这次记者团的参观采访，西北这些偏远地区的厂家就永远不为人知，西北地区就难以开放搞活——假如宣传有如此大的功效。

若论买卖双方，有些厂家是自愿的。因为“这要比自己登广告好”。也有一些厂家不愿意，而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则明确表示不接待，原因是“要钱太狠”。

有意思的是，这次西北之行的内幕是由新闻界本身或者说记者团内部捅出来的。这一方面足以说明中国新闻事业之透明度，另一方面也证明此次活动的内幕比较黑暗，黑到连见多识广的记者们也难辨东南西北，深感被人利用并作若干反思。

西北之行的第八天，记者团里三位老同志与《中国广告报》西北

记者站薛主任等一班人有过一次会谈，名为会谈，实为谈判，谈判结果是约法三章：1、不要对外叫记者团；2、不承担宣传义务，不是参观了工厂就一定要宣传，遇到不好的事我们可能还要批评，我们有我们的原则，不能违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3、不接受礼品。

他们极力想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用记者团成员之一、《中国青年报》记者王安的话来说是“我好象入了个套子”、“我觉得我也怪可怜的，象是被人卖了”。

## 下篇：广告出自咱的手 ——拉出不尽苦与甜

变革的年代，一切事情都需要重新估量。如果说发生在1987年春夏之交的这次西北之行事件是新闻界拉广告的一场前哨战，放眼今日广告，则呈大繁荣下小繁荣。仅报刊而言，广告专版、封面封底、插页中缝，小则玲珑数字，大则铺满整版，如此之多的广告自然需要花费更大的力量去“拉”。

但又不完全用拉。中央级大报省一级报纸以及王牌的专业性报刊一般来说不愁没广告可登（电视台更不必说）。为登一次广告而预约排队，请客送礼早已是极平常的事，而且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广告事业越是发达，广告也就越难打，许多商业上的角逐甚至商战，实际上在登广告之初就已开始。能够在有影响的报刊上亮出广告绝对是一种优势，本身似乎已说明了一切，这也正是诸大报大刊的广告版面“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原因。

位于东单西裱糊胡同内的《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两家报社，数十年挤在一座破旧的红砖小楼中办公，如今已建起一座漂亮的办公大楼附带同样漂亮的大门，并从密

集的居民区中向北打出一条宽阔通道直通东长安街，不仅方便出入，而且使南来北往的人们都能仰视到两家报社的巍峨。知情人相告：大兴土木和拆迁民房等一系列举动所需巨额资金主要来自承办广告收益，就是说，报社广告部是真正的大款。不仅如此，广告部的进项还直接左右着报社人员的工资及奖金收入，真可谓一人辛苦换来万人甘甜。

然而那些名气不太的报刊则无此优势，又不甘心眼巴巴看着别人玩广告赚大钱自己却无所作为，便只能拼命拉广告。

在激烈的拉广告角逐中，涌现了一批出则必胜的佼佼者。他们或广种薄收，或重点进攻，或迂回策略。或铁嘴钢牙，总之个个神通广大，独步天下，好话说尽，手段用绝。笔者认识一位中央某专业报纸的编务，名为编务，其实专业就是负责拉广告，姓王，众人尊称其为“王爷”。这称呼绝无任何贬意，相反还融几分崇敬。爷者，长辈也。其实他还不过三十岁，人之所敬他，就因为他拉无不胜，而且往往在别人屡拉屡败处建树奇功。距离北京不远的河北某县，曾数度被京城报刊广告业光顾，均因当地人缺乏传播学意识而无所收获。“王爷”得知后遂打算一往，而且事先夸口起码拉到十家。到县府后他听说县委书记父亲病危，便打听地址买些补品前去探望。谁知方进院门，已闻哭声一片，原来正赶上老人过世，“王爷”当即跪下叩了三个响头，引得两眼红肿的书记大人既感动又惊诧，忙上前搀扶问贵客来自何方。“王爷”似结巴似哽咽地说：“受朋友之托从北京到县里来办点儿事并顺便探望老爷子的病情，谁想正遇老人离世，权当是替朋友尽晚辈一份孝心。”说着又要下跪再叩，书记及家人连忙上前死死拦住。

接下来的事情再简单不过，第二天书记连丧事都委托家人料理，

自己要一辆北京吉普，陪“王爷”走了全县12家企业并签了12份广告合同，还收着若干当地的土特产品如花生蜜枣、香油之类，众厂长皆以为，能带着书记出来做广告的必是了不得人物，得罪了他便是得罪了书记，而书记又是谁敢得罪的呢？其实只有书记和“王爷”明白，这都是三个响头的功劳。而书记并不清楚，这三个响头对“王爷”来说不仅意味着同行和领导的赞赏，更意味着一犬笔回扣，以一份广告5000元计算，12份合同共值60000元，按近年回扣的最低限额，“王爷”可提成30%，就是6000元，合每个头噬出2000元，真是叫人又嫉妒又羡慕。但也不能不承认，如此值钱的机会并非人人都能得到。

一位杂志的副总编曾很矛盾地谈起这种人。首先他承认杂志社不能不依靠他们，否则杂志便难维持生存。至于其所得报酬，一方面他觉得拉广告也不容易，而且象请客送礼这类不能报销入帐的开销很大，所以拿回扣并非无理，况且若无回扣，杂志社便会失去广告来源。另一方面他对如此巨额的回扣又感到困惑，尤其是那些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回扣。“同样是人，譬如你我，就能力而言也不能算低，只是分工不同，缺我缺他都行不通，可为什么他一张嘴就能得那么多钱呢？再想想那些普通的工人农民，年收入也不过只是他们一两次回扣所得，这到底公平还是不公平？”他惶惶地同我们，我们却不知该去向谁。

一个人单枪匹马独“拉”天下，喜怒哀乐只有自己品味。有些先行者已实践“一个篱笆三个桩”之俗语，从单兵操练引申出集团作战，在形式上则类似互助组合作社，只是名称不同，成员间借信息互为联系，有事聚首，无事则散，看似有形，又似无形，是一种散漫的集体。

城南小巷深处有一僻静四合院，灰墙灰瓦，青砖漫地，绝无小厨房一类的民办建筑，清冷中透着雅气，如此院落在今日京城已不多见。

院中住着一对离休的老夫妻和一位保姆。二老有子，姓王，是一位能干的记者。王记者结交广泛，此处遂成聚会场所，并有一小范围传播的雅号——吐鲁番俱乐部。

此雅号极易让人误解为维族兄弟的欢娱之所，其实不然。去年夏，新疆吐鲁番举办葡萄节，为扩大影响，组委会特邀全国数十家报刊的记者前往助兴，此为美差，集吃喝玩乐于一节，面对好客且能歌善舞的主人，众记者着实陶醉了几回。当然，同行相聚也免不了有一番切磋。拉广告是近年来新闻界颇时髦的举动，同时也是开放搞活的路子，所以在吃葡萄看节目打扑克搓麻将之余，这方面的话题略多一些。在葡萄节的最后时刻，来自京城的众记

者围坐在一桌，举杯共叙友谊。席间王记者大发感慨，言在座诸位虽皆为京城老记，有缘在此一聚，但返京后各为其主，疲于家事国事天下事，虽头顶同一块蓝天，却定如天各一方，音信渺渺，日久则忘，不如搞一联谊会，日后定期小聚，有福同享，有难同帮；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定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众记者闻言倍受感动兼振奋不已，当即议定联谊会又名吐鲁番俱乐部。取其纪念意义，又议定王记者家暂为联谊场所，待日后大家都成了款爷，再集资于某繁华地段搞一幢小楼，把吐鲁番的招牌正式打出去，就象“星星”们在西四练摊的好运俱乐部那样。

往后，王记者家那僻静的小院果真不定期地有了客人，而联谊的主题也自然而然地转到拉广告上面。他们越来越认识到，广告文学是一种具有很强生命力和诱惑力的魔方，是一种可随意着色、信手涂



抹却真正体现自我兼多方面价值的大钞票。他们还认识到，若众老记联手，这魔方的魔力就会更强，这钞票的价值也就会更大，所以绝对是一项事业，并且这事业由于众人检柴而更具前途。

正如所料，局面很快便被打开。此刻他们的感觉是：企业需要他们，社会呼吁广告文学。

据王记者回忆，他们最惬意的一次是在去年十月“那是真正的绑大款”，王记者略一沉吟，又压低声音说：“就象过去吃大户”。京城十月，是金色的季节。

此次合作被众记者称为“南郊行动”，因为“大款”位于京城东南方向，原南郊农场一带。此地处于朝阳、丰台、大兴三区县临界，阡陌纵横，稻麦飘香，京津塘高速公路擦边而过，乡镇企业点缀其间，优势明显，腾飞只是早晚的事。

王记者与胡厂长是在火车上相识的。旅伴之间本来萍水相逢，理应逢场做戏，下车便行同陌路，但他俩却成莫逆，因为经过一夜长谈，他俩都找到了彼此感兴趣的支点。胡厂长是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在京东南有一块自己的小天地，生长于斯，奋斗于斯，也成功于斯。他有钱，有汽车，有小洋楼，但他不满足。他知道，南郊农场是块风水宝地，又守着高速公路，将来不定会怎样。近期有人在亦庄一带打深井测水质，又风传将在此建开发区，更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他想在这一切到来之前把“蛋糕”做大，成为当地的实力派，将来再求发展。

王记者则对胡厂长的深谋远虑大加赏识，言胡厂长的出现改变了他对农民企业家的看法，使他看到了中国农业插翅腾、上台阶、高水平的一缕曙光。当即呼胡厂长为大哥，并表示愿以小弟微薄之影响力，召唤首都新闻战线上若干有正义感的勤奋记者，用手中笔来谱写新时代新农村的新乐章，讴歌这来自

京城东南方向的和熙秋风。

以后的事情便顺理成章且颇多浪漫。先是胡厂长出车并亲自带队率众记者在旧宫、亦庄一带的鱼塘里痛痛快快地连钓两天鱼，钓不着便下网，每人每天可“钓”走十余斤。鱼老板看着心疼却不敢言，只得在夜深人静之时将鱼喂得极饱，并撒入大量的鱼骨粉，使鲤鱼草鱼鲢鱼们都深潜于鱼塘底层以逃关系的厄运。垂钓之余便是撮饭，不吃尽兴玩尽兴绝不谈正经事。就这样持续浪漫了数日，直钓得众记者家中冰柜爆满，撮得人人都倒了胃口，胡厂长才将他们请到工厂会议室，关起门来商榷发稿之事。

如果认为胡厂长待众记者不薄，众记者在关键时刻便心慈手软，那便大错而特错。钓鱼撮饭只是履行一种必要的手续，谈生意不容掺杂任何感情因素，对于这一点胡厂长比记者们更清楚，更何况此次请来的人多而广，日后影响必定不同寻常。所以小气不得，更大意不得。

谈判持续了一小时便告结束。这归功于双方的直率。事后王记者说：“谈钱是一件光彩的事，在钱上面纠缠则很不光彩，干这种事我们都是老手，广告文字基本上已有定价，议价是相对的，胡厂长很开窍”。

对于谈判议定的价格，笔者并没深问，从王记者闪烁其辞的回答中可估摸出每篇在三千元左右。事隔不久，以此为题材的文章在多家报刊上陆续诞生，在内容及文字上则千篇一律，无上乘之作，不过题目都颇堂皇，基本映照出胡厂长及其企业方方面面的风采，尽管胡厂长所期待的轰动效应并没有出现，但于茫茫大海中还是溅起了几点小小浪花，起码在京城东南方向，胡厂长还是神气了一阵。

一次笔者去一家报社办事，巧遇一昔日女同窗，惊喜之余便坐下

喝茶。此女名叫钟小妹，江苏南通人氏，上大学时也算朵花，只因性格过于娇嫩，未能墨山显水有所作为。但据笔者所知，暗中倾慕她者甚众，都是些体魄貌端的文学青年，或直白或暗示或修书或设套，终未能将其弄到手。据说她后来跟系里教古典文学的有妇之夫关系暧昧，又据说她中学时便有过师生恋。不过至今她在笔者记忆深处依然姣好，只是笔者对久别重逢略感突然。

钟小妹如今是该报社颇有实力的记者，虽脸上仍带着可人的微笑，却也隐隐透出几分江湖气。笔者本想与其促膝长谈，却被一陌生男子打断。来人乃京城一家红得发紫的民办企业经理助理，要求在该报开辟一广告阵地。在此之前已数番造访未果，此番又来，隐隐露出背水一战的决心。小妹则沉着应答，每言必含玄机，指明该经理助理办事有诸多不妥，尤其是要求半月之内见报最蠢不可及，除非报社主编行偷梁换柱之道，生挤别家广告外，别无它法，这就需要内部有人去做主编工作，并且此人必须说得上话，起码是个部门头头，而部门的头头一般来说不会给人白干，因为根据惯例，主编这道关极难打通，有时甚至需要打点打点。

经理助理早已心领神会，随即恭请小妹代为物色一部门头头，并许以重谢。小妹听罢又指点道，某报近来迅速崛起，订阅及零售量日趋火爆，广告版面更是难得一上，若是有意，我可介绍一位那边报社主管广告的朋友，此事如能办成，这边的事也不难办。经理助理当即电话请示，暗示此事光明与黑暗并存及利害因果关系，结果被上峰授权全权处理此事，只能办好，不可砸锅。

接下来的事情也就好办。经理助理拿着小妹的字条马不停蹄奔那家报社，临走时留下支票还拉着



小妹的玉手千恩万谢，声明广告若近期见报，第二天便在“明珠海鲜”请客，届时务请赏光。

待来人走后，笔者如窥见别人秘密一般心中甚是不安。小妹则毫不介意，并后悔本该今日就令来人在“明珠海鲜”摆桌，顺邀笔者一同前往。后来得知，小妹之所以提及另一家报社，是因为数月前那家报社记者部主任曾为小妹拉来一合资大企业，使小妹受益匪浅，至今凡小妹出行，均由该企业派车，并且随叫随到。此次回拉一个，也算来而有往，还朋友的情。

此后，又耳闻若干大报帮小报、富报帮穷报、电视台帮电台一类令人感动之义举，只是不知此属个别还是普通、偶然还是必然。

社会发展至今，广告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都有增删，就象人们如今已很难将广告下明确的定义一样，拉广告的概念也似乎逐渐延伸。当然，这仅指广义而言。

拉广告自然也包括给自己拉。宣传自己，推销自己并不违背广告的基本精神。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者当属一位贾兄，其于今日商界已颇有名气，甚至带有几分传奇。这名气当然是自己给自己拉出来的。不过，这的确是一种本事，不少人都予以承认。

贾兄有两个传扬甚广的绰号，一曰热狗，二曰即时贴。前者指其热情，后者针对其实用性和时效性而言。无论那一个绰号，

实际上都是一种褒扬，尤其是在今日之社会。笔者甚至怀疑这两个雅俗共赏的绰号也是由贾兄自己拉出，换言之此也为一种自我广告的巧妙形式，因为若干企业都慕其绰号而愿意由其出任广告策划或公关创意，贾兄也因此以公关先生自居，并很快又为自己拉出了一条响彻云霄的广告——“中国公关仙（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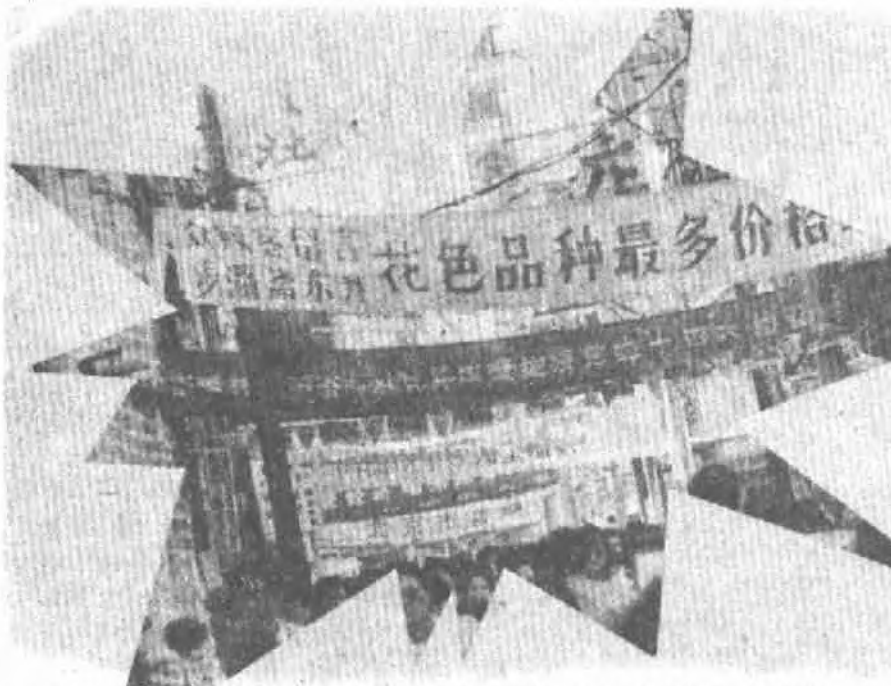
敢如此开牙也需一定胆量。幸亏胆量不必做广告昭示天下，否则贾兄兄说不定也会豪情万丈地拉出诸如“炎黄子孙第一胆”之类广告语以壮自身行色，兼起唬人作用。不过，对于自我加冕的中国公关仙生之称号，贾兄自己深信不疑，话说千遍始成真理，更何况一虚幻的光环。

江湖上有话：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灵。贾兄兄便常一招制敌，尽管据说他只此一招。纵观他策划的若干战例，此招之精华可总结成八字方针：策动两方，抬高中央。“中央”即是他本人，具体说是他本人

兄则利用双方欲罢不能，想赢怕输的心理，奔走于敌我之间，客串双方顾问，且抓住每一个机会抬高自己的身价，价格往往以几何数递增，至于双方战事，有的企业打累了便偃旗息鼓，而有的企业却因此走上连年征战之途，也许难有硝烟散尽的一天。

## 尾声：也无风雨也无晴 ——拉完之后聊几句

如此长篇大论地叙述一些小故事，笔者认为该就此打住，否则于已于人都将很累。若“凡存在



出卖商战构思的价格。他先找一家客户投入巨资广告宣传，此招尚无过人之处，而他以此为起点，继续策动第二家甚至好几家与前一家拥有同种产品或同种经营的企业，让双方展开广告及销售上的厮杀并人为使战局不断恶化，使战斗持续升级，从而令双方如入烟瘾，恶斗不止，如同对家买卖：你贱卖，我大贱卖；你流血，我自杀……直至一串回合对完，再换另一套路。贾兄

即合理”本身也合理的话，拉广告便作为一种现象而合理地存在，尽管它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偏差或黑洞。

关键是我们应该怎样去疏导。

〔责任编辑：穆图〕

张桦：原北京外语学院讲师。37岁。现为某咨询公司经理。著有《多味人生》等报告文学集多部。

刘凯：北京某校学生。

# 文化大革命中的 外交部夺权动乱

姚登山一席谈

●司任



## 引言

“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这句话是1959年陈毅接任外交部长时，周恩来对他说过的。这就是说，外交部必须直接地、绝对地掌握在中央手中。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外交部被夺权的大怪事。这个“史无前例”的大怪事怎样发生的呢？当时被迫反派拥戴，参与夺权，担任了四天“外交部长”的姚登山谈了夺权的始末。

但凡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很少有不知道姚登山这个名字的。1967年4、5月间，在全国夺权的动乱高潮中，他率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人员撤回北京。成为赫赫有名的“红色外交战士”。8、9月间，人们听说他领导了外交部的夺权，当了四天外交部长，于是就有人叫他“姚登天”。1971年夏天，在众目睽睽的万人大会上，他又被戴上锃亮的手铐，当场宣布逮捕……

1988年的盛夏时节，我在北京姚登山的家里访问了他。姚家在王府井与东单之间的一条胡同里，周围虽是繁华的闹市，这座带个小小天井的旧式三层楼里却没有扰人的嘈杂，颇有些“结庐在人境”的意味。

谈起二十一年前的那段往事，已是古稀之年的姚登山不免百感交集，谈起来还有不平之感。

“1967年4月，印尼事件发生后，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我当时是负责驻印尼使馆的临时代办，于4月30日最后撤离回国。到北京时，首都机场有两千多人来欢迎，以周总理为首，中央领导人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差不多都来了，这样隆重的场面是非常少有的。”

确实，我从照片上看到，周恩来与走下飞机的姚登山热烈拥抱。合影中，右边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陈毅等所谓“旧政府”的支柱，左边是江青、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新文革”的人马，可谓泾渭分明。中间便是一副懵懂相的姚登山。

“第二天五一晚上，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焰火晚会。周总理忽然找到我，让快去休息室，毛主席要接见我，又招呼摄影记者去拍照，毛主席见了我，没有讲几句话，大家就摆好姿势照相。我的左边是毛主席，右边本来是周总理，这时江青正好进来，总理连忙打招呼，江青也毫不推让，站在我旁边。就有了这张照片。”

姚特意把自己保存的、被抄走后又退还的这幅“登天”照片找出来给我看。他穿着当时最流行的军便服，左手挽着毛泽东，右手挽着身穿裙式呢军大衣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等人与姚登山合影

风姿绰约的江青。我想不起还有谁曾经以这种不可一世的姿态挎着毛泽东和江青照过像。对于姚，这当然是一种殊荣。照片发表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位外交界的高级领导人看了后，只说出两个字：“完了……”

“五一”以后，姚登山成为新闻传播媒介的热点人物，各报都用大量篇幅介绍这位“红色外交战士”的“英雄事迹”。对这些，姚本人认为：“都是出于当时外交斗争的需要，并不是要给我本人什么荣誉。”但一个人的声名如果成了某些人政治斗争的工具，自己又不能把握，再想自拔恐怕也难，姚的悲剧就发端于此，也有某种意义上的“咎由自取”。他不胜唏嘘地说：“那时候，我竟然成了一块很耀眼的牌子，许多单位都拉着我去做报告，不但有北京的还有外地的。但请我的那些造反派组织其实是为了张扬他们自己。”

为了拥有这块“金字招牌”，外交部里人多势众的造反派组织“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欢迎姚归国的大会上就当众宣布，吸收他为成员。当时参加一个造反派组织也实在简单得很，不要任何手续，大会一宣布，就成定局。姚长期在国外，刚回来几天，对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如坠九里雾中，但以为参加最高司令部号召的“革命造反”自然不会错，也就欣然接受了。

从5月到8月，姚的日常工作就是参加各种大会，上主席台，做报告，带头呼口号……8月4日，他参加首都新闻界“支持香港人民抗暴斗争”大会，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戚本禹也到会。有人介绍他们见面，戚本禹就顺便谈起了外交部问题。姚说：“戚本禹讲了两点，一是陈毅应该下到群众中去接受批判，一是在外交部对面“安营扎寨”是革命行动。我当时还搞不清楚什么叫个“安营扎寨”，后来才知道是一些学生包围了外交部，静坐，要揪出陈毅批斗。”所谓“安营扎寨”，需要解释一下，是在关锋、戚本禹等人操纵下，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外交系统的一些造反派，在外交部大门外，搭设帐篷、静坐绝食、大肆广播，要打倒陈毅，闹得不可开交，和7月份中南海大门外的“揪刘火线”，是北京的两个动乱中心。周恩来曾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甚至对造反派说：你们要冲进去揪人，就先踏着我的尸体进去好了！

姚继续说：“这次大会以后，造反派要我传达戚本禹的讲话。我就说了关于‘安营扎寨’的如何如何，没有讲别的。我若是懂的话，这些话也不会传达，但当时我不知其中的厉害。”对于懂不懂到底是指什么，姚并没有说清楚，但那后悔痛切之情却溢于言表。

俗话说，一步错，步步错。姚登山在外交部传达了戚本禹的谈话，从此陷入了更深的政治漩涡。



●1967年4月周恩来在机场迎接  
自印尼归来的姚登山

原来，外交部除了“革命造反联络站”外，还有个“在野党”，叫“革命造反总部”。两家虽都“革命造反”，却势同水火。“总部”人少势孤，被称作“老保”，难以抬头，但仍自强不息。对戚本禹的这个煽动群众闹事的谈话，“总部”感到同周恩来保护陈毅的指示大相径庭，便向周恩来，也向江青、陈伯达上告，指责姚编造谣言，煽动群众，“联络站”的大方向完全错了。由此引出了那个著名的“王八七讲话。”

所谓“王八七讲话”，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1967年8月7日对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现在有种回忆，说这个讲话是在外交部礼堂大会上公开讲的，都欠准确。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能让姚登山刻骨铭心，那肯定就是这个“王八七讲话”。在我们的谈话中，他甚至几次干脆把王力叫做“王八七”。

这个“王八七”也可称得上是个“职业外交家”。50年代曾任援越顾问组宣传负责人，从60年代起任《红旗》杂志负责人，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但他爬到政治顶峰，还是借助于1967年的全国内乱。7月20日，他在震惊全国的武汉7·20事件中被愤怒的军民揪走，挨了几下打。回来后林彪、中央文革专门为他 and 谢富治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天安门百万人欢迎大会。正红得发紫，他还有什么不敢讲的？

姚登山说：“8月7日外交部正在开批判陈毅的大会，中间，王力派人通知我和‘联络站’的几个头头去中央文革驻地钓鱼台开会，去了大概六七个人吧，主要由‘联络站’的王××汇报外交部运动三起三落情况，王力插了一些话，精神和戚本禹那个谈话差不多，也是支持揪批陈毅的。”

我手头有一份“王八七讲话”内容节录，不妨抄

录两段：

“8月5日姚登山同志向全部同志传达了关锋、戚本禹同志和他的谈话。现在我们知道有人反对，现在竟有人告状到我们这里，告到总理、伯达、康老、江青、中央文革小组。这件事证明文化革命搞了一年了，本来是正常的事情，而外交部还有人告状。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很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

“‘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姚登山同志在印尼造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反，回国后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你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朗，支持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你。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戚本禹同志对‘总部’来信和传达记录都看了，他说姚登山传达的没有什么出入，是他讲的话，他负责任。”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做检查，就是可以揪。”

王力这个讲话的焦点在于陈毅，当时是否打倒陈毅已经成了双方争执的中心。一方是摇旗督战的王、关、戚，一方是竭力保护陈毅的周恩来，双方都很清楚，一旦陈毅被打倒，接着就是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等老同志，最后是周恩来。中央文革的传声筒林杰就曾赤裸裸地对造反派说：“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笔者当年曾追问一个造反派骨干，为什么非要打倒陈毅不可，这个据说能“通天”的头目支吾一阵后喊出了一句话：“因为不打倒陈毅，就不能打倒周恩来！”

在这场动乱中，姚登山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他说：“接见后我问王力，讲话内容能不能公布，他说可以，等明天我给你回音。第二天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可以公布讲话内容。信被造反派拿去了，决定开大会传达。”后来姚就负责传达“王八七讲话”内容精神，不仅在外交部，而且在外交部以外。

“王八七讲话”以后，外交部的动乱如同烈火烹油，一下子达到最狂热的顶点。不用说部长陈毅，就连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也被关在地下室里。姚登山说：“我想去看看，但造反派不让见。22日就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事件。”

这里，有必要把这起新中国外交史上最荒唐的事件做个回顾。1967年7月，在王、关、戚等人操纵下，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外国语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专门造“国际帝修反”的反。当时香港一些人与港英当局发生了

冲突，8月20日中国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必须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声援声讨大会。“反帝反修联络站”也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采取“革命行动”。周恩来得到报告，大吃一惊，紧急召见造反派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造反派负责人保证不进入代办处的允诺后，才离去。22日晚，限令的48小时到时，几千名红卫兵、造反派将英国代办处团团围住，上万人进行示威游行。最后不顾警卫战士的力阻，冲进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详细经过，我们可以参看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的记载：

“代办处处，中国军队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号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了高音喇叭，还举着强烈排外的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领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晚上十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烧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

“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员一起躲进了保险库，这是入口处左边大楼里用来存放档案和密码的一间地下室。但他们又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

后来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说：“我打开门先走出来，其他人随我之后。院子里大约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顿毒打，任何可以触及我的人都用他们手中的不同武器打我。妇女们发疯似地扑过来，想用棍棒将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拖我，揪住我的领带勒我。”“我的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唐纳德后来逃到了英国代办处后面的印度使馆，躲在大门后。

克莱尔还写道：“代办处的几位女士想到对面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避难，但遭到拒绝，被关在铁门外，阿尔巴尼亚人还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她们受凌辱。然而，有两位姑娘在芬兰使馆受到保护。全体代办处工作人员不仅遭唾挨踢，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位外交官告诉我，暴徒中竟然还有英国人。其中有一个领头的——‘家庭出身好’——还穿着精制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乱踏！”

高音喇叭内播出了周恩来的指示，命令人们解散，但也没有立即奏效。直到凌晨，狂热的人群才离去。

周恩来听了汇报后，痛心地流下了眼泪，后悔自己过于轻信这些“革命小将”的保证。当晚，他紧急召见造反派代表，气愤地质问：“难道我们国家的荣誉都不要了吗？”然而，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王力控制下却报道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几天后，中国驻英代办处在伦敦也遭到了同样的报复。

周恩来联想到“王八七讲话”和《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号召“揪军内一小撮”社论，觉得事态严重，必须摊牌了。他将“王八七讲话”记录托杨成武呈送正在上海观看电视批斗大会的毛泽东。毛泽东开始只淡淡地表示知道了。经过两天的斟酌，他终于指示：王、关、戚是坏人，“王八七讲话”是“大大大毒草”。下令先把王力、关锋抓起来，戚本禹看看再说。周恩来迅即动手，8月30日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毛泽东之所以要有两天的斟酌，原因是：王力本是他派去问过外交部运动的。姚登山说王力当时很明确地讲：“毛主席让我过问外交部运动，讲这话时，周总理也在场。”这构成了姚登山对王力讲话深信不疑的一个因素，从而遭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王力被抓后，8月31日周恩来同外交部的一些负责人作了谈话，据记录，有这样几句话：

周恩来：（对姚登山）你在外面的几个报告煽动性很大，在外交部的讲话修改了中央的精神。你是个刚回国的代办，客观上是在对抗中央的精神。

姚登山：我是根据王力讲话精神讲的。

显然，姚当时还不知道王力已经被抓进监狱，更不知道毛泽东态度发生了转变。外交部一位能经常接近中央领导、知名度很高的女翻译，却抢先在部里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王八七讲话是一株大毒草》，王力下台遂广为人知。林彪1967年5月在毛泽东与外宾谈话时的一段插话也许颇有趣味：“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凡是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将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未犯错误。”（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然而，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些真正清醒认识，是在林彪叛国的9·13事件以后。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

提起姚登山当了四天外交部长的传闻,姚登山说:“大约在8月初,周总理提出让我参加外交部党委常委。他觉得当时形势别人不好出面,让我出来做一些工作比较有利。这大概就是后来风传我当了四天外交部长的缘由,周总理说是大权旁落四天。奇怪的是,有人说火烧英国代办处也是我领着干的。”他不平地说:“其实烧英国代办处那天我正生病发烧,在家休息,可是有人硬说在现场看见我了。”

1967年8月以后,姚登山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起初是在外交部被隔离审查。他的老母亲从家乡来看他,也只准他回家见了一面,不许过夜。1969年11月,他下放到外交部五七干校,沉重的精神压力才稍觉松弛。但是才过了几个月,“清查5·16运动”又兴起来,于是他进了学习班,隔离审查。

他说:“当时揪5·16揪得昏天黑地,干校里百分之二三十的人都成了5·16,有人给自己栽赃,也有人乱咬乱攀。但他们轰一轰也就过去了,我的情况却不同,专案人员对我说:你现在只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而不是是不是的问题。你要不是5·16分子,谁还是?显然是早已定案了。可能是因为实在没有证据——我当初根本就不知道有个什么5·16——我的专案拖了一年多,直到1971年6月11日,在工人体育馆开万人大会,公开逮捕了我,罪名还是那个5·16。”

几年前,那个体育馆的主席台曾是姚登山焕发光彩的地方,他在那里讲演,接受致敬,然而,只有四个月,“文革的浪涛就将他拍入深渊。他又在这里,成了千夫所指的囚徒。人生的无常,真是让你怨不得、怒不得、哭不得、笑不得。”

说起来,姚登山也算是一位老革命了。他是山西襄汾人,1938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在家乡一带组织抗日游击队,当过县委书记。抗战时期的斗争相当残酷,因为他是游击队长,日军把他的父母兄弟一家七口都抓了起来。“那时候,全家只有我一个没有坐牢房,谁知后来还是补上了,也许是在劫难逃吧!”这些话,他不无自我解嘲之意。

他这次坐牢时间相当长,从1971年到1980年,共9年多,住的是专门关高级政治犯的秦城监狱。9年铁窗生活对于姚,似乎并不是一段特别痛苦的回忆。“刚进去的时候还不断提审,比较紧张,渐渐地就沒有人再找麻烦了。后来单人牢房又换成了双人牢房,有了一个难友,也不那么憋闷了。秦城监狱的生活条件是比较好的,主食是大米白面,一月还能吃到许多次

肉——在那年月里,就凭这一条准有不少人报名入狱,我想。平时可以看到《红旗》杂志和当天的人民日报,再就是毛主席著作。在我出狱前的一段时间每周还可以看一两次电视。但坐牢终究是不能做什么事,除了放风外,我们最喜欢参加劳动。在后期,对我的管制较松,允许我在外种菜,引起许多人的羡慕。

“一位管理人员曾经安慰我的老伴,说秦城监狱的生活不差,最难得的是安全不用象在外面那样,整天的提心吊胆。这话看起来确实有道理。”听到这里,我心中不觉闪过了一丝悲哀:常言称人死入土为安,没想到人活着竟有入狱为安的。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姚登山是这场悲剧的牺牲品。

他失去了9年自由,却也失去了世间烦恼的侵扰。难的是他的妻子儿女,最初几年中,一家三代八口人就靠妻子一人工资过活,孩子们睡在家徒四壁的地上。儿子、女儿因为父亲的缘故,不能工作,统统都到农村插队。1976年清明节发生了悼念周总理、反抗“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参加了反“四人帮”活动的姚登山小儿子也被逮捕,这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北京,是故意传达下去的,以证明去天安门的人们并非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姚登山是反周恩来的,他的儿子怎么会悼念周恩来?”——这是当时的说法。

1980年8月,姚终于离开了秦城监狱。屈指一算,他20岁参加共产党,南征北战,建国后又出使各国任外交官,可是,这个监狱竟是他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

最后,他缓缓地结束了话语:“1980年5月,有关方面给我做出结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犯有严重错误,留党察看一年。我承认自己犯有错误,但不是反周总理的。以后,这件事没有人再找我谈,也就不了了之。然后,就是恢复党组织生活。离休。”他拿出离休证书,红色的塑料皮,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干部离休证”烫金字,里面很简单:“出生时间:1918年5月”,“行政级别:10级”,“职务:参赞”。

现在的姚登山身体看上去相当健康,精神也很好,他每天早起到东单公园散步,打太极拳,下午睡大觉,其他时间就读书看报。星期六还要去参加老干部的学习活动,生活过得很安然。

告辞了姚家,我整理一下思绪,却不知对那段动乱的历史,是更加清晰了,还是更加扑朔迷离。我想:无论如何,十年浩劫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沉痛的回顾,而应当得到深刻教训的,恐怕不止姚登山一个人吧!



# 陈永贵 政坛 风云录

●吴思

20年前，陈永贵从大寨走进中南海是毛泽东以“新鲜血液”把他注入中国政坛的，他当上了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由此，“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漫卷神州大地，八亿农民全汇入“政治挂帅”却变成了磨洋工的海洋……

1973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大”，陈进入了政治局。12日下午，陈永贵回到昔阳，在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介绍“十大”情况时说：“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经过多年“防修反修的伟大实践”，毛泽东认定大老粗除了能办事之外，还有保证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央领导层中便出现了来自上海的工人干部、几乎当上毛泽东的接班人的王洪文，有来自陕西的工人干部，后来当了副总理的吴桂贤，还有从售货柜台出来的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再加上陈永贵，着实体现了一股来自民间的新鲜血液。

陈文化确实不高，他是在大跃进期间扫的盲，到县里开会，中午大家睡午觉，他去找人对笔记，当时的县委书记张怀英见这位43岁的大队书记如此刻苦，记的又是他的讲话，心里很是喜爱。而那些有时间宁可睡一觉的农村干部却替陈累得慌。一位熟人笑道：“永贵别记了，睡吧。四十多岁的人了，再学还能当上中央委员？”

其实陈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有后来的飞黄腾达。他一直是按一个劳模，一个大队书记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

陈永贵在向昔阳的干部介绍“十大”情况的会议上，开篇就用错了一个词。他很严肃地说：“现在，我

的民愤很大！”听众一时没反应过来，都愣住了。县委书记张怀英在后排纠正道：“老陈，不是民愤很大，是名声很大。”“噢。”陈改口说：“现在我名声很大！”说完侧过头来问后排：“这回对哩？”毕竟，陈的讲话充满了乡俗俚语，人又很聪明，听他的讲话比听一字不错的官话套话来劲多了。哪怕陈信马由缰，扯的也是老百姓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会场上总是鸦雀无声。

后来，笔杆子们还造了一个词，叫“陈永贵风格”。1973年11月，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错了话，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江青趁机发难，说周恩来“迫不及待”，与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陈永贵初入政治局，眼见一向神圣的周总理挨批，目睹毛主席的夫人上纲上线地训总理，不禁心下大惊。“中央的斗争也很复杂哩。”

过了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又批评了江青。“有人说错了两句话，”毛泽东说，“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没过几天，毛泽东又把政治局委员们召到中南海游泳池，机谋深沉地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

陈永贵一次在昔阳谈起阶级斗争的问题时说道，“过去以为是在下边，现在看出不是那么回事。”

1974年上半年，中国的政坛风云急剧变幻。先是批林批孔，后来又批起了周公。6月1日，周恩来因癌

症入院。7月3日，小靳庄在“四人帮”的吹捧下腾空而起，一时有与大寨争春之势。到了下半年，“四人帮”与周恩来在由谁组阁问题上的冲突愈发尖锐。毛泽东两边都用，既让周恩来组阁，又让王洪文安排人事，但是他逐渐转向了周恩来。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露面，他当众训斥江青，说“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陈永贵渐渐心里有数了。原来表面上神圣得了不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一个成帮结派斗争激烈的地方。他看出了上层斗争的复杂，不敢随便乱讲话，开政治局会也总是听别人的，自己轻易不表态，表态也是说些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之类的话。尽管陈倍加小心，他还是陷了进去。

1975年1月13日，在召开的四届人大会上，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了12位副总理，其座次如下：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陈永贵排名第七。

这套班子中只有张春桥这一位“四人帮”成员。“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上严重受挫。

按江青的意思，应该由王洪文、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当副总理，迟群当教育部长。上海方面提出过一个国务院人事安排名单，“四人帮”方面的要员达88人之多。可江青托人向毛泽东提出人事安排的建议之后，毛泽东回答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四届人大组阁不成，江青火冒三丈，把许多政治局委员点着名骂了一通。毛泽东听说了，评论道：“她看得起的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要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之后也挺发愁，他回了趟昔阳，在大会上就谈起自己的压力大和不适应。“我他妈的一个农民，连字还认不得哩，还得批文件！”

陈永贵知道自己不是坐镇北京批阅文件的材料，明白自己的优势在于熟悉基层，自己的作用在于上下沟通，并在全中国范围内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他还知道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这块风水地上来的，失去了这块基地就成了无本之木。陈想了一个扬长避短的办法。

1975年5月初，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

求毛主席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他很明智地给自己这位第七号副总理设计了一套史无前例的职责，一套与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即不离的职责。

有一次张怀英去看陈，正好碰见工作人员送来文件让陈画圈。张怀英虽然是陈的老上级，对陈称得上知根知底，但是眼看着一位副总理在一排中央首长的名字旁边画圈也难免感到敬畏。他问陈：“你咋批文件哩？”“咋批？”陈笑道，“他们画圈我画圈呗！”陈点了周恩来、华国锋、纪登奎等几位他信得过的人的名字，解释说：“他们画我画，他们不画我也不画。”

陈永贵很少在北京住着。两个半月以来，他转河南河北，又在大寨住了将近50天。一个副总理离京60多天总要出点活儿吧？陈永贵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保证过，要随时了解下情，向中央提出建议。

回到大寨以后，陈永贵叫来了笔杆子宋莎荫，让他起草一份给毛主席的报告。陈永贵大口大口地抽着烟，把他琢磨了很长时间的想想法归纳成五点，叫作“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

“……近两年我跑过的地方，许多搞得好的大队，大都是大队核算。我同不少县以下的同志们讨论过，他们也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现大队核算势在必行。

“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怎么搞好？大寨实行的办法叫‘标准工分，自报公议’所谓‘标准工分’，其实就是评思想好、劳动态度好，既能大干又能干好的‘标准人’，自报工分，要同这个‘标准人’的条件比。实行这种评工制度，政治就挂帅了，可以从根本上摆脱‘工分挂帅’的烦琐哲学……”陈永贵要是能写出《资本论》，那么上述这两段就是他的《资本论》。陈永贵如果能写出《新民主主义论》，那么上边这两段也就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两条后边还有三条：不准社员个人盖房，住宅一律由集体投资建设，把社员欠集体的粮债痛痛快快地全部免掉。

毛泽东读了陈永贵的五条建议，这位以气魄恢宏著称的伟人也觉得拿不定主意了。这些动作都不小，实行起来全国震动，到底行得行不得？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在陈永贵的建议上批示，让政治局讨论一下。9月23日至10月21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讨论陈永贵提出的迅速过渡的建议。

座谈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赵紫阳和谭启龙这两位大省的党委书记坚决反对向大队核算过渡，连一向左得出奇的张春桥也表示不同意。陈永贵则力主过渡，一再强调大队核算的好处。争到上火处还忍不住



高腔大噪地嚷起来，以至后来有“陈永贵大闹12省书记会”之说。10月19日，第一次全农会宣告闭幕，而这个平行进行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仍然没有争出一个结果。两天后，由于分歧太大，意见无法统一，座谈会无结果而散，陈永贵的提议被暂时搁置。

1974年初到1976年底，陈永贵回昔阳20次。陈永贵回到昔阳，一个是抓大干苦干，一个是抓资本主义倾向。这两个主题他常抓不懈，坚持始终。结果，昔阳出了“大批促大干”，“车马归队、劳力归田”等具有全国影响的经验，批资本主义批到山沟里、房前屋后、家庭中、炕头上，凡是超出一猪一鸡一兔的规定的副业都成了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一直割到家庭，割到炕头。坐在炕头编草帽成了资本主义，昔阳的草帽业就彻底完了，用草帽只好从外边进。

零碎事他也管，他要让社会主义十全十美，彻底战胜资本主义。

昔阳有几个老大难。一个是医院，一个是剧团，还有一个是邮电局。邮电局服务态度不好，老百姓打电话不给好好接，报纸一压就是十天半个月。有人告到陈永贵耳朵里，陈永贵怒道：“邮电局就有人反大寨哩！”他下令邮电局整顿，派下一个工作组办学习班，让那些职工一个个的自我解剖，重新认识大寨精神。

用类似的办法，陈永贵训过剧团，警告他们：“我处理您！”他还下令整顿过医院，撤了院长，把不好好给病人看病的医生下放劳动；什么时候改好了什么时候回来。

陈永贵抓的昔阳这个点，不仅出了许多经验，还出了许多干部。自从陈永贵进了政治局，昔阳向外输出的县以上干部就有三四十位。级别高的有当了山西省委副书记的李韩锁、当了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王金籽，当了国务院农村部副部长的张福元。当上地委书记或省里厅局长的有张怀英、范喜凤、李艾虎、赵满仓和李福栋等人。当上县委书记的更是多得难以细数，其中名气最大的要算平定县委书记李锁寿。

陈永贵每年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视察和讲话，并且留下不少名言。

陈永贵转了八百里秦川，留下一句名言是：“地是好地，就是人懒。”把陕西人说得老大不高兴。

甘肃省定西地区土地贫瘠，干旱缺水，是闻名全国的穷地方，可是陈永贵到那儿转了一圈也说：“这样的条件多好呀！”

陈永贵去吉林，坐在伪满时期建的长春市体育馆的主席台上，说吉林的条件太好了，就是没干好。他说，如果他带五千个昔阳农民来，就能让吉林改天换地。他甚至还算出了能增产多少，打多少粮食的具体数字。这话让昔阳人听了一定很受用，吉林人听了却

不痛快。吉林省革委会主任，16军政委王淮湘沉着脸坐在陈永贵旁边听着，下边的听众中有人发牢骚说：“就他那沓的人能？吹吧！”

从吉林到了黑龙江，陈更说人家的条件好了。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肥得流油，关键是要大干苦干。黑龙江人就坡上驴，趁机向陈要干部。两年后果然有昔阳的王金籽、李艾虎和范喜凤到黑龙江走马上任。

无论陈在各地说什么，当地人在他面前总是夸他讲得好，批评得对，说到了要害，教育深等。陈永贵的自我感觉也因此愈发地好了。有一回他参观北大荒的军垦农场，见到路上有许多马粪，就批评人家不注意拾粪积肥。陈永贵走后，一位师长骂道：“他妈的他懂个屁！他大寨才几亩地？我几十万亩，收都收不过来，还他妈的捡马粪？”

1977年6月，陈永贵去山东的东平县看那里组织的万人万亩大会战。东平的这个工程叫围山建设大寨田工程，号称“50华里分三段，60华里一条线，70华里围山转。”在一片山上拉开战场，一条道路修到山顶，一层层梯田从山顶修下来，山顶建水库，水顺着几十条干渠流到地里，气势宏伟而浩大。

陈坐车转了一个小时还没有转出人山人海热火朝天的工地，不由得连声叫好。“你们干得很好！”陈副总理对东平县委书记说，“这才叫干社会主义！”东平的书记答道：“人家骂呀，说我们刮共产风。”

东平县离泰山很近，当地领导请陈永贵上泰山看看。陈永贵说：“以后退休了再去吧，还是多看看几个工程。”结果陈永贵一生没上过泰山。到了杭州，当地领导劝他游西湖，他也说以后再看看吧，结果一生也没游过西湖。同样他路过黄山没上黄山，到了拉萨没进布达拉宫。对陈永贵来说，庄稼和土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基本建设场面是最美的景象。

虽然陈永贵在全国各地跑，到处参观视察，在前呼后拥之中，他看到的是他想看的，听到的是他想听的。不同的意见很难传到他的耳朵里。耳闻目睹的一切似乎都在向他证明他绝对正确。实际上，陈永贵本人对中国农村的理解很受昔阳和大寨一时一地的经验的限制，他对中国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理解也受到他本人那种志向高、不爱小的特色的过滤，因此在他眼中，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绝对灵验，大寨和昔阳的道路又宽又广，似乎是天下归心的大道，包含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十多年后，张怀英回顾当时的情景，说：“我以为陈永贵对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基本矛盾，在量上、质上的估计都有欠缺。他是按大寨要求昔阳，按昔阳要求全国。昔阳的特殊条件在他那里成了指导全国的普遍

性。”

陈永贵平生三次出国访问，第一次是1966年访问阿尔巴尼亚，第二次是1975年访问墨西哥，第三次是1978年访问柬埔寨。

真正令陈永贵感到难忘和震撼的是波尔布特领导下的柬埔寨。

大寨在柬埔寨的名气，有点像五十年代苏联在中国的名气。柬埔寨人也学大寨。柬埔寨为陈永贵这位传奇般的英雄，一个大国的副总理举行了极其隆重热烈的欢迎仪式。陈永贵一下飞机，迎面就看见两幅大红汉字横幅：“热烈欢迎陈永贵同志！”“柬中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

欢迎队伍严格按男女分开。男人一概穿着绿色的类似军装的衣服，一概头戴解放帽，一概腰系皮带，脖子上一概围着色彩相同的围巾。女人一色的黑上衣，一色的黑裙子，一色的短发，只是脖子上的浅色围巾稍有不同。

陪同陈永贵的是波尔布特。这位以“左”著称的共产党领袖创建了一个奇异的国度，没有银行，没有货币，除了一所为外国人开办的友谊商店再没有任何商店。城市的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全国都像张春桥主张的那样实行供给制，各种必需品全通过这个制度分配下去。吃饭全在集体食堂，居住分男女集体宿舍，结婚者一个月可以在一起过几天，好像是假日。平时，整个国家就像是一所大军营，连服装都是全体一致的。

陈永贵感叹道：“马列、毛主席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人家柬埔寨实现了。”

除了第一顿欢迎和最后一顿送别，波尔布特和英萨利不陪着陈永贵一行吃饭。中国的客人吃得好，波尔布特等柬方高级官员吃得差。他们抽的烟也没有商标，烟盒上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字也没有画。

陈永贵又感叹道：“人家可艰苦朴素哩！……”

陈永贵的官越当越大，地位越来越高，自我感觉也越来越好。而张怀英对他的态度却好象采用了十几年一贯制，说起话来仍然带着县委书记对大队书记、文化人对大老粗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味道。

张怀英留心文史，讲起话来喜欢谈古论今。昔阳人听张怀英的讲话也兴致勃勃，面露敬佩。听陈永贵的讲话鸦雀无声，却面带敬畏。陈永贵感到人们对张怀英的学识渊博的敬佩之情，而这种尊敬他这位粗通文字的大老粗绝对享受不到。陈永贵感到张怀英和他在昔阳争了威望，影响了他。他把这种别扭的感觉憋在心里，但是又掩藏得不好，有人动不动还来撩拨他两下。

撩拨者告诉陈永贵：“好多人都说你的点子是张怀

英出的，说张怀英是你的军师。”陈永贵在大寨向来以点子多著称，大家居然传说他的点子都是张怀英出的，陈永贵自然很不高兴。

一天晚上县委常委开会，张怀英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又有表露，陈永贵按捺不住便和他争吵起来，嗓门越来越大，为了谁培养谁，谁沾了谁的光的名分问题红了脸。陈永贵盛怒之下拂袖退场。当年年底，张怀英调出昔阳，任寿阳县委书记。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不久。陈永贵发难，王金籽领导下的昔阳就一哄而上，联系着邓小平搞三项指示为纲，大批张怀英的三个六年。各大队各公社的干部纷纷发言表态，揭发出来的事什么都有，某某干部三次点名不到，给张怀英撤了职；某年张怀英在种棉花问题上反对了老陈的意见；某月某日张怀英的老婆训了人，等等。张怀英最受批判的两句言论是：“后人的极盛时代来自前人的努力。”“昔阳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我们在的时候就很好了。”这些言论都被说成是：“肯定民主革命，否定文革的必要性的倒退言论”。这么一说，也果然与毛泽东主席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挂上了钩。

陈永贵在听取批张怀英的汇报时，有人说张怀英的病根是骄傲自满，他说：“骄傲自满，是什么问题？骄傲自满就是不革命，修正主义，民主派。查一查马克思的教导，怀英不是一般的骄傲自满问题，要从政治路线上，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看。”

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实际批判大会一口气开了十多天，陈永贵亲自从北京回来坐阵督战，深揭狠批张怀英。

张怀英因为在寿阳干出了成绩，已经调任运城地委书记，不过夫人还在昔阳。张怀英的夫人有气，说了几句风凉话：“看老陈这戏怎么唱吧。”话传到陈永贵耳朵里，昔阳又批了一阵“看戏论”。反正昔阳是陈永贵的，他爱批什么就批什么，没人敢说二话。

这场打着批邓旗号的批张运动在全国第一个大寨县足足搞了一年多，直到“四人帮”倒了，批邓运动基本停止了，批张仍在继续。

陈永贵一句话，你的一生就算定了。他说了一句《山西日报》总编辑吴象反大寨，吴象在山西就被批得抬不起头来，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揪住不依不饶，逼得吴象到安徽投奔万里。一位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记者反映大寨的自力更生有不实之处，多少接受过国家的一些帮助，陈永贵就说这个人反大寨，将该记者投入监狱。新华社社长穆青不干，几次找陈永贵要人，陈永贵迟迟不肯下令放人，硬把那位说了真话的记者关得吃足了苦头。

新华社山西分社采编主任李毓秀曾在四清中写过

一篇反映大寨地亩不实、虚报产量的稿子，在内参上发了，中央很重视，周恩来派人到大寨丈量土地，证实内参报道是准确的，陈永贵非常恼火。文革开始后，李毓秀因此被揪到大寨批斗，并被责令把他多写的几亩地造出来。新华社主管内参工作的国内部副主任方实，也因发了这篇内参而背上黑锅。后来，有一位名叫方堤的新华社记者到昔阳采访，陈永贵听说了，拍着沙发骂道：“不就是那个发内参反大寨的么？不欢迎！赶他走！”有人就解释，说反大寨那个叫方实，这个叫方堤，不是一个人。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摆手，“哎，都差不多！”，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当政，陈永贵进入了自己的全盛时代。这时候，无论他到哪里，到处都是赞扬和奉承。他在全性的会议上漫无主题地讲一通，有时候毫无准备想到哪儿讲哪儿，听起来简直是东拉西扯，而部长省长一级的干部依然称他讲得深刻，总结得全面。陈永贵也认为自己确实水平高，自我感觉极佳。

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陈永贵好像跌进了低谷。郭风莲说陈永贵那一段“很彷徨”，“很担心”，他为大寨和自己的政治前途担忧。

与陈永贵私交很好的华国锋，很快就将陈的担心打消了一大半。粉碎“四人帮”不久，华国锋亲自提议再开一次像样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把“四人帮”干扰造成的损失补回来。他表示要亲自参加这次会议。陈很留心这位新领袖的言行，他发现华在会见外宾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大寨和大庆，多次表示要把大庆和大寨这两面红旗更高地举起来。看来，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确实要成为华主张和坚持的发展道路上的两面大旗。

1976年12月10日，华国锋出任主席不过两个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便“在华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在北京隆重举行。华国锋出席大会并讲话，表示要把大庆、大寨这两面红旗高高举起。华国锋的讲话被70多次掌声所打断。陈永贵在这次会议上做的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讲话也赢得了60多次掌声。这一切使陈永贵看到了光明的前程。

第二次全农会闭幕的第二天，12月28日下午3时，华国锋像毛泽东做过的那样，以请客吃饭的方式进一步表明了自己对大寨大庆的偏爱。华国锋把郭风莲、宋立英、李喜慎、王金籽、王谦、王庭栋和三位大庆代表请到人大大会堂福建厅，由汪东兴和陈永贵出席作陪，设宴款待工农农业两面大旗的代表。

宴会席上很是热闹，宾主谈笑风生，相互敬酒让菜。这顿饭吃了三个小时，比当年毛泽东宴请陈永贵的时间还多一个小时。

宴请之后，陈永贵把昔阳的部下叫来，将这餐饭与12年前毛泽东宴请他的那次做了一番比较。他说：“这意义可深刻哩。12年前，就是毛主席诞辰的12月26日，毛主席叫我们在毛主席的家里吃了饭。那时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现在粉碎了‘四人帮’，华主席把我们请到身边来吃饭。”

这一年，在陈的督促下，昔的西水东调工程建设达到了高潮，这是一项浩大的让河水改道的工程，要耗资五千万，占山西省水利基建投资的十分之一。一旦建成，昔阳的缺水状况将一举解决。问题是这项工程的投资效益远远低于平均值，建成每亩水浇地的成本数倍于山西省的平均成本。以中国的财力而论，这类工程本来属于搞不起也不该搞之列。不过，当时主要算的是政治账，陈急于拿出一个新昔阳来，迎接打算在1980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出于政治需要，这项工程的设计也在陈的赞成下强调了视觉上的宣传效果。埋一根管子就可将水引过山沟的地方，硬是修建了气势如虹的大渡槽。多花成百万的钱，只为了让参观者一眼就能看出大寨又上了新台阶。

华国锋所作所为的一切都对陈永贵的心思。1977年2月7日，华国锋批发了一篇很著名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联合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份重要文件，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夺取天下大治的伟大胜利。社论中最著名的一句誓言般的话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后来就成为一派政治势力的称号。

陈永贵极力帮助华国锋树立威信。1977年8月25日，陈永贵在昔阳对县委和各公社书记下达了一道指示：“华主席在我们县跑了不少社队和单位，用过的家具，作过的指示，到过的地方，展览馆里选择一个突出的地方，突出地展览，宣传华主席的领袖地位。必须留有纪念，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年年底，昔阳的粮食因风灾减产，总产2.7亿斤。在大灾中能打这么多粮食确实不容易。可是陈永贵预先说出去了今年大增产，估产3.2亿斤，如今差了4千多万斤却如何是好？结果昔阳再次大胆虚报，号称产量超过3.3亿斤，比陈永贵吹出去的还多1千万斤。

这一年，昔阳的弄虚作假竟走向世界，骗到了联合国头上。那年联合国粮食考察团去昔阳考察，听说皋落大队搞得不好，就去皋落看。皋落的粮仓里有10万

斤玉米，但颗粒小，不好看。于是皋落向公社粮站借200麻包玉米，让社员连夜扛到大队的仓库冒充口粮，把那10万斤小粒的玉米说成是饲料粮。

远远望去，标杆大寨县的红旗越升越高，迎风飘扬。

陈永贵在自已的鼎盛时期，最热心干的一件事就是向大队核算过渡。这条建议他在1975年就向毛泽东提过，毛泽东拿不定主意让政治局讨论，最后未能通过。现在他的羽翼更丰满了，在政治局的朋友更多了，他要重提过渡，在全国刮一场惊天动地的过渡风。

1977年1月15日，陈永贵在昔阳四级干部面前透露了一点风声。他说：“各公社要总结大队核算的经验，”当时台下坐着几个记者，陈永贵冲他们吩咐道：“这个你们记者同志不要给闹出去，按华主席的指示办——有这样一个考虑，让昔阳及早把这个经验准备好。”

能够坐在会场上参加昔阳的干部会议的记者，都是靠得住的驻大寨联合报道组的记者。他们对陈永贵的指示绝对服从。有胆敢不服从者，陈永贵也绝不客气，干脆就将其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赶出大寨。陈永贵继续说：“有些地方还在受错误路线影响，还在想单干，一听说陈永贵又什么什么，那么阶级敌人一策划破坏，又来了一个杀猪、宰羊、砍树，那可受不了。好像贫下中农就不愿意走集体化道路？胡说八道！我说那是阶级敌人办的事，阶级敌人是害怕我们集体经济。……好像阶级敌人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走集体化道路，贫下中农不愿意，你看这怪不怪？”

在讲这番话的时候，陈永贵并不觉得他已经走得离普通农民很远了，他甚至准备走得更远。1977年夏，李喜填回到县里传达说：“老陈对过渡很重视，几次过渡没有过成，这次非过渡不行。这次过渡好了，县就有经验，全国也有经验。过渡主要是思想过渡，思想不过硬就不行。”

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极端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陈永贵谈所有制过渡也把思想过硬放在了第一位。既然越穷就越敢革命，越无所顾忌，思想也就越过硬，那就越容易过渡。这条路子后来被讥为“穷过渡”。

经过普及大寨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主张取得了初步胜利。中共中央1977年第49号文件中写道：“今冬明春，可以再选择一部分条件已成熟的大队，例如10%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

中国8亿农民，10%过渡是一项涉及到8千万人口的大政策，其影响和辐射面更是大得数倍于此。文件指出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要求各级党委“采取积极而热情的态度”，这对农村干部的思想影响

也非同小可。

当年冬天，大半个中国动荡起来了。万人动员大会、敲锣打鼓、排队报名等等热闹场面在许多省份的许多地方再一次出现，就好像当年办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同时，陈永贵不肯承认的“贫下中农杀猪砍树”再次成风，大队核算显示出来的是对中国农村的单薄的生产力的杀伤力。

在向公社所有制过渡试验中，久经教育的大寨公社也闹开了意见。人们嫌公社所有制抑制了大队一级的管理积极性，昔阳城关公社作为过渡的第一步先把各村副业收归公社，结果当年副业收入猛降，怨声四起，只得把副业退回。

在社员思想高度革命化的大寨大队，“陈永贵模仿全民所有制搞的公费医疗试验也遭到惨败。医疗费用成倍地增长，郭凤莲向陈永贵告急，说：“现在吃不住了。”于是又取消了公费医疗。

陈永贵掀起的过渡风刮了一个冬春。春去秋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就像点着陈永贵的鼻子一样明文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搞所谓‘穷过渡’。”

这个文件是胡耀邦主持起草的，陈永贵根本就没有插手的份。

粉碎“四人帮”不久，农业部副部长赵修去内蒙古农村调查，遇到一件很有代表性的事情。有一个大队，社员自留地里的庄稼亩产超千斤，集体地只能打一百多斤。这个大队想了个办法，把社员育肥了的自留地收回，把一些盐碱地分给社员当自留地。可是自留地里的庄稼奇迹般地速住了苗，秋后的产量仍然比集体地高出一大截，连盐碱地也被改造好了。被收回去的自留地呢，好地长不出好庄稼，产量又掉了下来。赵修由此想到了责任心，想到了“包”。

在社会学的交换理论中，有一个很拗口的公正原理：“在一次交换中，公平规范越不能实现，被剥夺者就越倾向于消极制裁规范的违背者。这就是说，当一群每天挣10个工分的社员在一起刨地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对公平的看法，也就是大家挣同样多的工分，就应该干同样的活。如果有某个人挂着锄头站着多聊了一会儿，有的人就会有不公平感，就会觉得自己吃了亏，认为那个偷懒的人占了便宜。自然不能白白便宜了这小子，“你歇着，我坐着，打不下粮食咱伙饿着。”于是深感不平的社员也站住了，也聊了起来。这样，感到不公平的人越来越多，站着聊天的也越来越多，集体化时期的标准劳动场面便出现了。据说这种现象也是不分国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有人向鸭绿江的对岸望去，发现那边的集体农庄的庄员们也在站着聊天。

这时候，如果有几个不怕吃亏的干部仍然流着大汗埋头苦干着，感到不公平的社员可能会觉得心里平衡一点，可能会受到一种道德力量的感召，多刨几下地。如果这几个干部再挺身而出，训斥那些在队里偷懒、在自留地里拚命的社员，批他们一通，哪怕不点名地批一通光想搞自发不想干集体的“资本主义倾向”，那么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公平了，就不至于磨洋工了。昔阳用的正是这种办法，简称干部带头大批促大干。陈永贵还想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全中国，让报纸发表了一串以《昔阳是怎样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主题的文章，他想“扶正压邪”。

但是，如果干部们也覺得吃亏了，也觉得挣同样的工分，犯不上出大力流大汗并且与许多乡邻结下三代冤仇，如果他们连地都不下在大喇叭里吆喝着派了活，让社员下了地，自己又回家接着睡觉，那么中国农村会是什么样子呢？

陈永贵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不声不响磨洋工的汪洋大海。

毛泽东面对的也是这片汪洋大海，他当时拿出来的办法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呼唤革命精神的风雨，兴起阶级斗争的风浪，前拉后打连劝带逼地迫使中国农村往前走。他在一些地方取得了成功，他选择了一个局部极为成功的大寨作为旗帜，抬举了一位不怕吃亏得罪人的出众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当管农业口的副总理。

当毛泽东把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建立一个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理想国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遇上了一个比他还要强大的对手。

大包干的开路先锋，安徽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这样说起毛泽东的苦心和努力：“毛主席是想搞上去，学大寨、普及大寨，花了不少脑筋。可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一直调动不起来。基本路线教育、四清、堵资本主义的路、反右倾，运动一个跟着一个，效果都不好，他们就是不干活。我们凤阳县饿死了9万人，国家倒帖了4亿斤返销粮，代价不小，就是搞不好。”“高级社第一年就减产，农民拉牛退社。关的关，押的押，杀的杀，硬把一股潮流压回去了。”

“学大寨费了多大劲呀！省委书记下去兼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兼公社书记，层层下去抓，强有力的领导，可他们就是不干活！”毛泽东也知道自己没有成功。因此，当尼克松说他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时候，毛泽东回答道：“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是指十三陵水库？那正是革命精神的产物，是他亲自劳动过的地方。现在，毛泽东撒手而去，轮到提拔起来的陈自己面对不声不响的汪洋大海了。

凭借毛泽东主席的余威，中国农村大体上依然平静。陈永贵很乐观，1977年6月2日，在全国三夏生产会议上，陈永贵兴奋地鼓励大家大干快上，他认为这没什么难的。“困难吗？”陈永贵问道，“昔阳平均三年翻一番，十年翻了三番，哪有那么多重重困难呢？”然而好景不长，1978年秋，当饿死的危险再次威胁了胆子并不大的中国农民的时候，情况就开始变了。

1978年安徽大旱。眼看凭集体半死不活的力量无法种上小麦了，肥西县山南公社斗胆把土地“借”给社员种一年度荒，敢叫做“包”。这些地到了社员的手里，居然就奇迹般地种上了，且种得挺及时。

稍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干部社员，想了一个更冒的办法，他们偷偷写了一份秘密协定，表面上仍旧伙着干，实际上把地分到各户。一天晚上，这些不想再逃荒要饭的农民凑在灯下，像搞地下工作似地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队干部宣读了一份有许多错别字的秘密协定，大家向老天爷起誓，如果队干部因包产到户蹲了监狱，全村人养他一家老小，把孩子供到长大成人。他们起誓，如果谁把这个秘密透露出去，天打五雷轰，三代不得好死。宣读之后，队干部问众人有什么意见，众人没有异议。小队队长严宏昌第一个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了手印，随后，这张后来进了历史博物馆的秘密协定歪歪扭扭地按满了血红的手印。这些普普通通、不愿意受穷的农民，豁出杀头坐牢，与陈永贵代表的大寨道路分手了。几年后席卷中国的大包干狂潮表明，这些只想过安生日子的农民，虽然并不那么大公无私一心为革命，并不像陈永贵那么合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却比陈永贵更能代表中国农民。

当时关于昔阳是怎样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文章已经在报上登出来了，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知道陈永贵不点名地批的是谁，心里正有气。万里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结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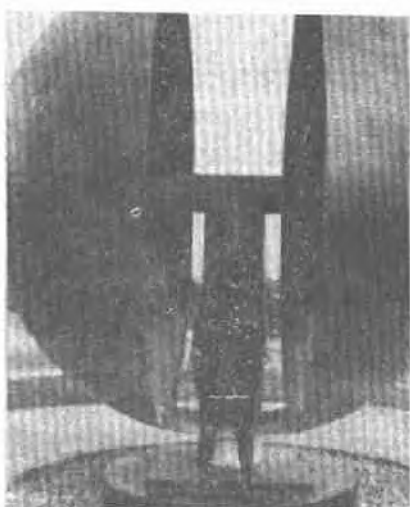
万里的话越说越重：“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什么大队核算、大概分、大批促大干，搞人造小平原……我已经宣布我们省不组织去学大寨那一套。”

自从1964年以来，大概这是第一位省委书记敢说他学大寨，也是第一个省委书记允许包产到户的试验。

消息传到安徽农村。肥西县山南公社的农民放了一夜的鞭炮。（下转第30页）

# 我与周扬、吴伯箫和江南的交往

●林非



## 周扬写作法一例

1981年暮春季节，周扬为了撰写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的讲演稿，邀请陈荒煤、黎澍等七八位作家和学者，在他家中的大客厅聚谈，总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客人刚刚到达坐定，周扬就从内宅急匆匆地走进来，和颜悦色地跟大家握手寒暄。他坐在大家对面，谈笑风生地指定人们依次发言，代他考虑一下应该讲些什么？于是按照大家就坐的椅子，自西而东，轮番说话，纷纷发表着各自的见解。

我默默地瞧着周扬脸部的表情，一会儿眯着眼睛在沉思冥想，一会儿又仰起头，微微地笑着，突然又低下头，慢悠悠地在记录着什么，他是多么出神地倾听着人们谈话。

一个圈子转过来，所有的客人都讲完了，最后转到我发言，看来已经难以躲避，只好硬着头皮，在关公面前舞大刀，很认真地说了几条意见。发言的程序结束之后，周扬笑眯眯地招呼我们喝茶，让大家休息片刻，他自己就进入内宅去了。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他又兴冲冲地步入客厅和大家一起就座，十分迅捷地拿出两页稿纸，提纲挈领地讲述这篇讲演稿的要点，谈到鲁迅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深刻的思想家，谈到鲁迅对人性解放的思索，谈到鲁迅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系，充满了不少独创性的见解，启发是很大的，却又确实是吸收了刚才大家所表达的不少意思，为什么经过他的概括和提高，境界就很不一样了呢？真觉得有点儿神秘。

周扬的这一番话，真象百川归海，汹涌澎湃，洋溢着一种激情，显得气势不凡。他讲完之后，又诚恳地要求大家再提出建议，好好地修改和补充。因为已经讲得这样头头是道，大家也就想不出什么更多的意见了。

我深感这种写作的方法非常可取，既是胸有成竹地准备好自己系统的见解，又虚怀若谷地向大家讨教，取采众长，融入自己的构思之中，实在是贯彻了从前常说的“群众路线”，也体现了“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啊！

周扬的这篇讲演稿在后来正式发表时，跟他那一天所说的要点稍有出入，我当时听到的几句十分精彩的话并未在这里体现出来，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缘故？

## 吴伯箫串门

在吴伯箫的一生中，写成过多少出色的散文啊！三十年代的《天冬草》和《海》，就给予了读者很鲜明的印象，前者倾注了对爱情与友谊的一往深情，后者向往着波澜壮阔和惊涛骇浪般的生活。稍后的《我还没见过长城》，更是写得庄重和沉郁，从万里长城遥远的往昔，写到要去抵抗侵略我们的强敌，显得高昂有力，气势磅礴。

正是这条写作的路，使他通向了革命和广大的人民。这个时期的散文，艺术风格有了明显的改变，都写得相当浑厚和质朴。五十年代的散文集《北极星》，无疑是步入了高潮和成熟期，在深沉和明朗中间，又蕴藏和升华着哀哀的情思。

七十年代末期，我曾多次去他府上，讨教关于《中国现代散文选》的编纂问题。他在讲述自己创作思想和理论见解的变迁时，常常穿插一些幽默诙谐却又发人深省的笑话。有一回，他刚从山东农村回来，说起过自己经历的一个小故事。

他去一位党支部书记家串门，敲了好一会儿紧闭的大门，总没有答应，正想回头离去时，里边却传出一个如女的声音：“家里没有人！”

他听到有人答话，又轻轻地敲着门。

“家里没有人！”那如女的声音又在重复着。

“这不是有人吗？”他疑惑地问道。

“家里没有人，”还是那妇女重复的声音。

吴伯箫于是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妇人并未将自己算在家庭中应该计算的人口中间。他摇摇头告诉我说，农村里歧视妇女的习俗依旧很厉害，男女不平等的情况比比皆是。他睁着双眼，忧心忡忡地问道，“为什么革命胜利了这么多年，连男女平等都做不到呢？”

他还跟我诉说过不少关于写作与人生的思考。每次谈话中间，他总是在认真地思索，探求着一种更为合理的人生。我听完之后，建议他把这样的思索，凝结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间。他点点头，表示要这样做。可惜的是他在不久之后就匆匆病逝，这个愿望永远都无法很完满地实现了。

## 江南的梦想

《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八年前在旧金山被刺身亡后，海内外许多大大小小的报纸都作了连篇累牍的报导。我刚听到这悲惨的消息时，心里感到万分悲恸和愤慨；回想着我们在同游金门大桥时，他站在桥墩底下，眺望着荡漾的碧波，竟充满激情地长啸起来；回想着我在他府上借宿时，曾有过彻夜未眠的长谈，说历史，叙人生，都有无限的感叹。这一切都还历历如在眼前，他却浑身流着鲜血离开了这纷乱和冷酷的尘世，于是在伤感之余，竟一发而不可收，写成了好几篇悼念他的散文。

人已经死了，往昔的游踪也烟消云散了，可是真诚的友情是永存的，我至今还常常想起江南来。

去年夏天，我应韩国散文界的邀请，前往汉城小游，从香港换乘飞机出发时，才知道是将在台北的桃园机场停泊，然后再转往汉城。我立即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在旧金山江南的寓所里，听他倾诉自己的梦想，

说是多么希望能够自由自在地回到台北去，不因《蒋经国传》出版的缘故而遭逮捕，更希望海峡两岸可以自由自在地来往通航。

江南说完自己的梦，就抬起头来，望着窗外滚滚的波涛，很激动地询问我说，“什么时候才会实现这个梦想？”

我默默地摇了摇头，真的说不出怎么才能够出现这个走向缓和与对话的局面。

江南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曾仆仆风尘，来过中国大陆多次，到处陈述自己的这个见解，直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值得庆幸的是，历史老人的步伐真快速得惊人，海峡两岸早已实现了通邮，台湾的居民正纷纷涌来大陆探亲和观光，这种开放和宽容的氛围，无疑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喜事。不过江南的梦只能说是实现了一半，大陆虽然已经敞开了门户，台湾当局却还阻挡大陆人士入境。

往事如烟，正象航舱外的云雾那样，纷纷扬扬地飘进我脑海时，飞机已经沉稳地降落在桃园机场上，我真想走下飞机去看一看，可是根据台湾当局的规定，我们只能坐在飞机上休息和等待而不能下去走动，就是想办入境的签证手续，也肯定会被拒绝。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台湾人士可以大批地前来大陆，而大陆人士却无法顺利地进入台湾呢？

于是我又执拗地想着，怎样才能完全实现江南的这个梦想？怎样能够在台北的大街上漫步？去看看江南住过的地方，去看看我自己在台北的亲戚和朋友们？

当我在汉城的街头徜徉时，依旧想象着江南这个迷人的梦。

[责任编辑：晓 渡]

## 《中共党史研究》 欢迎订阅

《中共党史研究》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全国性学术期刊。本刊刊登的主要内容是：党史专题研究论文、毛泽东思想研究、党史人物研究、党史文献资料、党史论著评介、革命史现代史研究论文、问题讨论、史实考证、评论、译文、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等，并辟有“探索与争鸣”、“学术论文选登”、“读史札记”、书评等栏目。本刊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提倡进行同志式的平等的讨论。《中共党史研究》为双月刊。16开本，96页，胶印封面，每期定价2.00元，全年定价12.00元，逢单月25日出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欲订本刊物，请与北京市1924信箱发行处联系，订单函索即寄；也可直接寄款订阅。本刊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海淀分理处，收款户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发行科，帐号：891394-49。通讯地址：北京1924信箱发行处，邮政编码：100091。电话：258. 1166转569。



一甲胺——剧毒化学药品，将 41 个生灵带进了地狱，使无数生畜命归黄泉。

玩忽职守——生活中的“一甲胺”，将两人推入监狱，价值 260 万元人民币的国家财产化为乌有。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泄毒案。

# 中国首例特大泄毒案始末

医学和临床档案资料证明：

一甲胺中毒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病例。

剧毒的一甲胺，只有和几百万倍的相当水量相溶时，其毒性才可能被稀释丧失。

一甲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人的器官、内脏灼伤，从而导致中毒者呼吸循环和脏器衰竭，最终夺去人的生命。

本案所以成为共和国之最，是因为本案的肇事罪犯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一次泄漏一甲胺 2.4 吨！

## “死神”启程

1991 年 9 月 2 日，夜。

地处江西省上饶、广丰、玉山三县交叉地带的沙溪镇早已停止了喧闹。

在 320 国道线上。两道雪亮的灯柱，随着马达的轰鸣由远而近，一辆“日野”牌中货车发疯似地在公路上狂奔。

坐在驾驶室的司机谢启航，此时紧握方向盘的手

不禁有些颤抖，他感到恐惧，若不是他身边还坐着三个人的话，他真不知道自己会出什么事。

原来，作为个体运输户，他此次连人带车受雇于江西省贵溪县农药厂，装上该厂的槽罐去上海染料化工厂装运剧毒化学药品一甲胺，从上海出发直到现在，他已不歇脚地连续开车十几个小时，虽然他已经很累，几乎可以说，只要一闭眼就能打呼噜，但他还是硬咬牙挺着，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这是在给自己挣钱，二是刚才车经龙游地段时，突遇歹徒枪劫，他跟踩油门猛冲才将歹徒吓退并得以逃离。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当他驾车经过广丰湖丰路段时，又遇歹徒持械拦劫，并将他车前的挡风玻璃打碎。

谢启航再度驾车脱离危险，他现已成了惊弓之鸟，恨不能马上到家。

坐在车厢里的郑林平和余福荣倒显得比谢启航平稳得多，车厢对他们来说就是保险箱，他们并没有觉得怎么担惊受怕，他们想着自己的心事。



余福荣是郑林平和谢启航的朋友，他此次带着五岁的儿子搭车去上海购物、游玩，满载而归，收获颇多。刚刚受的那点刺激甚至连儿子甜睡中的美梦都未惊扰，他很知足。

郑林平是贵溪农药厂的采购员，是受厂里指派专程前往上海染料厂装运剧毒化学药品一甲胺的。

“前面是沙漠，你到沙漠停一下，我想到沙溪街上看一下父母，你也顺便清理一下被打碎的挡风玻璃，待天亮我们再上路。”郑林平轻声对谢启航说。

谢启航看了一眼自己腕上的手表，这时已是9月3日凌晨2时。

谢启航点点头，顺着郑林平指的路，驾车下了320国道，从沙溪镇的新生街口，进入了人口稠密的镇居民区。当“日野”车驶入到新生街28米处时，谢启航猛然发现车前道旁有一个沙堆，他急转方向盘，试图绕过沙堆。可是，就在谢启航急转方向盘避让沙堆时，车上装有一甲胺的槽罐进气阀门与街道旁离地面2.35米高的桑树杆主干相顶，年久失修，被各种化学药品腐蚀得锈迹斑斑的槽罐网与槽罐当即分离。

死神——白雾状的一甲胺，“！——嗷——嗷”的鸣响着向外喷射……

### 接到“死神”请柬的人们

听到响声，谢启航下车查看，郑林平也从驾驶室跳了出来。他瞪着眼睛，用已变了调的声音冲着谢

启航大喊：“快！这样会出大事，快开门叫人逃跑，车会爆炸的。”谢启航从郑林平那失魂落魄的神态上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跟在郑林平后面，他们俩一边沿街使劲地敲着每一扇门，一边使劲全力地喊着：“有毒了，快跑呀！有毒了，快跑呀！……”

一甲胺——那白的毒雾，此时正横扫、吞噬着这个昨日还是生机勃勃的小镇。毫无思想准备的人们从梦呓中惊醒，扶老携幼，跌跌撞撞地跑出家门，他们立刻被毒雾包围了，人们想摆脱死神缠绕，求生的欲望使他们盲目地在街上跑着，跑着……

浓度越来越大的毒气象钢针一样刺透了人们的眼睛、鼻子，灼烧每一个咽喉，每一根器官，人们觉得自己的所有器官都在被一只无形的利爪撕扯着、蹂躏着……

妇女老人在声嘶力竭地呼喊，婴儿、孩子在大声啼哭，人们开始剧烈地咳嗽，感到窒息，有人跌倒在地，口吐泡沫，痛苦地翻滚着、抽动着，最后昏死过去，带着愤怒和不解，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

还算幸运的是，那天的凌晨刮的是东南风，白色的毒雾在镇的北面未停留多久，便逐渐向镇的西北方向飘移，向上空缓缓扩散。使得镇东南面的居民区基本上未被污染。

事故发生后不到20分钟，沙溪镇党委、镇政府的领导干部们便赶到现场，指挥群众从毒雾中抢救出第一批130名重度中毒者，并将他们全部安置到医院进

## 无数牲畜命归黄泉





## ●装有剧毒药品的汽车

行紧急抢救。

当朝霞初露的时候，喷射了三个小时之久的毒气罐终于吐完了它所携带的全部能量——2.4吨剧毒化学药品——甲胺！

为了确保损失不再扩大，为了槽罐的残气不至再危及他人，镇领导命令前来说明情况的两名肇事者——郑林平和谢启航将槽罐车开出新生街，停到距沙溪镇1500米远的一段无人地带。

## 一场劫难

早晨，6时左右。

根据沙溪镇各级领导的安排，受灾群众已全部撤离泄毒事故现场。上饶县公安局在方圆35平方米毒气污染区设立了警戒线，320国道线沙溪镇路段暂时也被封锁。

有关部门开始对受灾区域内情况进行全面的核查。

据统计，受毒气污染的地段中，共有私人住宅191户，工艺厂、机米厂等工厂11家，供电站、邮电局、电影院等公共设施及单位、娱乐场所23个，水塘12口，水田20亩，菜地15亩。

街道上，横卧着六具已经僵硬了的、被毒气腐蚀得已面目全非的尸体；牛棚里，九头耕牛毙命；地面上和房前屋后的角落里，倒卧着数不过来的，已经被毒死的狗、鸡、鸭、鹅、蛇甚至当时从此飞过的麻雀。

望眼水塘，白花花的一片，那是被毒气毒死的鱼和青蛙。

大田里，街道旁，原本绿油油的水稻、雪白的棉花、葱葱的草木都被毒气熏焦，甚至碳化。

距出事现场只20米的余达民家门口处，年已80高龄的洪青香倒在地上，她的怀里紧紧揣着一条用来擦泪堵嘴的沙布巾。她脸面肿大，五官已严重溃烂，令人难以辨认。而距她家不远的俞家忠家的后山墙下，63岁的俞家忠和57岁的施金娇夫妇，相互扯着衣服向前做爬行状，但却被那凶残的毒气永远地定格在那里。

吴乃双是县法院沙溪镇法庭的干部，新婚还不到一年，爱妻余金美已有八个月的身孕。那天，吴乃双被人们惊慌失措的喊叫声吵醒，他的职业习惯带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来了强盗或贼人，他镇静地来到门前，轻轻地开门打开，他还没来得及再作出反映，已被扑面而来的白色毒雾包围，他感到眩晕，脚下象是踩了棉花，这时他晃晃摇摇的听外面有人喊“有毒气，快跑！”他终于明白了，此时刚刚从床上坐起来的妻子又被毒雾放倒，不省人事，吴乃双咬紧牙关，唤醒了岳母，同时自己也扶着妻子冲出了家门。妻子被已昏昏沉沉的他送到了镇医院，此刻，吴乃双只是冲着妻子的耳边张了张嘴，便一头栽倒在地，再也没能起来。他那56岁的岳母也陪他而去，妻子因生命垂危，只好流产。

泄毒事故发生的当天，有13名中毒者在送到医院抢救时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很快，在医院治疗期间，又有22名中毒者被送进了太平间。

悲剧震惊了共和国的中枢。中共中央、国务院、省长、部长、地、县各级领导相继赶到了事故现场视察灾情，慰问灾民及伤病员。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化工部和上海市委、市政府派出一个由多名专家组成的医疗抢救小组，紧急抽调全国最好的医生和药品奔赴上饶，上饶地、市、县十多家设备较好的医院通力协作，全部投入到抢救伤病员的工作中……

## “死神”是怎样走来的？

“死神”从沙溪镇消失了。

清醒过来的人们开始对事故进行反思。

1979年，贵溪农药厂曾购买了两个槽罐，一个专门用来装一甲胺，一个用来装运丙烯等，然而不久，厂里又决定将装运一甲胺的槽罐转卖给东乡农药厂。将原来装运丙烯的槽罐改装后再来运送一甲胺、液态氯等有毒材料。虽然当时负责改装的鹰潭压力容器检验所曾提醒他们，此种槽罐已报废不能再用，但贵溪农药厂仍坚持改装并投入使用。

1990年4月，改装后的槽罐在上海染料化工厂装

罐一甲胺，化工厂的一名罐装工拒绝灌气，理由只有一条：此种槽罐在上海业已报废，现在统一使用长沙化工机械厂生产的新式槽罐。并且领着当时押运的郑林平看了新型槽罐。■令人费解解的是，当郑林平将10元人民币的小费塞到他手里后，他依旧打开了灌气阀门。

1991年4月，这辆槽罐车又开进了浙江江山化工总厂装气，该厂罐装工发现该槽罐阀门漏气，压力表、液位计已不能工作，提出停灌维修。郑林平以时间紧为由，只让对方在槽罐阀门口上加了一块垫片，对液位表进行矫正，在付给该厂一百多元修理费后，再次将一甲胺装入罐内。

虽然郑林平曾将以上情况向厂长、供销科长如实作了反映，遗憾的是各级领导均未采取任何措施，一切依然如故。

人们甚至在“9·3”大泄毒之后发现，槽罐上的压力表此时仍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凡运送化学危险物品时，运输单位必须配备专职押运员和专职驾驶员，同时还需持有严格的手续和证件。对这些特殊规定，农药厂是知道的，但该厂却拒不执行。

1987年2月27日国务院颁布的《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凡从事化学危险物品运输的，必须向当地公安机关申报，按公安机关指定的时间、路线、时速行车，并要随时和沿线公安机关取得联系，未经特许，不得随意停车，以防出现险情。可是，在公安部门的运输管理档案上，几乎查不到他们的任何踪迹。因为他们从未就自己运输化学危险物品的时间、路线向公安机关申报过。

人们可想而知，一个已报废且年久失修的槽罐，一个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不是押运员的“押运员”，一个不懂得专业运输知识的、临时雇请的个体驾驶员，一辆未挂危险物品运输标志的槽罐车，还搭乘着其他无关人员，在没有任何安全防范措施的情况下，悠然自得地进上海、下湖南，招摇于杭州市区，令人现在想起来还后脊梁骨发凉。

这是一颗随时都可能被他人踩响引爆的地雷。

9月1日，他们在上海染料化工厂装灌一甲胺时，谢启航也曾提出按有关规定挂危险物品标志旗的问题。郑林平让搭车的余福荣到附近的一家消防器材商店购买。据余福荣讲，商店明确告知黄底黑字的危险物品标志旗现已不用了，要买只能买插电的危险品标志器。而余又对价钱较贵的标志器无权作主，回来请示郑林平，郑不同意购买。

晚7时许，死神开进杭州市区。谢启航说他有一个朋友的冰箱正在这里修理，他要去看一下，他将车

停在了半山停车场。

一行四人又在天堂之城游玩、购物、会友忙乎了近一个小时。

## 庄严的判决

1992年2月24日。

江西省沙溪镇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涌向了县城，涌进了上饶县人民法院。



今天，共和国的法官将依法公开审理震惊全国的“9·3”特大泄毒案。

上午8时整，罪犯郑林平、谢启航低垂着头，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四名全副武装的法警押上了审判台，站到了刑事被告栏里。

上饶县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向法庭宣读了起诉书。

对人民检察院指控他们的犯罪事实，两被告人未提出异议，审判按程序进行着。

作为“9·3”泄毒案的罪犯，郑林平和谢启航还是知罪的。他们早已晓得了他们给沙溪镇带来和留下了什么。用他们的话说，他们现在“深感负疚”。他们要求政府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似乎没有做“蹲大狱”的准备。

在法庭辩论时，郑林平和他的辩护律师提示审判长：

1. “9·3”事故属司法实践中的多因一果现象，厂方要负全面责任，郑本人不负主要责任。

2. 事故发生时，郑林平和谢启航积极呼喊居民疏散，并主动向当地政府陈述肇事原因，应认定为自首，公诉机关未认定自首，指控不当。

3. 要求对槽罐车阀门断口进行鉴定，分析阀门断裂所受到的撞击力，以便澄清厂方与肇事者各自的责任。

谢启航和他的辩护律师也向法庭提出了同样的辩护意见。

“我是受农药厂雇用的，第一次拉运一甲胺，事先一点不知道一甲胺的化学性能。槽罐泄毒害了沙溪镇的人，但同时我也是受害者。事后我也积极呼救，并将槽罐车开走，应该按自首从轻处罚”。

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郑林平、谢启航作为“9·3”特大泄毒事故的直接肇事者，其行为已触犯刑律，必须承担直接刑事责任。过多地强调厂方管理不严，领导不闻不问，并以此来减轻或抵销自己应负的责任，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法律所不接受的。

贵溪农药厂对“9·3”重大泄毒事故自有无法推卸的重大责任，但这是另一种刑事责任，他们的责任和郑林平、谢启航的责任决不可相互替代和混淆。

众所周知，两被告人也承认，将死神——槽罐车开进居民稠密区是他们擅自作的主张，这一点至少跟厂方无直接关系。另外，以他们的文化程度和阅历，对化学危险物品运输的起码常识还是应该知道的。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说，他们的肇事责任是直接的，独立的。

对于两被告人提出的槽罐阀门的鉴定问题有关司

法部门曾作过慎重考虑，但由于受技术、仪器设备等条件的局限，难以成立一个省级以上的专门鉴定机构，所以没有作出鉴定，也未向法庭提交书面鉴定结论。

这无疑是一个遗憾。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死神之门——槽罐阀门是车子与树杆的撞击而引起的断落。

也就是说，即便鉴定出了撞击时的强度、力度，对郑林平、谢启航罪名的成立和法院对他俩最后的量刑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因为，法律——只要求行为人对其行为的最终后果负责。

“现在宣判”，审判长沉稳、洪亮的声音在审判大厅回荡。

“本院认为，被告人郑林平、谢启航在运输化学有毒物品过程中，违反《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和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中的有关规定，擅自将载运剧毒危险品的车辆开进居民区，造成特大泄毒伤亡事故。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事罪。两被告人在肇事时虽积极呼喊居民疏散并能向当地政府陈述肇事原因，可视为首，但后果特别严重，应予从重处罚。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打击刑事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郑林平犯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2、被告人谢启航犯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

两被告不服上诉，江西省上饶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在4月13日向两被告发出了(92)刑二字第40号刑事裁定书，认为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二上诉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二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经查属实，但考虑到该案的后果特别严重，要求从轻处罚没有理由，不予采纳。

作为“9·3”特大泄毒案的首要罪犯，郑林平、谢启航已受到了法律的惩罚。贵溪农药厂的有关人员，也已接到了人民检察院的传唤通知书，日前，上饶县人民检察院决定以玩忽职守罪对贵溪农药厂厂长徐志刚、供销科长朱华林提起公诉，上饶县人民法院即将公开审理此案。我们相信，共和国的法律同样也不会宽恕他们。

“9·3”特大泄毒案已经合上了那血泪浸透的卷宗，但是它给我们留下了多么沉重的思索啊！

〔责任编辑：穆 图〕

一场不该发生的悲剧！

一场几乎重新改写历史的悲剧！

1937年2月，当西安的人民愤怒谴责蒋介石的背信弃义，竭力争取和平营救张学良将军时，当全国各界群众为张学良、杨虎城二人的壮举促成全民抗日局面形成而欢欣时，一场悲剧无情地降临在这千年古城……



●左起：蒋介石、张学良、冯钦哉。

## ■春秋笔

### 扣张危机

在离“兵谏”仅13天的12月25日下午3点，张学良，这个承继乃父绿林气血的新式军人，这个曾叱咤风云的风流少帅，在无拘无束无任何监督无任何条件的情况下，陪同曾被武装扣押了13天，颇受惊吓的“领袖”，离开高桂滋公馆，乘车直奔西郊机场，亲自送蒋介石返回南京。演出了一出现代《连环套》。

“报复”，这是传统中国人所不齿且被当作不仁不义的同义词，但在政治斗争中却是实实在在的。

谁都认为十三天和一万二千九百多天（或者更长）是个不等式，但在张学良将军身上却是个等式，这是何等残酷的历史命运啊！

26日，蒋介石发表回京通电，称西安事变是“非常之变乱”。

29日，南京政府组成高等军事法庭。

31日，张学良被捕。军事法庭判其10年徒刑，剥夺公民权5年。

同日，中央军增兵华渭，以武力压迫。

西安震惊，全国震撼，世界注目。内战，象古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在人们头上。

杨虎城、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等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们，激愤满腔，与南京方面展开了交涉战。

1937年1月4日，杨虎城致电南京，正告勿以军事相要挟；若起战事，誓与周旋到底。

5日，杨虎城、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等9人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实行军事压迫，挑动新内战。6日，西北救亡联合会致电蒋介石，要求他履行诺言，发动抗战。

8日，东北军、十七路军126名军官联名通电，坚决要求释放张学良。

9日，西安10万军民武装游行。反对内战，要求抗日，呼吁释放张学良。

……

而蒋介石在干什么呢？原来初尝软禁滋味的老蒋，“龙体”受惊，在夫人陪伴下，回故里浙江奉化溪口武陵度假消惊去了。悠哉游哉。溪口的青山绿水，前呼

用的“领袖”生活，似乎使老蒋忘记了一切。但是，安方面好象有意和他过不去，催放张学良的急电雪压地飞来，将他拉回到现实中，拉回到西安……

“娘希匹！”老蒋大发雷霆，“杨虎城太狂了，简直无领袖，目无法国。”

“达令！”宋美龄极力劝慰，“用不着生杨虎城的气，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现在张学良在你手上，还怕什么呢？只要您利用这张王牌，一手军事，一手政治，怕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共匪’三位一体不破。”

“夫人高见！”老蒋顿时眉开眼笑，用操着浓重奉方言的普通话夸道。

1月5日，蒋介石为表示“领袖”的“宽宏大量”，作姿态地宣布“特赦”张学良，却又将其军事管

6日，复电西安方面，指责杨虎城目无“领袖”，在“变乱”。

同日，密电顾祝同积极进行军事准备，将中央军至8师3个军，向潼关、华阴、华县一线推进，向西安压迫，并抛出一个《陕甘军事善后方案》，严令杨虎城撤职留任，带罪立功，西北防务由中央军接管。

16日，杨虎城派特使鲍文樾赴南京，表示接受中的方案必须先放张学良返陕，西北防务由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中央军分驻。

19日，蒋介石致函杨虎城，只字不提放张，却斥杨“割裂军政，破坏统一”。

26日，蒋介石电令刘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如不无限撤退，即轰炸其阵地。

……

## 和战之争

南京政府的不仁不义，激起西安广大将士的强烈愤慨。以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高福源为骨干的少壮派军官，力主开战，营救张学良。而以王以哲、何柱国为首的老一辈将领则主张和平营救，力避内战，双方激烈争吵，相持不下。

20日，少壮派发动作战签名运动。谁不签名就被人为是不拥护、不想营救张副司令，是只顾个人升官发财怕打仗的“孬种”。有些本来主和的军官，也只好跟着签名。但王以哲严词拒绝。被少壮派看作救张之“绊脚石”。

26日，少壮派军官60人一齐拥进新城杨虎城公馆，挤在客厅里，要求杨虎城率领他们与中央军决一死战。

孙铭久，这位血气方刚深得张学良信任的心腹猛将，跪倒在杨虎城脚前痛哭流涕地恳求：“杨主任，



●右起：杨虎城、宋美龄、蒋介石、张学良

求求你领我们干吧，只要能救出张副司令，我们甘愿赴汤蹈火，肝脑涂地。”

“唰”，60多人一齐跪下。

面对这同仇敌忾的悲愤场面，杨虎城热泪盈眶，真想率两军将士与蒋介石决一胜负。但是，他不能，他不能不顾民族团结的大局，更不能违背自己当初协同张学良发动“兵谏”的宗旨。虽然张学良临走时将东北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他，但是他心里清楚，东北军除张学良以外没有人能够指挥。如今在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和战之争的复杂情况下，他尤其不能断然处置。但是孙铭久等人的“哭谏”，迫使杨虎城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何去何从？他必须作出选择。

杨虎城和颜悦色地对众军官说：“弟兄们，请起，有话请坐着讲。”

众军官坚决不起，一定要杨虎城答应他们的要求。

杨虎城深为感动，他声音颤抖地说：“虎城与诸位弟兄的心情一样。但是，诸位请想想，咱们对老蒋实行兵谏，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国内和平，团结抗日，内战，非但救不了张副司令，而且还帮了小鬼子的大忙。只要咱们团结一致，和平谈判能救出张副司令。”

孙铭久等人无可奈何，怏怏离去。

27日，孙铭久率主战派又向中共代表团“哭谏，无结果。”

同日午，又向何柱国请战，没成功。

傍晚，再次分头向王以哲、何柱国、杨虎城、于学忠请愿：一、反对中央政府；二、立即向中央军开始攻击；三、决不撤退及接受任何条件。被王以哲等严厉拒绝。

但是，主战派越闹越凶，越走越远，竟然扬言不

惜实行第二次“兵谏”。

社会上主战呼声也一阵高过一阵。

在古城西安的上空，内战浓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

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正确分析西安形势，认为如果坚决反对打，就会失去很多朋友，影响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团结，必须采取灵活的策略，暂时保留自己的主张，在张杨两军上下一致的情情况下，全力支持他们打好这一仗。

28日晨，周恩来、叶剑英踏着晨曦，迎着刺骨的寒风，赶到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召集会议，研究作战计划。当晚，不辞辛劳，火速赶回西安，把中共代表团的意见告诉各方。叶剑英和两军参谋人员具体地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

31日，三方最高军事会议在西安抗日联军临委会总部召开。在和战问题上，和战两派激烈争论，脸红耳赤，甚至剑拔弩张！

结果，和占上风。

## 二·二事件

孙铭久面对这种局面，心急如焚。自从张学良送蒋被扣后，总是回忆起蒋介石被抓住时那阴冷的目光。不祥的预感使他不寒而慄。今天的会议上，他作了最后的努力，竭力主战，与王以哲、何柱国争吵不休，以致都拔出了手枪。可是……他他心里感到绝望。“不，决不能这样，我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迫使两军救出副司令，甚至不惜武力要挟。”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闪现。当时，东北军、十七路军主力都在前线与中央军对峙，西安城里仅有孙铭久的一个卫队团，解决主和派易如反掌。此时，他完全失去了理智。

2月1日，街上贴出“除奸”标语。

1937年2月2日凌晨，晨曦朦胧，寒风呜咽。位于西安南院门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安军事委员会总部军事督察处，灯火通明，警戒森严。督察处处长兼卫队团团团长孙铭久与抗日同志会骨干苗剑秋、应德田等，密谋举事，企图以武力解决主和派，挟迫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与中央军决战，以图营救被扣之张学良。他们派卫队团二营一连长于文俊进攻67军军长王以哲寓所，二连连长王协一逮捕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主任何柱国，另派一队包围中共代表驻地金家巷5号东楼。

一队队士兵荷枪实弹，悄悄出发，向各自目标包抄……

悲剧发生了。

67军军长王以哲似乎觉察到生命的威胁，将其住宅对面的民房租下，召回67军副官处长宋学礼，令其

调遣部队进驻西安，以策安全。自己则拖着病体心情沉重地思考着局势的变化、东北军的安危，担心着张副司令的命运。

王以哲，这位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科八期毕业的高材生，正义、爱国、思想进步。他仰慕张学良的为人坦荡，年少多才。毕业后投其麾下，由于办事干练认真，深得张学良的信任。1931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突袭北大营时，他命士兵英勇抵抗，因此举国闻名。后因功被张学良提拔为67军军长。自从部队被派往陕北剿共前线后，他变得郁郁不乐，变积极进攻为消极防御。他不止一次地劝说张学良，停战抗日，所以当被红军俘获的团长高福源从陕北释放返回，带来共产党方面希望合作抗日的意见时，他兴奋不已。1936年2月，他积极促成了张学良和周恩来等密谈的洛川会议和4月的肤施会谈，在西北形成了和平的局面。当张学良决定发动“兵谏”时，他又是坚决的支持者。当蒋介石答应《八项救国主张》而不愿签字时，他敏感地觉得蒋在耍政治手腕，力劝张学良认清蒋的真面目，特别是蒋介石无条件离开西安时，他更极力告诫张学良：切勿上当！张学良被扣后，他作为东北军的核心人物，为维护团结，特别是为维护“双十二”后西北形成的和平局面，奔走呼号，直至心力交瘁，重病缠身。现在，孙铭久这帮失去理智的少壮派军人磨刀霍霍，怎能不让他心急如焚呢……

“当、当、当……”墙上挂钟的时针已指向午夜3时。王以哲病疲交加，倒在床上沉沉睡去……

死神，象恶魔般叩击着王以哲生命之门。

在王家周围，人影绰绰，行动诡秘。

“谁？干什么的？”一名警卫厉声断喝。

“呼！”警卫倒下。

枪声惊醒了王以哲。他猛地抽出枕头下的手枪，一个鱼跃，滚到门边，和卫士一起，奋力还击。终因身中数弹，不幸遇难。

何柱国先得到密报，连忙驱车逃往新城杨虎城公馆，被卫队士兵一路追杀，直到杨虎城出面才幸免于难。

另一路卫队士兵在几个少壮军官率领下，冲进中共代表团驻地，直扑周恩来办公室。

周恩来看到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立刻明白这是来搞所谓“兵谏”的。他异常气愤，霍地站起来，猛地一拍桌子，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则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

青年军官们见平日温文尔雅的周先生发这么大的脾气，气焰顿敛，低头不语。

提起宦官，人们马上会想到那些虽是男人，但因生殖器官被阉割而成了“半个女人”的宫内当差者。在皇帝看来，让这些不男不女、半雌半雄的人当听差，是再放心不过了。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性欲，深宫内院的后妃对他们不再具有吸引力，这样，就能确保帝王一系血统的纯洁性。然而，多欲似乎是人的本性，宦官们虽然失去了性欲，但却滋长了权欲。久而久之，便利用侍奉皇帝和后妃的良机，博得主子的信任，扮演起干预朝政的重要角色来。

# 明代的宦官专权

——王振、刘瑾、魏忠贤三大权宦剪影

● 晓 乔

说到宦官专权，人们又会想到明朝的三大权宦：王振、刘瑾、魏忠贤。有诗云：“干儿义子拜盈门，妙语流传最断魂；强欲为儿无奈老，捋须自叹不如孙。”说的是：明末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期间，百官中的一些宵小，纷纷拜倒在他的名下，充当干儿子，连老态龙钟的礼部尚书顾秉谦也捋着长胡子厚颜无耻地对魏忠贤说：“本想做您的儿子，但可惜胡子已白。”所以只好命其子孙拜为孙。魏忠贤听后心花怒放，随即赏给顾秉谦200两白银。当时，魏忠贤人呼“九千岁”，几乎与“天子”平起平坐。王振、刘瑾在宫内的“威名”虽不及魏忠贤那么显赫，但也有“翁父”和“立的皇帝”之称。

具体说来，三大权宦是怎样祸国乱政的呢？历史这样记录着：

## 一、暗中操纵小皇帝

1435年初春，明代的第5个皇帝朱瞻基（即明宣宗）咽气了。据说，这位只活了38岁的“天子”是因好色纵欲而死的。他还有个“促织天子”的浑名，以爱斗蟋蟀闻名天下。

所谓“促织”，即蟋蟀的雅名，因它入秋而鸣，正当预制冬衣之际，似有催人织作之意，所以叫“促织”。

朱瞻基的去世，给王振带来了好运气。因为他时下正陪不满9岁的皇太子朱祁镇读书。等朱祁镇皇袍一加身，王振自然也就身价倍增。

这个王振本是一个极普通的儒士，当过9年教官，但无任何建树。后来，他自行阉割生殖器官，到宫中当了太监。显而易见，他的这种抉择，决不是为混口饭吃，而是希图在政治上有所进取。初进宫时，他只是教官人念书，人称先生，但到朱祁镇被定为太子后，居然又成了未来天子的先生。史载，王振极善趋奉之事。为了博得小主子的欢心，能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而皇太子朱祁镇对他也渐生依恋之情。可以说是既敬重又有点怕。直到当了皇帝，朱祁镇对王振仍存有这种心理。

由于朱祁镇继位时只是个9岁的娃娃，是典型的冲龄天子，儿童皇帝，所以大臣们曾劝张太后垂帘听政，但太后恪守祖训，认为这样做不妥，于是形成三杨辅政的格局（即由德高望重的杨士奇、杨荣、杨溥来

周恩来见他们平静下来，便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慢慢地，这几个少壮军人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深觉愧疚，流着泪向周先生认错请罪。

主战派还派卫士枪杀了王以哲的副官处处长宋学礼、总部交通处处长蒋斌和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

这就是二·二事件——少壮派发动的“兵谏”——一场不该发生的悲剧。

四千钧一发之际

王以哲被害的消息传到前线，像滚烫的油锅里溅进了水，顿时炸开了。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广大官兵怒不可遏，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在西安的东北军

高级将领则疯狂报复，把杀王以哲的卫队连长于文俊，剖腹挖心，用心肝祭奠王以哲亡灵，并枪杀了为停止内战立下功劳而并没参加“二·二”事件的东北军旅长高福源。许多人扬言要砍孙铭久等人的头，挖他们的心。恐怖气氛笼罩古城，一时岗哨林立，刀光剑影，谣言四起，东北军陷于自相残杀的危险边缘。

这时，在杭州“休息”的蒋介石却显得特别兴奋，他拿着刚收到的密电，得意地对美龄说：“这回，我看你杨虎城还能支撑多久。”随即吩咐左右，急电顾祝同，乘机分化瓦解东北军，进逼西安。顿时，一些东北军将领纷纷倒向中央军。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



主持政务)。对于这种安排，王振虽极为不满，但一个太监又有何办法呢？打那以后，这个权欲狂便采用小忠小信掩盖其大奸大恶。

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设法讨好三杨，取得三杨的信任。

一次，小皇帝朱祁镇与小太监在一起玩球，看见王振来了，马上不玩了。第二天一大早，皇帝正在内阁中，王振又跪奏道：“先皇帝为一球子误天下，陛下又跟他一样喜欢玩球，江山社稷怎么办？”三杨听了感叹不已，说：“宦官中居然有这样的人！”善于藏起狐狸尾巴的王振听后喜上眉梢。随后，他每次到内阁去传旨，总要假模假样地装作不敢进去，而三杨为表示对他尊重，不但请他进去，还让其坐。据说，朱祁镇的祖母张太后是个有政治头脑的人，当她发现王振干预政事的苗头时，极为恼火。一天，张太后把王振召到便殿，厉声道：“你侍候皇帝起居，经常犯法，今天应当赐你死。”太后身边的女宦，立刻上前把刀搁在王振的脖子上，吓得王振魂飞魄散。当时幸有皇帝出面下跪求情，张太后才对王振说：“看在皇帝和各位上臣的面子上，饶了你，以后切不可干预国家大事！”

打这以后，狡猾的王振很少在外宫露面，着意在暗中对朱祁镇施加影响。朱祁镇每次临朝之后，王振总要设法弄清楚朝堂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再将诸事仔细揣摸，悄

悄地告诉这个小皇帝，该怎么应付，怎样赏罚。每日临朝之前，他还要为这个小皇帝做好准备工作，把该说、该做的事叮嘱一遍。由于王振的耳目众多，消息通畅，将要发生什么事，常能料到，所以小皇帝感到十分惊奇，愈发佩服他。王振还教朱祁镇如何来树威，如何用重典来驾驭群臣。对于这一招，这个小皇帝学得最快。在执政的前五、六年中，先后将兵部尚书王骥、兵部侍郎邢端、礼部尚书胡瑩、户部尚书刘中敷、刑部尚书魏源、右都御史陈智、兵部侍郎于谦等重臣投入狱中。

当时，一些重臣不仅要坐牢，有的还被带到长安门“荷校”。所谓“荷校”，也就是枷号。这又是王振想出的新招，他制了许多不同的枷，称之为“校”。这些“校”，从一、二十斤到几十斤乃至百斤不等。所谓“荷校”，就是让人扛上这种枷在一定的地方站着。象户部尚书刘中敷、左侍郎吴玺、右侍郎陈蒞在长安门竟被枷号十几天，直到张太后出面干涉，才官复原职。

## 二、不知兵而弄兵

“何时才能去掉悬挂在自己头上那把张太后的宝剑的阴影呢？”王振经常这样想。

这一时刻终于来到了。

1442年隆冬，张太后不幸病故。



紧接着，三杨辅政的格局也被打破。先是年迈的杨荣因受贿被揭发，忧愤而死；随之，杨溥因年老多病，难以过问国事；杨士奇也因儿子杀人受到牵挂，不久去世。

当群臣们痛哭尽哀、忧心如焚之际，王振却心中暗喜。

很快，他就肆无忌惮地专横起来。

明朝初年，开国皇帝朱元璋鉴于汉唐宦官干政的教训，曾在宫门内树了一块三尺高的铁牌，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八个大字。王振十分讨厌这块牌子，偷偷地将这块铁牌毁了。

当时有个敢于言事的官员叫刘球。他在一份给皇帝的奏折中这样写道：“夫政由己出，则权不下移……皇上临御九年，事体日熟，愿

一体的格局迅速解体。局势万分危急！

直到此时，孙铭久等人才明白自己闯了大祸，急急忙忙跑到杨虎城那儿，求杨想办法救他们。杨虎城无可奈何地说：“事已至此，我已无能为力，你们自己处置吧。”

孙铭久等无法，只得跑到中共代表团驻地。一进门，孙铭久便“扑通”一声跪在周恩来跟前，痛心疾首道：“周先生，我对不起你，我有罪啊！”

“诸位，请不要怕，也别急。”周恩来抑制住内心的悲愤，善意地劝慰，“只要你们几个为首的和卫队团离开西安，那些急于为王以哲将军报仇的人就失去了

对立面，就可以避免一场东北军内部的自相残杀。”

孙铭久等人连声称是。

6日，周恩来当机立断，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派人把孙铭久等几个发动“二·二”事件的骨干护送往红军驻地云阳镇。支持杨虎城用军事力量强制东北军卫队团撤出西安。

一场大规模自相残杀的惨剧避免了。

一场内战消除了。

7日，进城的东北军，平静无事。

8日，顾祝同部中央军和平进驻西安城。

〔责任编辑：张 蕾〕

……亲决故事，使权归于一。”暗示王振专权，要皇帝特别留意。王振知道后恨之入骨，必欲除掉刘球而后快。于是，他便下令将刘球逮入诏狱，命指挥马顺杀死刘球。据说，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马顺和一个姓卢的小校操刀来到监狱。刘球见状，知道命即休矣。就站起来悲愤呼号太祖、太宗。他的头被砍下，身体还站立着，马顺和小校又将他的遗体剁成数块，埋在监狱门口。

当时，大理少卿薛瑄和祭酒李时勉也不愿投靠王振。王振便陷害薛瑄，李时勉则被戴上重枷在国子监门口示众。御史李铎碰见王振不肯下跪，被捕入诏狱，打得半死，滴成铁岭卫。附马都尉石琚骂自己家中的宦官吕宝，王振说他不尊重自己的同类，将其抓进诏狱坐牢。武功中尉指挥使华嵩与王振的侄子因为一个妓女争风吃醋，王振竟派打手将华嵩头发剃光，涂上漆，在教坊门口枷号示众。

由于王振大权在握，自有不少人争着向他献媚。其时，贿赂王振的官员几乎踏破他家的门坎。王振每到朝觐日大开其门，不分日夜地听任各级官员具礼进见，其中送礼“重至千两者，始得一饱一醉而出”。当时还流传过一则金中书、银主事的故事：江阴布衣徐颐、常熟魏某都很有钱，都想谋个京官当当。徐颐花重金求王振，得到中书舍人的职位。魏某走别的门路，花了一大笔钱后，也成了中书舍人，不久又当主事。所以京中称他们二人为金中书、银主事。

经过几年的搜刮、受贿，王振很快成为一个暴发户。他在京城内外有宅数处，皆重檐邃阁，陈设豪华；他信奉佛教，曾耗资数十万两白银，重建庆寿寺，改为大兴隆寺。据统计，若干年后查抄他的家产时，搜出金银60余库，玉盘上百个，高达六、七尺的珊瑚20余株，马数万匹，其他珍玩无数。

当时，一些重臣虽不情愿给王振送礼，但却另有巴结他的办法。象兵部尚书徐瀚见到王振，谄然下跪，被人传为笑柄。有的公侯勋戚则称王振为“翁父”。工部郎中王祐更是一个谄媚的典型。此人虽仪表堂堂，但却没有胡须；这本是一种生理现象，不足为奇，可有一次王振问他：“你怎么没有胡须？”王祐居然说：“你老人家无须，儿子岂敢有须！”

王振本来不懂兵法，但却轻举妄动，不知兵而弄兵，结果导致“土木堡之变”，使皇帝成了阶下囚，自己则命归西天。

那是1449年盛夏，瓦剌（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分兵三路向内地骚扰。王振以为这是扬威的好机会，力劝明英宗朱祁镇亲率大军出征讨伐。不少大臣曾苦谏不可，但王振蛊惑皇上不理众议。

经王振再三“开导”，朱祁镇不仅同意亲自出征，而且还让王振为这次出征的实际指挥者。在王振看来，只要兵多将广，就能够打胜仗。所以，胡乱分派，命令兵部在两天之内调集到50万大军。

可是，由于时间紧，催征急，调集来的军队装备不齐，闹出不少笑话。一上路又赶上狂风暴雨，行至居庸关外，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人提出请皇上回銮，改由武臣率军出征。王振以为这是和他作对，竟假借天子名义，传出口谕，罚这些重臣在草丛中跪。

大军行至大同，当王振亲眼看到战事的惨状时——到处是断头破腹的残尸，才感到心惊肉跳。

阴历八月初一的一天，王振下令撤军。

然而，50万大军撤退起来谈何容易？

退至宣府一带，敌兵追至，明军有4万人被杀。

退至怀来县的土木堡，马上被瓦剌军团团围住，兵部尚书邝埜曾

三次紧急上奏，要求由他亲率一支部队，保驾皇上突围，可王振极力反对，未能实施。

到中秋节那一天，瓦剌军设计使明军大乱，结果连死带逃，50万大军荡然无余。随军文臣武将纷纷遇难。皇帝朱祁镇见突围不成，便下马静坐，做了俘虏。王振则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长锤打死。樊忠在挥锤时大声喊道：“我为天下诛此奸贼！”

土木堡之败完全是王振擅权造成的。消息传到北京，百官恸哭失声，陈镒等人纷纷揭发王振的罪行，王竑等人则当场揪出王振的死党马顺，在其身上乱踩，顿时“尸暴血流”。其他同党，包括王振的族人，也均被处死。

### 三、“八虎之首”

1508年初夏，明朝的第九个皇帝朱祐樞又咽气了。即任新君朱厚照年仅15岁，是位既聪明又好逸乐的少年。

随着新天子出场，又有几个权宦从幕后步入前台。

还在做太子时，朱厚照身边就有八个宠爱的太监，人称“八虎”。他们是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在“八虎”中，又以刘瑾最凶狡，有“利嘴刘”之称，是“八虎之首”。

这个刘瑾，原本姓谈，因依靠一个姓刘的太监净身入宫，故改为姓刘。刘瑾对王振虽相隔多年，早已不见其人，但却心慕之，妄想加以仿效。刘瑾想，王振是从东宫侍奉明英宗而崛起的，而自己不正也是先被派往东宫的？王振是以歌舞游猎等项邀宠于英宗朱祁镇的，而自己不正也是用这些来逗引朱厚照使之乐而忘返的吗？

果然，少年天子没有亏待刘瑾。登基那天，就让他掌管钟鼓司，负责皇帝出朝时的钟、鼓及内乐、传

奇、过锦、打稻等杂戏。不久，又被提升为内官监太监，负责营造宫室、陵墓、冰窖、制作铜锡器的妆奁等事；同时还总督内府团营——管理京都的主力军。

刘瑾终于按捺不住了。

明孝宗朱祐樞在遗诏中曾下令撤销官枪监和各城门监局，刘瑾拒绝执行。他给新天子出主意，要求各内臣监守们各自捐献1万两银子，作为免于撤销的费用。

他又奏设皇庄30余处，占地37595顷，顷刻扰得京畿一带大为纷乱。

外廷诸臣，早已风闻“八虎”之名，但那时他们在东宫，只不过是侍奉皇太子到处玩乐游猎而已，为害并不大。而如今刘瑾干政已在京都引起骚动，不理睬不行了。因此，纷纷上疏揭露、指责刘瑾的行为。王岳、范亨、徐智等几个正直的太监同样憎恨“八虎”，原原本本向皇上转述群臣的意见。

“见恶不能除，臣有何面目见先帝？”大学士刘健这样说。

为了进一步向整天沉溺于游乐中的皇帝施加压力，有一日，刘健又约定韩文等主要大臣在次日早朝时一齐进谏，非除掉刘瑾不可。

然而，善于投机的吏部尚书焦芳在关键时刻向刘瑾告了密。刘瑾便连夜同马永成、高凤等“八虎”围在朱厚照面前痛哭求饶，并伺机挑拨，终于取信于朱厚照。

就在这天夜里，朱厚照不仅下令将王岳、范亨、徐智等正直的太监拿下，还任命刘瑾掌管司礼监，马永成掌管东厂，谷大用掌管西厂。

次日，当众臣早朝时，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刘健等人知道事已无法挽回，纷纷上表辞职。武宗也觉得这些老臣在身边整天喋喋不休，实在有些讨厌，便立即降旨准许刘健、谢迁等人辞职。

从此，朝廷内外的大权全部落

到刘瑾手中。国家的一切政令，官员的提升罢免，都必经过刘瑾点头。

为了消除异己，刘瑾首先进行有计划的大屠杀。

他下手的第一个对象就是王岳，将其刺杀在赴南京的路上。

第二个要杀的是奏书的起草者，弹劾他的户部尚书韩文。刘瑾曾派特务明察暗访，终于找到了陷害韩文的借口——在户部向内府辅送的银子中发现了假银，就说韩文玩忽职守。遂将其捕入诏狱。

为韩文润色奏书的户部郎中李梦阳也被流放到边远地区，接着又逮捕回京，囚入诏狱。

兵部主事王守仁见刘瑾不择手段地陷害韩文等人，又愤然上书，怒斥刘瑾。刘瑾看后，立即派人把王守仁抓来，打得死去活来。

刘健和谢迁虽已辞官回家，刘瑾仍不肯放过他们。某日，他又假传圣旨，将刘健、谢迁以及杨守随、张敷华、林瀚、王纶、孙盘、黄昭、刘瑞、汤礼教、陈霆、徐昂、陶谐、刘萑、艾洪、吕种等53人定为奸党，并命他们一律跪在金水桥南，听候宣读谕旨。

据统计，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刘瑾以种种手段，陷害或驱逐了尚书以下的官员达数百人，并把那些遗留下来的空缺，陆续改授给自己的心腹、爪牙。例如，向他告密的焦芳以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而进入内阁；张綵出任吏部尚书一职；王鏊、刘宇、曹元也安排在内阁中；杨玉和石文义出任锦衣卫指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内阁重臣到六部公卿，从都督到监军，从巡抚到知县，多数官位都被刘瑾的爪牙占据了。

## 四、“立的皇帝”

随着权力的日益膨胀，刘瑾开始把武宗视为傀儡。每次武宗早朝

时，刘瑾都站在他的右方。群臣拜完君王之后，都必得向东北作一揖，故时人称武宗为“坐的皇帝”，称刘瑾为“立的皇帝”。

由于刘瑾本人不通文墨，每次批示奏疏时都要先和其妹夫、礼部司务孙聪，松江秀才出身的棍徒张文冕商议、起草，然后交给焦芳润色。对这样炮制出的批示，李东阳只能点头赞同。遇到重大问题需要马上处理而偏巧刘瑾不在时，李东阳还得派人把奏疏送到刘瑾的家中，在征求刘瑾的意见后，才敢下笔批复。

当时，官员们给皇帝上奏折时，要先用红色帖子送给刘瑾，称为“红本”。然再上报通政司，称为“白本”。在奏疏中只准称刘瑾为“刘太监”，不准写他的名字。都察院有一次在审判罪犯的定罪奏疏中不小心写上了“刘瑾传奉”字样。刘瑾看到后恼羞成怒，狠狠地加以申斥，直到都御史屠滂带领下属跪下道歉求饶，才在一阵痛骂之后了事。因此谒见刘瑾时，拜贴上一一般都写“官某顿首拜禀见”；还有的竟称他为“顶上”，或自称“门下小厮”。

刘瑾是最善于搞特务政治的。在原特务组织东、西二厂的基础上，他又增设了一个内行厂。由他亲自指挥。内厂的权力在东、西二厂之上，它不仅侦察、镇压反对他的一切官民，而且还监视东、西二厂。两厂为了争得刘瑾的青睐，各自又纷纷派出特务四出活动，以至穷乡僻壤的老百姓见到骑着高头骏马、衣饰华丽，操京师口音的人，就吓得四散躲避。内行厂侦缉用刑比东、西厂更为残酷，罪不分轻重，均施以刑杖，永远充军边境，或给戴上重150斤的枷发配。官民即使犯很小的过失，也难逃他的惩罚，以致非法枉死者达到数千人。而且，凡经刘瑾逮捕的人，一家犯法，邻里均受牵连。在河边住的居民犯法，甚至株连到河对岸。

在金钱方面,刘瑾也贪得无厌。他的胃口很大,从党徒刘宇手中接受贿赂一次竟达黄金万两。地方官员到北京朝觐,必须先送他两万两银子,否则就别想升迁,甚至大祸临头。有的身边带钱少了,只得四处举借。有个叫周钥的官吏到淮安巡视。回京时向知府赵俊善借一千两黄金,准备送给刘瑾,赵俊善怕周钥还不起,不肯借,结果周钥不敢回京,只好选择了自杀这条路。

为了搞到更多的钱,刘瑾还假传圣旨,令吏、兵二部凡任免文武官员,要先到刘瑾处议论通过,然后才能上奏本。这样一来,招致送礼之风更加盛行,谁送礼送得多谁升迁,谁送礼送得少谁便降职或免职。有个叫陈雄的官员拒绝送礼,被刘瑾诬为贪污,不仅夺了先朝赐给的免死诰卷,还削爵抄家,家人全被押往海南充军。

即使这样,刘瑾仍不满足。又令全国各军、民府库将存留的财物全部解送京城,而这些解往京师的钱物,有一半落入刘瑾的私囊。

在专权期间,刘瑾究竟敛聚了多少财富,这永远是个谜。仅据高岱的《鸿猷录》透露,刘瑾失宠后,被抄家,竟查出金24万锭又57800两;银元宝500锭又1583600两;宝石2斗;金甲2;金钩3000;金银汤鼎500;蟒衣470袋;牙牌2棣;穿官牌500;袞龙袍4;金龙盔甲30;玉印1;玉琴1;玉带4160束等物。

刘瑾还十分迷信。为了炫耀富贵,表示孝顺,祈求长生,在陕西原籍大兴土木,为父母建了有碑亭石器的祠堂、坟茔。在京师朝阳门外用数十万白银盖了玄明宫,供奉玄天上帝。玄明宫规模极为宏大壮丽,时人记为:“千门万户谁甲乙,玄明之宫推第一”。为了取得这块地方,刘瑾拆毁了官民房屋1900余间,发掘了民坟2500余家。1507年4月,刘瑾又下令裁革各衙门官员

数百人。但各处镇守太监、总兵、巡抚、副参、游击等官,只要是由他门下出身的,不论贪污、年老、有病,一概保留。都指挥以下一级官员,只要刘瑾写个“委任××为×官”的纸条,兵部就立即照办,不敢再奏。

刘瑾实在太专权了。以至弄得“八虎”内部也矛盾重重。马永成、谷大用开始怨恨他。张永与他也相去日远。刘瑾感到,张永是个威胁,就设法将他废黜到南京去。张永得知后,恨到极点。张的这种情绪,被一个叫杨一清的官员摸透,遂给他出点子除掉刘瑾。

那是1510年中秋夜,张永借征伐安化王朱寔福归来向皇帝献俘之机,把藏在袖中的弹劾刘瑾的奏章呈给朱厚照,并说刘瑾想造反。奏章所奏17条罪状,条条都被在场的马永成等人证实。那时朱厚照已有醉意,不觉沉吟道:“刘瑾太辜负了朕?”张永立刻在马永成的支持下连夜逮捕了刘瑾,并将其关进宫中药厂。

次日,张永又极力怂恿皇上亲自去抄刘瑾的家。在刘家,朱厚照亲眼看到搜出私刻的一颗皇帝印,500个官牌,以及盔甲、弓箭、皇帝穿戴的龙袍、玉带等各种违禁品。还发现刘瑾经常用的扇子里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朱厚照不禁出了一身冷汗,马上大怒道:“刘瑾果然要造反!”

数日之后,朱厚照下令将刘瑾凌迟处死,并砍下头颅示众;刘瑾的招供和判决书,处死他的图形也在全国各处张贴。按例,凌迟刀数为3357刀,头一日先刚357刀,割出的肉片象大指甲一样。刘瑾受刑那天,过去被他杀害的人家,多以一钱买下从刘瑾身上切下一小片肉,祭祀被冤死者。

刘瑾处死后,其党徒张綵死在狱中,尸体被乱刀砍得粉碎。内阁大臣焦芳、刘宇、曹元,尚书毕亨、

朱恩等一共60多人,分别被降职或流放,不久,朱厚照又按朝臣建议,下令把刘瑾变更的法制——吏部24项,户部30余项,兵部18项,工部13项全部按原来的规定改正过来。

## 五、从赌徒到“九千岁”

又过了110年,另一个更大的权宦又出现了。他就是魏忠贤。

魏忠贤原本是个酒色之徒,且沉溺于赌博。一次,他赌输了,一气之下,便自行阉割,将老婆嫁人,来到宫内当太监。

魏忠贤在宫内走运;主要得益于一个坏女人——客氏。

这客氏体态丰腴,为人放荡。18岁那年,入宫给朱由校当奶妈。不久,便和一个叫魏朝的太监在私下结为“对食”。所谓“对食”,乃是宫中的一个隐语。凡是宫里的大太监,若和宫中的一个宫女,或是一个别的女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像家庭一样的形式,过着像夫妻一样的生活,便称为有了对食的关系。在对食的关系中,女的一方也被称为“菜户”。

正当客氏和魏朝打得火热之时,魏忠贤进宫来了。

魏忠贤虽已阉割,但并未割尽,懂得房中术,兼之年轻时就在女人堆里厮混,因此深得客氏欢心。于是,客氏喜新厌旧,先是暗中和魏忠贤勾搭,后来索性抛弃魏朝,与魏忠贤结为“对食”。

这个客氏还深得自己的“奶儿”——朱由校的好感。1620年,17岁的朱由校坐上龙椅。这个“顽童天子”念念不忘奶妈对自己的抚养之恩,当上皇帝不到一个月,就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并赐金印一颗,方二寸余,四爪龙钮,印文是“钦赐奉圣夫人客氏印”,重达200两。

正是凭借客氏这条特殊的内线,魏忠贤很快爬上了司礼秉笔太

监这一权势倾国的要职。对于宦官惑主的招数，魏忠贤是非常精通的。由于新天子既贪财又好色，他就尽力用这两点来引逗这位年轻的皇帝。为了让朱由校增添精神，魏忠贤献上一种名为“灵露饮”的春药。朱由校服后，果然感到精力大增，非常尽兴，于是爱之不舍，大量服用，后来竟出现了全身浮肿，行动无力等不良后果。

朱由校还有个特殊的癖好，就是欢喜独自营造一些房屋一类的模型。每当干到兴趣极浓时，别的什么事也顾不上。而魏忠贤则偏在这个时候来向他启奏。结果，朱由校总是厌烦地挥手嚷道：“你快去吧，怎么办都好。别再来麻烦我！”这样，魏忠贤就算领了圣旨，什么事都由自己的意思去办。

1622年，魏忠贤的弟弟和侄子被委任为锦衣卫指挥监事。

1623年春天，魏忠贤举荐他的亲信魏广傲任大学士。

同年秋天，把参加宫中内操的宦官增加到万人，穿着护身铠甲出入宫廷，恣意耀武扬威。

接着，又假传圣旨，赐先帝朱常洛的选侍赵氏自杀。

张皇后多次在皇帝面前说客氏、魏忠贤的过失，客、魏对她恨之入骨，用诡计使张皇后流产，致使朱由校绝后。

宫嫔冯贵人劝皇帝停止内操，客、魏假传圣旨，说她犯了诽谤罪，迫使她自杀身亡。

1624年，有个叫杨涟的官员给朱由校呈上一个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岂料，这个昏庸的皇帝不但不惩治魏忠贤，反而下了一道措词严厉的谕旨，极力袒护他。

金色的保护伞既然已经张开，别说是和风细雨，就连暴风骤雨也吹不动魏忠贤的一根汗毛了。

于是，魏忠贤愈发嚣张，下决心把反对派统统杀掉。

大学士顾秉谦是一个积极投靠魏忠贤的小人，他马上为魏开了一份黑名单。

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学士韩爌、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延、兵部侍郎李邦华，以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李应升、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熊廷弼、李宗延、张向达、公鼎等数十人（其中不少是东林党人），被革职斥逐，有的惨死于狱中，有的投水自尽。

反对魏忠贤的政治势力的后台叶向高，也被迫辞职。

与此同时，魏忠贤却利用这一时机，安插自己的亲信，使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人”。据史载，他的心腹主要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所谓“五虎”，为首的是崔呈秀，以下有田吉、吴淳夫、李芝龙、倪文焕。他们都是文官，是魏的智囊团，替他出谋划策。“五彪”是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他们都是武官，又都在锦衣卫镇抚司或东厂等处任职，充当魏忠贤的打手，专门替他用刑逼供，设计敛财。“十狗”中则兼有文、武官，主要人物是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还有那个献春药的霍维华，“十孩儿”中最出名的是李蕃和李鲁生。

当时，魏忠贤的侄孙魏希孔、魏希孟、魏希尧、魏希舜、魏鹏程，亲戚董芳名、王选、杨六奇、杨祚昌，都做到左、右都督和都督同知、僉事等官。他的不是老婆胜似老婆的客氏之弟客光先，也做了都督。

其时，由魏忠贤直接领导的东厂特务们，到处横行，捉拿到的人，不管有罪无罪，都被打得遍体鳞伤。平民百姓谈天触犯了魏忠贤，会遭到捕杀，甚至剥皮、割舌。

魏忠贤既然在各个要津布满了

自己的党羽，所以也就无日不处在吹捧之中。

当他被封为尚公时，有人呼他“九千岁”。

由于他是以提督东厂而闻名的，所以有人又称他为“厂臣”。当时的阁臣，包括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等人所拟的票、旨中，“朕与厂臣”，竟成为常见的习语。

有人甚至把魏忠贤和孔子相比，说孔子作《春秋》，厂臣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厂臣诛东林。

在这种阿谀奉承纷然竞至之时，忽然又兴起一股为魏忠贤建生祠的歪风。于是，刹时之间，生祠之多，几遍天下。

说到底，魏忠贤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玩火自焚。因为他仰仗的仅是一个荒唐度日、疏于政事的“天子”，而一旦失去了这个靠山，就寸步难行。

果然，到1627年9月底，朱由校病死于放浪纵欲。新皇帝朱由检一上台，就将魏忠贤发配到凤阳当净军。魏忠贤还未抵达发配地，朱由检又下令把他押回京都审判，魏忠贤自知难逃一死，便悬梁自尽。人们觉得这远不解气。朱由检遂再度下令将魏忠贤的尸体碎割，并将首级挂在河间府西门示众。

与此同时，京中也查拿魏党。客氏被活活鞭死。其子侯国兴、其弟客光先与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也在同一天被斩首于闹市，并暴尸街头。

其他“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干儿义子子孙也分别受到处死、关押、流放，罢免等不同程度的处罚。

打那以后，明朝的阉党再也没有兴起过大浪。

【责任编辑：晓渡】

晓乔：乔还田，37岁，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副编审，有个人著述多部。

作为一位杰出而又著名的军事将领，没有在激战中死于敌人的刀枪剑戟之下，却始而受到诬陷排挤，不安其位；继而被自己效忠的崇禎皇帝斩首示众。可歌可泣，叱咤风云的赫赫战功，却伴随着坎坷崎岖的人生道路。

# 千古奇冤：



●张继信

## 壮怀激烈 屡建奇功

袁崇煥（1584—1630），字之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后迁至广西藤县。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606），参加乡试，成为举人，而自此以后，屡次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才如愿以偿，成为进士而进入仕途，被任命为福建邵武知县。

为人慷慨且富胆略的袁崇煥，喜爱谈兵。除处理本县政务外，很注意边塞军务。其时，东北后金势力日见崛起壮大，不时入犯，以致战火连年不断。身居南国的袁崇煥，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辽东战事的发展与演变。他“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经常“论塞上事，晓其扼塞情形”。因此，“以边才自许”，一心想亲赴战争前线，为拯救国家的危难贡献自己的满腔热血。

天启二年（1622）正月，袁崇煥至京朝觐接受吏部考察。由监察御史侯恂推荐，被破格提升为兵部职方主事，从而为其提供了一块发挥聪明才智的天地，他如鱼得水，任意腾跃。不久，后金八旗兵向辽西挺进，攻克明朝重镇广宁，明军溃退。他趁机暗中“单骑出阅关内外”，对如何抵御后金的进攻，了然于胸，发出“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的铿锵誓言，表现出他的自信和胆略。明朝廷的大臣也称赞袁崇煥的军事才华，便超擢为佾事，监山海关外诸军，并“发帑金二十万”以便招募。袁崇煥慨然赴任，招募士卒，安置失业流民，身体力行，不畏荆棘虎豹，深得将士信赖。经略王在晋“议修重城八里镇”，袁崇煥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以为非策”。因人微言轻，不被重视。待大学士孙承宗行边赴辽时，支持袁崇煥，“驳重城议”。在讨论守卫要塞时，袁崇煥主守宁远，王在晋等提出异议，主守觉华。孙承宗再次支持袁崇煥，命其与满

桂率五千人驻守宁远，修筑城池，并定规制，一年而后，“遂为关外重镇。”加上袁崇煥勤于职守，“誓与城存亡；又善抚，将士乐为尽力。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袁崇煥以功进兵备副使，再升山东右参政。天启五年（1625）夏，袁崇煥奉孙承宗之命，遣将分别据守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廓，备战守，防线东移，收复失地二百余里，这既是袁崇煥独当一面的军事生涯的开始，又是他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的用武之地。同年十月，孙承宗因阉党专权，事事掣肘，且又遭言官弹劾，“诬左袒东林”，不安其位，便自请求去。魏忠贤趁机派其党羽高第代孙承宗为薊辽经略。

高第本是懦弱胆小之徒，他的出任，给袁崇煥原进取精神以极大的节制。高第曾提出“关外必不可守，应锦州、右屯诸城的守县及将士，全部撤至关内”。袁崇煥据理力争：“兵法有进无退。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可是，高第以其经略的权势。不听劝告，仍一意孤行，欲并撤宁、前二城。袁崇煥不得已，只得以“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来坚持。结果，在高第的指令下，除宁、前二城之外的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的守城器具及屯兵等尽撤入关，丢弃米粟十余万石。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震”。（《明史·袁崇煥传》）袁崇煥对高第的狂妄无知和骄横十分愤慨，一腔热血，报效无门。因此，他连续三次上书朝廷请求回家。本来，魏忠贤想让其党羽替代袁崇煥，无奈阉党多是无能之辈，根本找不出一个象样的人来。再加上东线守御正紧，不得不勉强升迁袁崇煥为按察使，仍驻守宁远。然而，由于高第的胡作非为，使袁崇煥“数年心血，委于一旦。敌志始骄矣。”

以萨尔浒之战的胜利而迅速壮大起来的后金努尔哈赤，乘高第内撤之机，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

率兵西渡辽河，“于旷野布兵，南至海岸，北越广宁大路，前后如流，首尾不见，旌旗剑戟如林”，长驱直入，连续攻占右屯至途山众多城池，进逼宁远。宁远军民见“虏势甚张，人心惶骇欲逃”。明朝廷得知，也十分吃惊，文武大臣没有善谋良策，私下认为宁远必不可守。辽东经略高第龟缩在山海关内，拥兵不救，使宁远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

袁崇焕面对努尔哈赤的咄咄逼人之势，镇定自若，召集满桂等将士誓守宁远。“更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乃尽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清野以待……。撤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守将杨麒，将士逃至者悉斩，人心始定”。同时命满桂、左辅、祖大寿、朱梅四员大将领兵分守定远城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城墙上架设红夷大炮，另派专人宣传督阵，“城上及四门为援。”一切布署已定，袁崇焕告谕全城军民：“苟能同心死守，我为牛羊以报，是所甘也。”军民为其诚意所感动，众志成城，严阵以待。

努尔哈赤率兵抵达距宁远五里之地驻扎，切断宁远与山海关的联系。又考虑后金兵长途跋涉，士马疲惫，不轻易攻城，而遣使向袁崇焕劝降，以换得充裕的时间。理所当然地遭到袁崇焕的严正拒绝：“义当死守，岂有降理！”努尔哈赤见劝降不成，便于正月二十四日挥兵攻击宁远城，袁崇焕令发西洋巨炮，后金兵死伤甚众，但仍不退却，掘城不止。由于弓箭、火炮不及墙角，有两三处城墙被后金兵掘开。在此危急时刻，袁崇焕身先士卒，抢堵决口，中矢负伤。将士劝其退下，他厉声说：“区区宁远，中国存亡系之。宁远不守，则父母兄弟皆左衽矣！偷息以生，复何乐也！”便“自裂战袍，裹左伤处，战益力；将卒愧，厉奋争先相翼蔽，城复合。”就这样，双方一直激战至二更时分。努尔哈赤见一时难于攻克，即鸣金收兵后撤。袁崇焕趁机选派勇敢士卒，顺城而下，烧毁后金的战车。此后，努尔哈赤连续进攻，袁崇焕指挥将士沉着应战。直到二十六日。经过一番激战，后金兵死伤惨重，努尔哈赤无计可施，才不得不解围而去。他对诸将说：“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也？”怀着遭受挫折的莫大遗憾，闷闷不乐，毒疮暴发而死。这是我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宁远大捷。消息传到北京，文武百官欣喜若狂，称赞“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天启皇帝朱由校也说：“此七八年来的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袁崇焕被推为右金都御史。同年三月，升任辽东巡抚，魏忠贤以袁崇焕不服从自己的旨意，派党羽刘应坤、纪用出镇监军，袁崇焕对此不满，上疏谏止，没有结果。在论功行赏时，加袁崇焕兵部右侍郎。

高第不救宁远，又折辱诸将而遭罢斥，朝廷派兵部尚书王之臣代其职。王之臣亦是庸才，与袁崇焕政见不合。为调和计，分关内、关外，由王之臣与袁崇焕分别督理。袁崇焕从中意识到“廷臣忌己”且深知党争的激烈，于是上书，奏报捍御和进取大计，恳切希望皇帝和廷臣对边臣始终如一，不要被“谤书”、“毁言”所惑。袁崇焕的一片赤诚和屡建的战功，得到朝廷信赖。而此时的后金，努尔哈赤死，由皇太极继立汗位，他不仅要稳固内部，还要调整兵力，准备再战。由于袁崇焕的骁勇坚毅，又一次赢得对后金的宁锦大捷。这是明朝对后金的第二次胜利，其中有袁崇焕的大功在。可是，魏忠贤反而唆使党羽弹劾“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在叙功时，魏忠贤尚在襁褓的从孙竟被封为安平伯，冒滥增秩赐荫的文官武将多达数百人，而袁崇焕仅增一秩而已。梁启超为之感慨地说：“古未有奸臣在内而名将得立功于外者。”此乃真所谓入木三分之论。袁崇焕在阉党的诬陷和排挤下，愤然乞休归里，离开了纵横驰骋的战场。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更加悲惨的命运和千古之冤。

## 归去来兮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皇帝朱由校离开人世，其弟信王朱由检继立，怀着扭转危局的决心和使大明王朝重新振兴的愿望，对朝政进行了一番整顿。尤其是智除魏忠贤、客氏，阉党首恶受到应有处置，朝政渐趋清明。同时采纳廷臣推荐，召回袁崇焕，擢升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同年七月，袁崇焕奉命来到北京。其时，年为四十有五、正当血气方刚的袁崇焕，对政局的变化过于乐观，尤其是对阉党余孽势力、蓟辽边防军事形势的估计又过于简单，所以当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平台召见时，他那勇于冒险、自信、自负的性格所生发出来的重大责任感，以及再立新功的强烈愿望，与朱由检竭力扭转危机成为中兴之主的渴求相吻合。前者喜出望外，后者优礼有加，情感的浓雾在君臣之间扩散，理智随之消减，暴露出来的是袁崇焕的轻率和朱由检的轻信。请看如下对话：朱由检慰问一番之后，即询问道：“东兵跳梁，十载于兹，封疆沦没，辽民涂炭。卿万里召赴，忠勇可嘉。有所方略，具实奏闻。”袁崇焕回答说：“收复辽东失地的策略在奏疏中说得明白具体。我受陛下眷顾，希望赐予‘便宜’之权，预计五年时间，辽东可以全部收复。”朱由检极为高兴，说道：“只要辽东能够收复，奖赏，乃至封伯封侯，我决不吝惜。若你努力从事，击退后金，解除其威胁，你的子孙也会受到恩惠及封赏。”在旁的钱龙锡等四位阁臣，

异口同声地说：“崇焕肝胆意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袁崇焕看到皇帝如此大方，礼贤下士，又有阁臣的夸奖，深感亲切和舒畅，急忙叩头感谢。（参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之四《袁崇焕陛见》）

谈话至此，朱由检退殿休息。给事中许誉卿问袁崇焕五年收复辽东的具体计划是什么？被情感主宰着的袁崇焕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许誉卿说：“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这时，袁崇焕才似乎从情感的浓雾中解脱出来，稍理智，自觉失言，比较冷静地对变幻且蕴藏危机的时局和边防军事形势重新考虑，尤其是从前任熊延弼、孙承宗等人的悲惨结局，以及自己前次愤然乞休归里的事件中，悟出了问题的严重和复杂。为了补救因轻率答对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恶果，在朱由检休息过后再次答对时，袁崇焕就着重提出颇感难办而又必须办理的诸多事务。他说：“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筹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对此难题，朱由检件件许诺，并令四部官员，按照袁崇焕所言，从速办理。接着，袁崇焕又说：“以臣之心，制金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朱由检特意站起来倾听，告谕道：“卿无疑虑，朕自主持。”大学士刘鸿训等请求收回曾赐给王之臣、满桂的尚方剑，改赐袁崇焕，朱由检毫不犹豫，满口答应。尽管如此，袁崇焕心中的疑虑仍未消除，在其离京赴任前夕，又上书说：“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扼，不敢不告。”朱由检不加思索地“优诏答之”。（《明史·袁崇焕传》）作为一位磊落飒爽的边臣大将，肩负重任，又如此战战兢兢，犹如履薄冰的心态，个中甘苦，只有当事者自知。

袁崇焕虽然没有把朱由检的许诺看成是全部付诸实践的事实，但无疑是中得到了莫大的宽慰。便于崇祯元年（1628）八月抵达山海关实施五年收复辽东的壮举。他下车伊始，即着手处理驻守宁远的川湖兵士哗变，斩其首恶，戒谕胁从，使哗变迅速平息。后来，为了事权统一，对驻守皮岛的平辽总兵官毛文龙不听节制，十分不满，以至达到厌恶的程度，终于以

阅兵为名，诱杀了有叛国之迹且飞扬拔扈的毛文龙。与此同时，改革了兵制，使其更适宜于对后金的抗御，辽东防线更加坚固。成为皇太极开拓进取以成努尔哈赤之业的一大障碍。

袁崇焕在辽东的举措，或事先奏请，或事后补报，都得到朱由检的“嘉奖”，满朝文武无不认为有袁崇焕在，五年复辽，指日可待，盲目乐观的情绪，犹如迷雾一样，笼罩在紫禁城的上空。唯有袁崇焕的头脑还较为清醒。自己许下的诺言是收复辽东，不仅仅是抗击和防御，因此，自“知兵力不及，思以捭阖纵横之计”，利用议和的手段，促使后金后撤，让出辽东。便没有朱由检及百官大臣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就付诸实施。更为可虑的是，若后金兵避实就虚，同样会使议和受挫，影响宏图伟略的实现。为此，他综观边塞防务，上书说：“唯蓟门凌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建议：“蓟门单薄，宜宿重兵。”明确指出：“严饬前督师，峻防固御，为今日急着。”这种积极而重要的奏疏，朱由检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而按照常例，交付科部会同商议，拖延因循，相对薄弱的北边防线，未及时调整，依然如故。

## “岳飞”式的悲剧结局

事变的发生，不出袁崇焕的预料。皇太极在与袁崇焕的争战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使他变得聪明起来。遂于崇祯二年（1629）十月，联合蒙古科尔沁等部落。并以其为向导，避开宁远、锦州，由蒙古境入侵，直抵长城，再分兵三路，从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南下。由于明朝北方防线塞垣颓落，部伍废弛，毫无抵御能力，一遇后金兵，即四散溃逃，后金兵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攻城掠县，大肆抢劫。史称“己巳之变”。

朱由检及百官大臣，惊恐万分，一面宣布京师戒严，一面敕令各镇兵马赴京勤王。袁崇焕在未得诏令之前，即率领祖大寿、何可刚等将士驰赴京师救援，于十一月十日抵达蓟州。朱由检得知，极为高兴，“温旨褒勉，发帑金犒将士，令尽统率诸道援军”。对袁崇焕的信任，无以复加，袁崇焕亦十分感激皇帝的知遇，分派将士，守卫郡县重镇，亲率兵马直趋京师，扎营广渠门外，令祖大寿、王承允等驻守西南。此时，皇太极也兵临城下，见袁崇焕已列阵布兵，大出所料。既然率兵到此，就发起进攻，袁崇焕督兵从广渠门、德胜门出击，展开激战。皇太极的兵马死伤甚众，下令后撤，移营南海子。加上后金兵远道而来，难以持久，准备渐渐撤退，返回沈阳。但又深知袁崇焕非等闲





之輩，不除掉他，終難解心頭之恨，於是便施以離間密計。恰巧，此時後金兵俘獲明朝的太監楊春、王德成，皇太極令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監視，並授以反間之計。高、鮑二人奉命來到監押楊、王的處所，看到二位太監似睡未睡，便故作耳語道：“今日撤兵，乃上計也，頃見單騎向敵，敵有二人來見上，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事可立就矣。”當時楊春並未熟睡，將高、鮑的話牢記在心。次日，高鴻中故意放走了楊、王二太監。楊春回到朝廷，將高、鮑所言詳細奏報。

其實，在皇太極率兵抵達京師，兵臨城下之時，北京城中就傳說袁崇煥召來後金兵；閹黨余孽也造謠惑眾，說袁崇煥“引敵兵長驅，要上以城下之盟”朱由檢為之心動，但需要袁崇煥督各鎮兵，沒有表示什麼。當十一月二十三日，袁崇煥在被召見之後，提出率兵入城休整時，朱由檢不許。二十五日再次請求“外城休士如滿桂例，並請輔臣出援”。仍然不許。至此，朱由檢得到太監楊春的報告，信而不疑。十二月初一日，轻信而剛愎自用的朱由檢再次在平台召見袁崇煥、滿桂、祖大壽等。袁崇煥正在派遣副總兵張弘謨等進擊後金兵，得知皇帝召見議餉，立即趕赴平台，待袁崇煥一到，朱由檢就責問為什麼殺毛文龍、援兵逗留？因事出突然，袁崇煥毫無思想準備，未能及時答對，即令綁捆袁崇煥，交付錦衣入獄囚禁。在旁的閣臣成基命，見皇上如此處置，頗感不安，即叩頭請求皇上慎重，朱由檢說：“慎重即因循，何益！”成基命又叩頭說：“兵臨城下，非他時比！”朱由檢仍不省悟。祖大壽見此情景，十分畏懼，便奔出平台，與何可剛率領遼東將士向東開拔，毀山海关，直抵寧遠。朝野為之震動。

此時的皇太極，以靜待機而動。在遣使持書與明朝議和的同時，且猶且行，得知其反間計奏效，袁崇煥被捕入獄，大喜若狂，以為是天賜良機，便揮兵趨良鄉，擇路而歸，沿途攻陷遵化、永平、灤州、遷安

四城，於崇禎三年（1630）五月回到沈陽。歷時七個月。

明朝遭此“己巳之變”，作為皇帝的朱由檢無論如何也不敢承認這個事實，更不願為此承擔責任。為了維護皇帝的尊嚴及皇帝處理政務的無誤，將一切罪責推給袁崇煥，便是最好的辦法。加上閹黨余孽勾結溫體仁等，大肆鼓噪，謀興大獄，借此報復。於是，朱由檢便在崇禎三年八月十六日，下達聖諭說：“袁崇煥謀叛欺君，結奸蠱國，斬帥以踐虜約，市米以資盜糧。既用東虜，陽導入犯。復散援師，明擬長驅，及戎馬在郊，頓兵觀望，暗藏夷使，堅請入城，意欲何為！致廟社震驚，生靈塗炭，神人共忿！”（談遷《國權》卷91）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就這樣，袁崇煥含著極大的冤屈被磔於西市，結束了叱咤風雲的暫短人生。

有史料記載，袁崇煥死得極為慘烈。因受朝廷輿論的影響，京師居民確信袁崇煥“召敵入京”，“敵地講和”、對其恨之入骨，紛紛“爭噉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所謂活剝者也。”親自目睹其慘狀的夏復蘇說：“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噉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盡。”

袁崇煥蒙受的一大冤案，直到清初才真相大白。因此，《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發明》評論說：“袁崇煥在邊臣中尚有胆略，其奉兵勤王，實屬有功無罪，壯烈始則甚喜甚至，倚若長城。一聞楊太監之言，不審虛實，即下崇煥於獄，尋至磔死。是直不知用間愚敵為兵家作用。古今未被治而償其事者，指不勝屈，未有若壯愆此舉之甚者。”又大發感嘆：“刑章顛倒，國法何存？豈唯不知將將之道，抑亦大夫御下之方矣！”此論可謂一針見血地道出了朱由檢中皇太極反間之計而冤殺袁崇煥的嚴重過失。同時說明了朱由檢的昏庸和朝政的敗壞。

〔責任編輯：張向陽〕

# 文学创作研究班

## 招生启事

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文学部为发现文学新人，扶植文学新人，培养青年作家，繁荣文学事业，应广大文学爱好者要求，决定举办文学创作研究班。

本研究班学制一年。即1993年3月1日至1994年2月底。凡文学爱好者均可报名参加。

本研究班设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通俗文学等专业，学员可任选一项。也可以报综合类（不分体裁）专业。

凡完成学业者颁发中华文学基金会文学培训中心结业证书。

收费标准：125元。凡三人以上（含三人）同时交费者每人减免十元。

报名办法：报名时请在汇款单上用正楷写清通讯地址、姓名、邮政编码。并在“附言”页上写明所报专业。本研究班收汇款后即予注册，并寄给收据、学员证及有关表格。

即日起开始报名至1993年2月15日止。

报名及汇款地址：北京朝外白家庄西里机械工程学院；中华文学基金会文学培训班收。

邮编：100020

# '93

## 欢迎订阅本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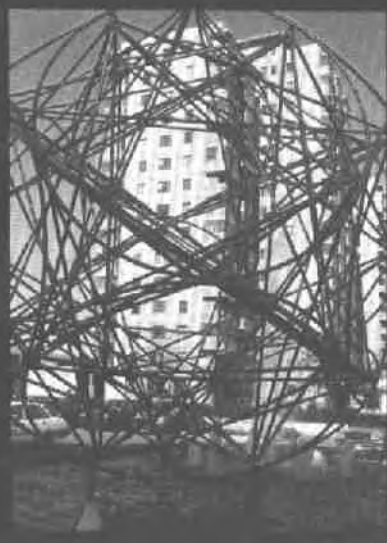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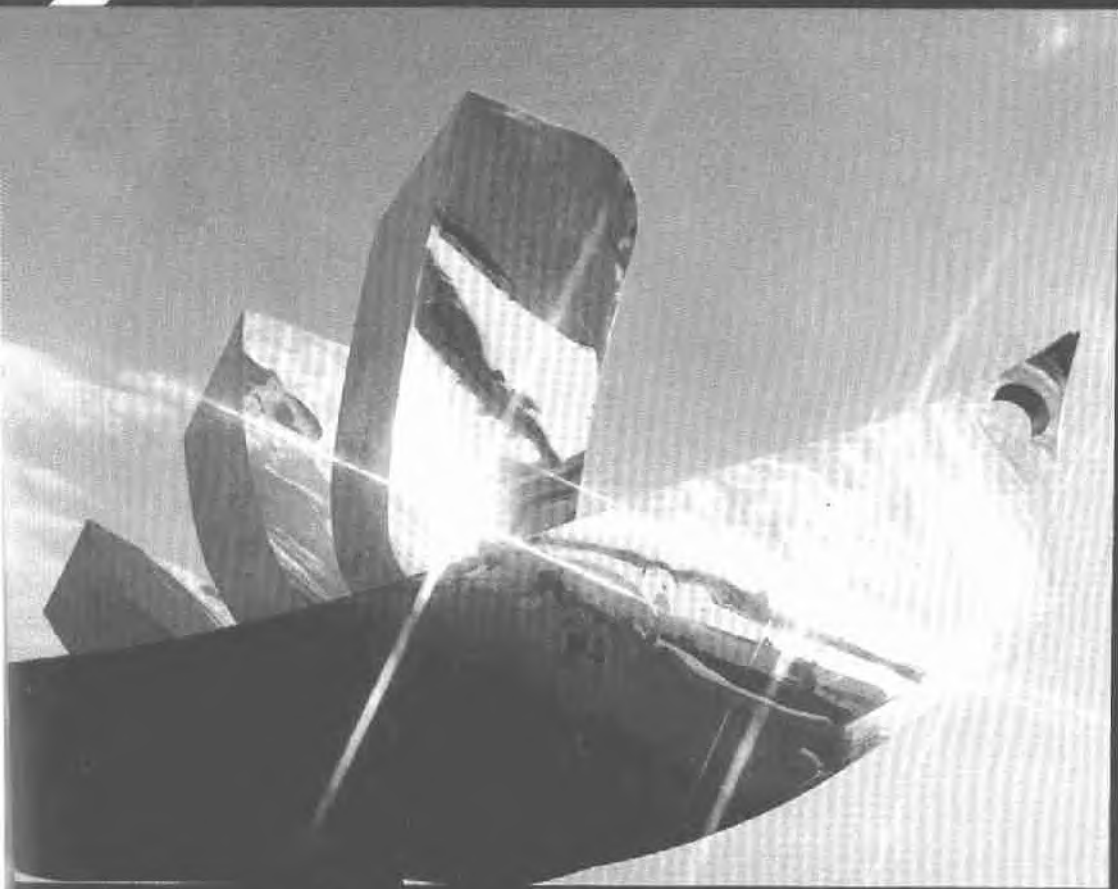
### 1—9期合订本

为满足读者需要，《炎黄春秋》1—9期（1991年7月创刊至1992年全年）合订本开始发售。每本定价30.20元，邮费3.50元。请按以下地址汇款邮购：北京市西城区南草场街22号《炎黄春秋》杂志社读者服务部。联系人：许少英  
邮政编码：100035。

### 本刊下期要目

我和胡风共命运  
邓小平和他的南巡讲话  
陈独秀儿孙们的命运  
“右派们”梦回北大荒  
金门岛的秘密  
中国水利建设上的一大蠢事  
一本英雄书，一场生死劫

泸沽湖，神秘的土司夫人  
陈香梅在初恋时  
在晚清政坛上三起三落的弈沂  
赛珍珠有颗中国心  
一个中国人眼中的美国人  
湘江之战中的白宗禧  
美国布里奇暗杀计划在中国



力达德

岁岁平安

999

# 没有三九天 三九胃泰的承诺

**999** 三九(999)企业集团南方制药厂(中国·深圳)  
NANFANGDHARMACEUTICAL FACTORY

地址:深圳市镇湖电话:36099 电挂 0029 邮编:518026

力达设计

统一刊号:CN11-2817 定价:2.98元